

DAOFENGJI
DAOJIAODEFAZHANHEDAOSHIDEXIUYANG
ZENG DING BEN

陈莲笙 著

上海道教协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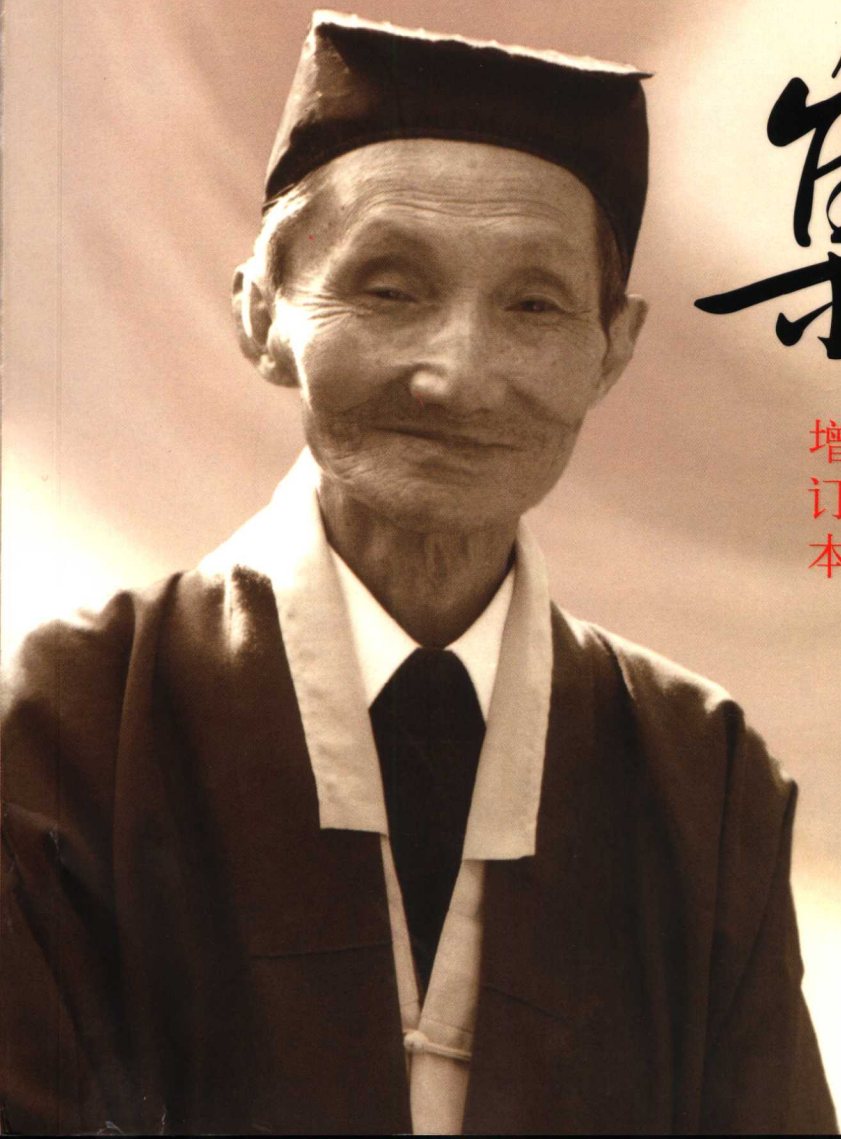
上海辞书出版社

道风集

增订本

——道教的发展和道士的修养

道纳同诸位道友能够共同弘道至今，直赖神灵的护佑、祖师的嘱托、同道的关心和
支持。但愿神灵、祖师和同道都能够护佑你我，支持你我，为弘扬道教信仰，发扬中华
文化，凝聚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世纪出版

我们学道为人，首先应该是为全社会的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学道为人就是要为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有八个字，“齐同慈爱，异骨成亲”。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普天下的人都“慈爱”，都像亲人一样……赵朴初先生和中国佛教协会提倡人间佛教的精神，有八个字“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个“有情”指的就是人，使人民群众得“利”得“乐”。在这一点上，学道为人和学佛为人，应该是完全相通的。

ISBN 7-5326-2079-4



9 787532 620791 >

定价：25.00元

DAOFENGJI

DAOJIAODEFAZHANHEDAOSHIDEXIUYANG

ZENG DING BEN

陈莲笙 著

上海道教协会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道风集

道教的
发展和道士的修养
增订本

样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风集:道教的发展和道士的修养(增订本)/陈莲笙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9

ISBN 7 - 5326 - 2079 - 4

I. 道... II. 陈... III. ①道教—中国—文集②道士—修养—中国—文集 IV. B9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8243 号

道 风 集

——道教的发展和道士的修养

(增订本)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 ewen. cc www. cihai. com. cn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625 插页 6 字数 178 000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26 - 2079 - 4/B · 83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5418000

作者简介

陈莲笙，生于1917年。上海市人。出身道教世家，历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上海道学院院长、《上海道教》杂志主编、上海市宗教协会理事、上海市政协常委，《藏外道书》顾问、《中华道教大词典》顾问、《中华道藏》总顾问。现任中国道教协会顾问，上海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著有《道风集》，主编有《道教大辞典》（上海辞书版），合作主编有《道藏要集选刊》（十册）等。

责任编辑 陆海龙
施嘉喆
整体设计 何香生

2000年11月14日，上海城隍庙举行陈莲笙住持升座暨城隍开光仪式。图为陈莲笙道长在大殿内升座。



陈莲笙道长在道童侍卫下走进上海城隍庙山门，步向大殿。



上海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陈莲笙为财神像开光洒净。





1994年7月，陈莲笙会长（左六）在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成立新闻发布会上。

1989年7月，上海道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莲笙道长（右四）等在上海道学班首届学员毕业典礼上与学员合影。



1999年10月，上海市宗教局马定华副局长（左五）、上海道协名誉会长陈莲笙道长等与新一届领导班子合影。

中国道协副会长陈莲笙（左二）、闵智亭（右一）、谢宗信（右二）等在五届七次常务理事会上。



陈莲笙道长（右二）与闵智亭道长（左二）、黎遇航道长（右一）等合影。

陈莲笙道长（左三）于2002年11月在“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上。





1998年8月，陈莲笙道长(中)与来访的香港蓬瀛仙馆主席黎显华一行合影于上海城隍庙会议室。

1998年8月，陈莲笙道长(左二)与香港蓬瀛仙馆主席黎显华、卢维干以及新加坡季至胜先生合影。



1997年10月，市宗教局吴孟庆副局长(前右三)、市道协陈莲笙会长(前左三)、史孝进秘书长(后左四)等与著名道教学者卿希泰教授(前中)合影于上海白云观。



上海市道协陈莲笙会长接待香港道教联合会参访团（1998年）。



上海市道协名誉会长陈莲笙与台湾高雄道德院参访团互赠礼品（2000年）。



1997年，陈莲笙会长（中）等与来访的美国宗教界代表团成员在上海城隍庙合影。



1992年，陈莲笙道长在苏州拙政园留影。

1997年，上海道协陈莲笙会长（左三）与中国道协傅元天会长（中）等合影于四川青城山。



1993年，陈莲笙道长（中）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1983年，陈莲笙道长在泰山留影。





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接见市宗教界代表时，与陈莲笙道长亲切握手。



1995年5月3日，陈莲笙会长陪同全国政协宗教视察团视察上海城隍庙后留影。



1998年，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前左二）视察上海城隍庙，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前左一）、秘书长史孝进（前右一）等陪同。



1996年10月10日，国家宗教局、中国道协为中国道协副会长、上海市道协会长陈莲笙道长祝贺八十华诞，图为陈莲笙道长向叶小文局长（右）等致答谢词。



上海市宗教局吴孟庆副局长在致祝寿词。

1996年，陈莲笙道长八十华诞时与来宾互赠礼品。



陈莲笙道长在来宾的祝贺声中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增订本序

十年以前，道衲年届八秩，上海道教协会编撰和出版了道衲的文集，集名为《道风集》。

如今，道衲又同众道友共同弘道十载，年届九秩。上海道教协会应海内外道友的要求，又以原《道风集》为基础，增收道衲近年来所言所述所文，编成此《道风集（增订本）》。

十年来，中国道教恢复振兴，发展弘扬，其规模与声势均系百余年来所少见。道衲一直处在振奋、感动和忧虑之中。

言及振奋，那是因为上海和各地道观重修的重修，新建的新建，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也是二十年前，道衲不敢想像的。

言及感动，那是因为比肩接踵的信徒进庙烧香祭拜，一批批青年道士踏上了神职岗位，道士在社会获得尊重，道教的历史和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研究，道教经籍和书文不断涌现。所有这些，也是二十年前，道衲不敢奢望的。

大道之行，自有必然。当人们根据历史经验教训，社会终于顺道而行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奇迹。百业兴旺，人

民幸福，社会安定，前途灿烂，举世瞩目。二十年来中国道教的发展正是中国奇迹的一部分。

道衲欣逢盛世，自然欢欣鼓舞。但是，《道德经》教导我们“祸福相依”，因此，道衲也不无忧虑。

道衲之忧虑有二：

一是当代中国道教在复苏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道教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道衲以为，归结起来，就是人们在议论的“世俗化”和宗教要求的神圣化的矛盾问题。拿道教的管理来说，协会管理采取的是社会团体管理办法。道观管理就复杂一点。不少道观还沿用历史上的方丈和住持为主的管理制度，有的虽然建立了道观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可是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是虚的，而方丈和住持的管理则是实的。但是，不管是实的或是虚的，目前的道观管理，往往是沿用世俗的办法多，而注意保持神圣性的少。据说一些道观对于道士和职工的上下班采用了“打卡”的办法。打卡需要编号，于是，道观的道士除了法名和职名以外，现在还多了一个数字号码代表。道观内部管理使用人名编号，无疑应该赞成。可是，有的道观还把编号制作成牌牌，要求道士上殿的时候挂在胸前。于是，在某些道观中出现了某某号道士的说法。道衲忧虑的是，道士的神圣性一旦被丢弃，那么其后道观、神殿、神像和科仪的神圣性就堪忧了。

二是当代中国道教的神职教徒即道士在成长中出现

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道衲以为，归结起来，就是人们议论的道士理应具有坚定的道教信仰的问题。前几年，有一种说法，称道士不能再叫自己是贫道，而应该叫富道，有的甚至还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套用到道门内部来。道士的修炼，不能再茅篷草屋，忍饥挨饿，这是对的。道观的装备需要同社会接轨，汽车、电脑、电话、电视、网络等等，如果确有必要，无疑都应具有。因为，没有就不利于道士的修道生活，不利于同社会相适应。今天道士的生活和道观的设置同历史上道士的修道生活，同过去的道观设置相比较，无疑是大大的富裕了。于是，某些地方的道众就以为道士应该称富道了。道衲积几十年学道生活的经验，体会到“贫道”的“贫”的本义并非是“贫穷”的意思，而“道”的本身就是包含天地万物，是涵盖天下的，因此学道、修道和弘道的本身就是普天下最富足的事情。但是“道”又是“俭”的、“啬”的。《道德经》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治人事天莫若啬”。俭是节俭，啬是爱惜。以这样的教导来要求我们，我们是富足的，但是我们要节俭；我们是涵盖天下的，却要谦卑地不为天下先。因此，道门的修道生活在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中应该总是处于低水平，应该永远是低调的。更何况今天绝大多数山居道士，其修道生活还十分艰苦。他们仅有的一些设置也只是为了弘道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奢求，更不是与社会攀比。从这个意义上

说，“贫道”只是一种谦虚地表示自己是个不敢为天下先的修道学道人而已。这里，就是关系到一个学道人是否真正认识和理解道教信仰的问题，关系到道心是否坚定的问题。道心坚定，这对于青年道士，特别是道教的青年领袖们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他们的上梁正了，道教才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道衲同诸位道友能够共同弘道至今，直赖神灵的护佑、祖师的嘱托、同道的关心和支持。但愿神灵、祖师和同道都能够护佑你我，支持你我，为弘扬道教信仰，发扬中华文化，凝聚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道风集》增订本序。

陈莲笙

2006年春

原 序

余弱冠入道，深知道教义理之深邃，道术变化之奥妙，斋醮仪范之恢宏。做一个道士，唱念做之技艺件件要驾轻，琴棋书画之功夫桩桩要就熟。因此，做道士很难。

学成之后，余厕迹于海上道门，出入于社会各阶层。在旧社会熟睹十里洋场，风雨飘摇，深知社会变化之迅速，生存之维艰。因此，道教之生存也很难。

今，余已耄耋之年，欣逢盛世，国运昌隆，人民安泰，道教亦有振兴复苏之兆。瞻前思后，感慨万千。十余年来，余思之甚者，以当代道教之发展为最；十余年间，每有所思，即述之以文，随作随发。今有幸汇集成册，所述一言以概之，即当代道教之发展与道士之修养，故以名集。

《道德经》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余尝思之，道教之生存与发展犹“水”也。水者，流也，着赤即红，着墨即黑；注于斗斛则状规，泻于环器则成圆。至柔，却能滴穿金石；洒地，则又无孔不入。道教之存续不能企望于对社会提出要求，而只能磨炼自身去顺应时代之变迁。大江东去，波涛滚滚，在“利万物”中寻

找自身之栖泊和浸漫。《西升经》云：“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们不必怨天地，又何必羡慕他人。道教的生存和发展，就要看道教自己是否“争气”，就要看我们当今的道士是否适应社会，把握自己。为了适应社会，把握自己，我们欲做之事多不胜举，只能企盼同道挑起振兴之重担，奋起直追。

天地之间，水乃流之不尽，割之不断，堵而不住，泻而千里之物。道教亦是如此。

陈莲笙 谨序

1996 年春

目 录

增订本序·····	1
原序·····	5

总 论

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关于中国道教文化 的当代发展的三个问题·····	3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	12
迈向新世纪——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	22

道教徒修养讲座

第一讲 奉道行事·····	33
第二讲 爱国爱教·····	39
第三讲 学道为人·····	44
第四讲 多行善功·····	49
第五讲 我命在我·····	53
第六讲 斋醮度人·····	58
第七讲 众术合修·····	63
第八讲 适应时代·····	69

道教宫观管理讲座

第一讲	重视管理	77
第二讲	分清脉络	82
第三讲	选拔人才	87
第四讲	健全制度	92
第五讲	发扬民主	97
第六讲	集中统一	102
第七讲	奖惩监督	108
第八讲	道法自然	113

道教与当代社会生活

机在天地，亦在人心——从“机遇”说起	121
无为治道，有为治人——从“干预”说起	125
生活日趋富裕，精神保持清虚	130
炫耀和养晦	136
不满和知足	142
无为和管理	146
血脉贯通，百事兴旺	150
继承传统和适应社会	155
社会需要和自身价值	160
索取和奉献	164

讲 话

道教徒同样也能为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	171
正在顺应时代变化的道教·····	175
恢复和健全道教正一派教戒规范制度·····	181
在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189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192
不断进取的十年——庆祝市道协成立十周年·····	196
度人先度己·····	206
上海道教正在努力适应当今社会·····	211
百年国耻，一朝洗雪——庆祝香港回归有感·····	217
在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20
珍惜大好形势，弘扬道教文化——纪念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222
坚决拥护党中央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英明决策··	228
光辉的五十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	230
在上海市道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	237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	240
在上海城隍庙住持升座典礼上的开示词·····	244
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八十华诞·····	247
在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49
中国道教也会走向世界——从意大利客人来上海做道场 想到的·····	251

其 他

海上白云观·····	257
追念宋祖德道长·····	262
缅怀傅元天大师·····	263
怀念龚群先生·····	267
怀念侯宝垣同道·····	273
《中国龙虎山天师道》序言·····	274
《庐山道教述略》序言·····	276
《道教神仙故事》序·····	278
《道教神仙信仰》序·····	282
《葛仙山志》序·····	285
《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毕业论文集》代序·····	287
《人生赠言》序·····	290
《道教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会议 （上海）论文集》序·····	292
增订本后记·····	294
原后记·····	296

总 论

培养人才、加强联合、适应时代

——关于中国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的三个问题

近十几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国道教出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各地道观整修开放；道教活动得到恢复；一些老年教徒积极整理遗产，著书立说；一批有信仰、有文化、有朝气的青年道士培养成材，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教内外编撰出版的道教书籍在社会上发行，引起重视。看到这些，我们作为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老道士是十分高兴的。

学术界有的朋友说，现在是近百年来道教发展的最佳时节。对此，人们尽管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是，这一说法包含的丰富含义却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对待的。因为，它指出了道教近百年来出现的衰势，它评估了近十几年来我们已经作出的积极努力，它希望我们能抓紧时机努力发展道教文化。

（一）道由人显

道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几千年的历史说明，道教的发展同道教人才的涌现、道教徒素质的提高有密

切的关系。

东汉末期，因为有张角和张陵，道教才具有了自己的组织，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有葛洪、寇谦之和陆修静、陶弘景，道教教义才系统精密起来，其仪式才得以恢宏大观。

唐宋金元明等朝代，道教中人才辈出，连绵不断，成玄英、司马承祯和李筌的哲学精论，孙思邈的医道大著，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宏论集粹，林灵真、王契真和金允中的仪规大成，雷思齐的引易入道，张宇初的博学精深，正统万历的《道藏》编纂等等，同道教在这一时期的隆盛相映成彰。

可是，清代以来，道教出现了衰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道教缺乏人才，道教徒的素质低。清代的全真龙门派出了一个王常月，王常月广泛搜罗人才，传戒千人，于是龙门派出现中兴。龙门弟子的足迹，东至江海，南至南粤，直到云南边境。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只要有人才，衰势中可以出现盛事。近代上海道教随着城市发展也有大发展，庙观数量增多，从各地来的道士也迅速增加，最多时达到数千人，但是，上海道教对中国道教发展的贡献并不大。

上海在建国前曾一度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社会矛盾和东西文化的矛盾都很激烈，但是由于缺乏人才，因而上海道教既没有提出如何适应社

会生活的思想和著作，更缺乏介入社会矛盾和东西文化矛盾的实际行动。

上海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解放前都出版过许多书籍和杂志，但是，上海道教却从不宣传自己，动员信徒，人们经常说到的上海涵芬楼《道藏》是文化人士筹划实行的，《扬善》和《仙道月报》是翼化堂主张竹铭主持的，由陈撷宁先生参与执笔。

上海道教在二三十年代曾有过辉煌时期，涌现了一批有才能的小道士，但是对于他们的培养是以传徒的方式进行的，师傅的水平限制了青年道士的视野，而且当时教的只是斋醮仪范的基本功，因此，这些青年道士的总体素质受到很大局限。

近代上海道教应该对于中国道教的发展作出贡献而未能，其根源只能归于上海道教的人才缺乏和素质不高，它从另一个侧面又说明，盛况却无力扭转衰势。

道由人显，道教的存在归根结底依靠道教徒的存在。道教的发展也取决于道教徒素质的提高，道教人才的多寡。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竞争的时代，道教也处在竞争之中。太上要我们“不争”，“不争”只有经过“竞争”才能达到，如同只有“有为”才能“无为”一样。当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要大力注意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启用人才和留住人才。我们不能要求当今培养的青年道士个个成材，但是，我们如果能自觉去提高道教徒的总体素质，使他们有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的赤子之心，有坚定的道教信仰，有遵纪守法的道德水准，有精通宗教生活的道学修养，有中等以上的文化水平，有参加社会生活的活动能力，有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创造能力。如果我们有一批这样的青年教徒，选择其中的先进者，将其推上教职，那么，我们道教就会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二）结伴行道

中国道教的历史上，由于师承和地域的差异，教内一直存在不同的宗派。它们虽然都宗始于“道”，但是经典传承、仪范规戒和道术侧重等方面都有不同。有派别，并非注定是坏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之变也是事物发展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各派相互融合吸收，相互容忍，因此，道教的教义、仪范和道术出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金元时期，全真和正一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借鉴，两派都得到发展，南北道教都得隆盛。因此，道教各派如能合作就能发展，这是历史的事实，借用全真祖师王重阳的一句话，就是“合道伴”。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发展急剧变化，我们的前辈急于寻找出路，1912年7月15日从北京、上海、沈阳、西安、淮安、武汉、千山、闾山、武当山的各大全真道观来的住持，在北京白云观联合发起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9月19日江西龙虎山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会同上海和

江苏等地的正一派道教徒在上海关帝庙成立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两个道教派别各自成立的全国组织，各自向当时的国民政府递送呈文。我们的前辈选择了一条派别对立而不是联合的道路，各自为政，分散力量，延续几十年，给道教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记住。

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汤国华先生有句名言：全真派和正一派，是一个老太爷的两个儿子。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既是兄弟手足，那就要休戚与共。家和百事兴，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宗教也是如此。佛教的宗派比我们道教的多得多，各派的差异也不比道教的小，但是，佛教从辛亥革命起，就是一个组织，一套班子，尽管内部矛盾重重，这样就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使佛教作为一支社会力量活跃在社会生活中，这也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在近十年的恢复过程中，上海道教还大量联合了一切同情和关心道教的朋友的力量，邀请他们参加道教活动，分别请他们顾问法律事务，培养道教人才，组织社会活动，筹划宫观修复等等。从目前上海道教人才不足的现状出发，这是必不可少的。傅元天会长在1989年全真传戒法坛上的讲话，曾将道士列为五种，即：道士、学士、隐士、居士和信士，其中包括了社会上一切信道、奉道和同情道教的人。我很赞成，因为，这是一种联合各方面和各层次力量来推动道教文化发展的观点。

当代社会是一个合作时代，采取措施吸收越来越多

的人在我们道教周围，我们的道教才能发展。有人说过，一个企业家的本事不在于有多少资金，而在于能调动多少资金；不在于手下有几个人，而在于能利用多少人。这种说法是有时代精神的。道教发展的关键也在于我们的队伍自己有多少人，还有多少朋友和如何利用社会的力量。

（三）道法自然

我们道教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有些根本的东西，例如对“道”的信仰是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成其为道教了。但是有些东西又是变化的。我们的经籍原来只有几本，现在已经成“藏”了。我们的科仪和道术原来也只有几种，现在繁衍到可以演习几天几夜。我们的名山宫观原来结草为庐，现在是雕梁画栋、宾馆设备了。我们的衣冠法服也同东汉时代的有了众多的区别。所有这些区别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时代变化造成的。

辛亥革命时期，北京和上海的全国道教组织都意识到了随着时代变化道教也必须变化的道理。北京的《宣言书》称，“道教为中华固有之国教，国体革新，道教亦应变制”。上海的《发起书》也称，“兹当民国初立，万事维新，国体亦已更新，教务亦当整理”，“当此时代过渡，难御世界风涛，若无群策群力，何能斯振斯新”。这就是说，道教如果不适应时代的变化，就难以抵御世界风涛，更谈不上振兴了。当今的时代，无论是物质和精

神文明的发展速度，都远远超过辛亥革命的时代。当今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其意义也并不亚于1949年的政权革命。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物质、精神和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动，我们面临的形势比起辛亥革命的时期更要深刻得多。中国道教必须适应时代，必须改变，而且事实上也已经在变。

道法自然。这是太上的至言。自然这个词包含着自然界和社会的丰富含义在内。道应该是变化的而不是凝固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支持变化的而不是抱残守缺的。

从上海和江南地区道教的实际情况出发，道教面临的改变课题是广泛而复杂的，至少有下列五项：

一是教义思想必须增加新内容。将道教信仰和当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在宇宙观、社会观、善恶观和神仙观等方面回答当代道教徒关心的问题，对道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教义的解释。

二是宗教生活必须作出新调整。根据当代道教徒的要求，对科仪和道法的内容作出取舍，淘汰不合时代的，新增教徒需要的。

三是教徒规戒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根据社会要求和教义思想，制订符合当代生活实际的规戒，既把持教徒队伍的纯洁，又能吸引朋友和留住教徒。

四是积极进行各种服务社会、壮大自己的道教事业活动，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为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服务，



陈莲笙道长在上海白云观老君堂（1996年）

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出版道教经典和书刊，建立和扩大同教徒信众的联系，为教徒排忧解难。

五是在团体和庙观管理中，借鉴社会成功的经验。培养人才，鼓励竞争，提倡民主，奖勤罚懒，不断增强道教发展的活力。所有这些道教如何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课题，都不是书斋的空谈，而需要我们不断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们道教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

1912年北京白云观发表的《宣言书》，曾经批评当时的一些道士“深林寂壑，痼癖烟霞，蓬莱方丈，谬托神仙，理乱不知，黜涉不闻，于物于民胞毫无系念，自以为计则得矣，如苍生何如，世界何尤。其甚硁硁者自守，顽石难移”，这些道士听到“天演之如何淘汰，人群之如何进化”就“掉头不顾，充耳不闻，无怪乎道教为社会

所鄙弃，地方所摧残，自侮人侮，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明白前辈道人对道教某些内部倾向的尖锐批评，都是出于对道教发展的忧虑以及对道教事业的责任心。

今天的道教徒比起清代末年的道教徒的素质，已经大大不同了。那时存在的问题有不少都已不存在了。这里，引用它作为结束语，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在培养人才、加强联合方面下功夫，我们在这个竞争的时代里，只会落得“为社会所鄙弃，地方所摧残，自侮人侮，势所必至”，岂有它哉！

以道德之力振兴道教

近百年来，人类物质文明之发展，日新月异，前所未有。人类正在竭尽全力地试图去认识自然，掌握自然，乃至有人企图去创造自然。

与人们重视物质文明的程度相比较，似乎人们对于自己的精神文明之发展的关心和重视程度实为不足。人们对于社会和精神的认识程度，远不如对于物质文明之发展的认识程度。它表现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人们往往只知道从自然索取，却不知道保护和付出，于是自然生态受到破坏，最后受到自然的惩罚。至于有人企图再去创造一个自然，必然是以牺牲一个现实的自然为代价。这就是得失相依的“天道”。另一方面，它表现于人和人的关系上，人们往往只知道向社会索取，却不知道付出和奉献，于是当今的人类社会出现了许多物欲横流、金钱万能、鱼肉他人的丑事和坏事。

我们道教处于如此的世界之中，有些道教徒感到困惑，不知所以，有的则道性迷惑，随波逐流。如此一来，我们道教徒就同一般民众混而为一、没有区别了。“道士”应该是“有道之士”，混同了就变成了“道民”、“道工”、“道商”。道教的信徒一旦失去了“道”的本性，那

么“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社会上就失去了教化的功能和存在的依据，其结果就是逐趋衰落。

为了摆脱衰落，振兴道教，辛亥革命后，道教界许多前贤都曾做过设想、做过努力。有的从建立组织方面，例如，民国初年北京白云观和江西龙虎山都曾企图建立全国组织，以团结道教界的力量；有的从参与生活方面，例如，陈撷宁等就曾在1947年发表了《复兴道教计划书》，提出从“讲经、道学研究、报刊、图书、道书、救济、修养、农林、科仪”等九个方面，以参与社会，活跃道教生活。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重要的。

当今的社会是个有组织的社会，道教要适应社会生活，首先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而要组织起来。其次，道教有没有活力就看它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如果道教徒只知道关在庙门里面，只顾自己修炼成仙，不关心民众，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民众支持你的修性和关心道教的未来呢？因此，建立组织和参与社会都很重要。

道教在建立组织和参与社会中，重要的是以“道教”的宗教功能和“有道之士”的身份。离开了“道”，道教和道士就混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和一般民众，不论为道教和社会做多少好事，都体现不出道教的特点和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持“道”的信仰特点，体现道士的精神风貌，是在当代社会中振兴道教的关键所在，而保持信仰特点和体现精神风貌就要依靠我们道德的力量。

（一）贵在自觉

我们的道教是有信仰的宗教，它以“道”为核心，以得道为目标。有道之士“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这里的“不言之教”就是靠我们的“行”表现出来的。我们的行就是要体现“道”的信仰，就是处处要做符合自然和符合社会要求的事。

一些山居的道观，在恢复宗教活动时，注意植树、种花，保护环境，开发旅游，吸引信徒，也能保护山道和搞好庙观的卫生，保持山居的清静、修道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些符合天道的事，天道也赋予我们好的自然条件。

一些城市的道观，在恢复宗教活动时，注意到燃烧物的烟火和仪式时诵唱音乐的音量控制，并且以财力和人力支持城市的环境保护、绿化和消防等事业。我们做了符合天道的事，天道也赋予我们好的环境。有道之士，身体力行，热爱自然，保护环境，那么，我们的信徒就会从我们的“行”中受到不言之教。

《道德经》说到“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二十七章）。正因为如此，道教历来没有其他宗教那样有讲经、讲道这些做法，但是这不等于说，道教不要宣传和讲述教义，不过，这种宣传主要是靠我们的“行”。用一句现代的话说，就是靠我们在信徒心目中的形象，而形象的树立就是靠我们做什么以及我们怎么做。

《道德经》（八章）说得很清楚：“居善地，心善渊，

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由此可见，对于道教徒的行为，太上的教诲的关键是一个“善”字。一般人理解“善”是善良的意思，古语说“乐善好施”，就是讲的要帮助他人、救济穷人，乃至不于不屠宰生灵等等。可是太上的教诲远远超出这个内容。“动善时”就是我们所做的要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落后于时代，更不能拉时代的后腿。“与善仁”就是我们符合“仁”的要求，任何事情都要有利于人，当然也有利于己，不做那种有利于己而不利人的事，更不做那种于己于人都不利的事。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具有这样的胸襟，实在很难。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到。就怎么做而言，我们道教徒要以“善”心做“善”事。“心善渊”就是我们道教徒的心肠善得如同百丈深水。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对于我们道教的事，都要心“善”，对于同道的事和信徒的事都要有“善”心，对于别人的困难要帮助，对于别人的灾难要同情，对于别人的努力要支持。“言善信”，就是要求我们道教徒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忠于自己的信仰，又真诚地对待自己的道教徒，行为不失分寸，承诺不失信用。如果我们的道教徒能够按照太上的“善”字去规范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道教和道教徒在民众中的形象就真正发挥了道教这个宗教的功能，起到了作用。一旦我们得到了教徒们的支持，我们就不愁有事没人做，有难没人帮，有庙没道士，有道士没烧香，有烧香没信仰，有信仰没人

关心，也只有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的道教才会振兴起来。

当然，要按太上的“善”字去规范一举一动，就需要我们道教徒的“自觉”。这个“自觉”，就是要自觉地去理解太上的“善”的内容，同时，自觉地按太上的“善”去做。我们道教徒常说：修道和得道，根据我几十年学道的体会，修道就是修一个“自觉”，得道就是得一个“自觉”。一旦万事“自觉”，一言一行都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了，那不就是“得道”了吗？一举一动都按太上《道德经》的话去做，那不就是“道”的体现了吗？

（二）重在自立

太上垂示《道德经》之中，指出天道运行、前代和后代之间会有许多变化，所以《道德经》并不规定各个时代具体的“道”和“德”的内容。这个具体的内容，就要我们学道的人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自己去规定，这就是“自立”。

《道德经》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五十四章）太上说到修道的五个范围，从修身逐渐扩大到家庭、乡里、国家和天下等领域，显然人在这五个领域里行为的内容是不同的，因此，道德的表现也是不同的。但是，太上并没有规定五个领域的“道”和“德”的内容，这个具体的内容要求

我们后世的修道之士自己订出规矩，这也就是“自立”。历史上，道教在不同时期都有许多清规戒律，这些规戒也是前贤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制订出来的。历史上的这些规戒有些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生活了，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学道的人根据当今的社会状况在执行规戒时订立一些新的章程，这些章程可以由教徒个人自己订，也可以由道观订，当然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由统一的天道教组织颁布。但是不论如何都需要由我们学道的人“自立”。

学道人的自立，首要的当然是立修身的内容。当今的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许多山岭深处的道观都已经有了电话、电视和广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越来越小，企图隐居脱俗的学道者，入山后也往往不尽人意。在这种情况下，学道修身就要如同北魏侯楷所说的“道在方寸，何必山林”，也就是说要强调自己的方寸有道，而不依赖于山林环境。方寸有道，就是自己头脑里有道，即使置身于车水马龙之中，仍可以一尘不染。

方寸之道，道在三宝。《道德经》六十七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对人而言，思想上保持爱心，一生学道还要带动周围信徒共同学道。《度人经》说：“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对于一切并无血缘关系的人都视作血亲，那是学道者人际关系的境界。如果遇到人际矛盾，则以“道”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做有利于社会和宗

教的发展的事情。

“俭”对己而言，思想上保持清虚，一生以学道为目标，而不以积敛财富、挥霍耗用为目标；生活中保持勤奋，一生以修道和传道为宗旨，而不敢稍有怠惰。如果稍有积蓄，则用于服务社会、弘扬道法，做一些有益于民众、扶贫救急的事情。

“不敢为天下先”，对天下而言，思想上保持积极的进取之心，一生坚持不懈地学道。《道德经》七章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敢为天下先，并不是甘为天下之后的意思，而是为而不露、行而不耀，积极进取，自然“后其身而身先”。如果天下人都学道，我们的学道要有“身先”的水平；如果天下人都不学道，我们仍要坚持学道、修道，以成“身先”。

对于我们来说，“修身”是头等的事，只有身修，才可能谈得上治家、治乡、治国、安天下。

当然五个领域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同一而语，然而“三宝”却是贯穿于其中的共同的原则。

（三）贵在自拒

我们的前贤说过：“知道易，信道难；信道易，行道难；行道易，得道难；得道易，守道难；守道不失，身长存也。”守道不失，就是我们信仰坚定、修道得道的表现。当然，守道不失的关键是一个“守”字。之所以要“守”，是因为有外道之物在“攻”，因此，我们学道的要

守得住，就要能够“自拒”。

古人还说守道之难有九，“衣食逼迫一难也，尊长邀拦二难也，妻女牵缠三难也，名利萦绊四难也，殃祸横生五难也，盲师约束六难也，议论差错七难也，意志懈怠八难也，岁月蹉跎九难也”。这个九难是古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概括而言之的。以今天修道之难相比较，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了。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化的丰富，精神文化的多样，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等，都远远超过古代，因此，在当今社会里，一个学道之人要“自拒”也要比过去难得多。以我个人的学道经验而言，在当今社会里自拒的东西主要有三：钱财、女色和名利。

以“钱财”而言，当今社会是商品社会，分工细致，与过去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社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人无钱财不能生活，道教无钱财也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拒斥钱财和否定钱财是不合理的。《道德经》八十章里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在当今是离不开“钱财”为基础的。我们学道的人要拒绝的是“钱财欲”。首先，钱财并非万能，至少生命、健康、光阴、感情、品质之类的世俗之物是买不到的，至于“道”那更是买不到的。其次，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积财之家常常是妻儿争斗，灾祸丛生。所以，只要钱财之足以度日，维持学道就可以了，所有积余应该取之于“道”，用之于“道”。

以“女色”而言，道教两派各有制度，各有道理，不

可偏执。修道之人应该根据自己信仰所属宗派坚持戒规。当今社会是开放社会，电视、电影和文学作品涉及男女感情之事者比比皆是，所以要让后学不接触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学道的人要拒绝的是“女色欲”，一种变态的、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情欲。

以“名利”而言，当今社会是有组织的社会，有组织就有领袖，就会有社会地位的差别，因此，要绝对平均，拒斥名誉和利益的不均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学道的人要拒绝的是“名利欲”。名利也是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走的东西。历史上多少高官显爵，有几个传名于世、降利于后的。只有那些不务虚名和眼前利益的贤者，为民族和民众做出了贡献的才永远为后世所铭记。所以，我们要少讲多做，不务虚名，脚踏实地，只做实事，修道弘道。

概而言之，“自拒”的关键是“无欲”。欲望和一切非分之想，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所有个人灾祸的根源。太上在《道德经》（四十六章）中早就告诫过我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所以，不知足的欲望是我们“守道”的最大危险，也是我们“自拒”的主要内容。太上说“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学道之人如果做到“无欲”，不为钱财、女色和名利所诱惑，那么我们的一举一动就能够影响信道的民众，教化我们的信徒。反之，如果我们的道教徒醉心于追逐这些欲望，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希望信徒们来支持和振兴我们的道教呢？

北魏侯楷的老师正懿先生说过：“道非知之难，行之难也。果能始卒无替，道在中矣。”这就是说要知道“道”并不难，难就难在按“道”办事、行“道”。如果能够自始至终坚持行道，那么“道”就在修道人的心中和身上了，换言之，那个修道人应该说就是“得道”了，即使那个修道之人处身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和人际关系的蛛网之中。

我以为，如果我们道教界，特别是年轻的后学之中，有一批这样得道的粹秀，那么随着中华民族经济的腾飞、社会的安定和文化的发展，我们道教是会得道振兴的。

迈向新世纪

——关于新世纪道教弘扬与发展的思考

20 世纪即将过去，新的千年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下一个世纪，正是社会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世界信息化的时代。新的世纪，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古老的道教也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纪。新世纪的道教，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如何更好地弘扬与发展，这都是我们道门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概括地说，新世纪的道教，在自身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强道风建设、组织建设、经济自养和人才建设；在政治方面，必须进一步强调爱国爱教、适应社会。这些都是道教弘扬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一、道风建设是道教发展的形象

新世纪的道教，道风建设仍然是道教弘扬与发展的一项基础工作，因为道风建设直接关系到道教的形象。

当今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不同程度影响着道观，也影响着道观中的道教徒。因此，有人认为“现在搞市场经济，只要能挣钱，其他都可以不管了”，这种想法，不仅违背了道教的信仰准则，

也与政府有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直接影响到道教的道风建设。

道风建设，包括信仰建设和制度建设两方面。新世纪的道教，首先要树立正确和纯洁的信仰，道教徒要通过自己的修行，淡泊名利，纯洁心灵，与人为善，坚持正信，树立良好的信仰风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我们道教徒来说，应以信仰为重，把信道作为我们的人生宗旨和行为准则，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是“道”，在我们道教徒心目中，惟有“道”才是最永久的东西。世界上无论什么人都有追求，但由于各自的天资知见之不等，所以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就自然有所不同。有人追求名利，有人追求金钱，有人追求物质，也有人追求享受，而我们道教徒追求的则是“道”，对“道”的研持、学修、弘扬，才是我们道教徒的职责。但是，我们的信仰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仍然保持其纯正的信仰，使我们广大道教徒真正成为有“道”之士。同时，为进一步加强道风建设，还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规戒制度。鉴于道教历史上的传统规戒，有些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道教发展的需要了，因此，有必要加以调整、补充和完善。道门诸多有识之士也都期望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教制规戒，来完善道门的管理制度，肃穆道仪，端正道风，促进道教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既是时代赋予我们新一代道教徒的责任，也是道教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

新世纪道教的道风建设，既是道门自身形象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又是新时代道教自身形象的内在素养的表现，它直接关系到新时代道教的弘扬与发展。因此，我们道教徒责无旁贷，一心向道，既要加强道教的信仰建设，又要做好道教的规戒制度建设，做到“人行道不违戒”。

二、经济建设是道教发展的基础

经济，既是道教解决自养的需要，又是道教弘扬与发展的需要，当今社会如此，新世纪的道教同样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经济建设已经成为道教弘扬与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经济建设对道教的弘扬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新世纪的道教，也将伴随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走进21世纪。新世纪的道教徒，既要弘道兴教，又要努力为社会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要充分发挥道教的优势，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凡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道教的，就应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只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解决道教的自养问题，才能有利于道教队伍的稳定，才能更好地弘扬道教文化，发展道教事业，才能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当然，在我们道教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时，首先想到的是回报社会。我们道教界要发扬“济世利人”的优良传统，积极为社会服务，要从有利于建设国家、繁荣经济、造福人类出发，兴办一些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如兴办各种形式的养老院、幼儿园、学校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道教应有的积极作用，真正做到服务人群，善导众生，造福社会。同时，我们还要以各种形式支持、鼓励广大道教信徒，在各自工作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服务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

在市场繁荣、物质丰富、经济高速发展的新世纪，人民生活水平将会大大提高，道教宫观的经济也自然会得到较大的改善。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我们广大道教徒，在弘道兴教、服务社会的同时，精神上要保持“清虚”，要遵循教祖“道法自然”的教诲，做到清心寡欲。我们学道之人，充分享受着“天道”的恩惠，那就让我们敞开胸襟，像山谷和大海一样对待这个高速发展的物质世界，要多行善功，广结道缘。

三、人才培养是道教发展的关键

新世纪的道教，必须把人才的培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因为人才培养是道教发展的关键。

几千年来的道教历史表明，道教的发展同道教人才的涌现、道教徒素质的提高有密切的关系。道由人显，东汉末期，因为有张陵，才有道教的正式创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有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道教

教义才系统精密起来，其仪式才得以恢宏廓大；唐宋金元明等朝代，道教中人才辈出，连绵不断，道教也得到很大发展。可是，清代以来，道教出现了衰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道教缺乏人才，道教徒的素质低。所以说，道教的兴衰取决于道教人才，道教的存在归根结底也是依靠道教徒的存在，道教的发展，更是取决于道教人才的多寡和道教徒素质的提高。

新世纪的道教，所处的时代是竞争的时代，太上要我们“不争”，但是，“不争”只有经过“竞争”才能达到，如同只有“有为”才能“无为”一样。未来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还是要大力注意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启用人才和留住人才。不仅要提高道教徒的总体素质，而且还要花大力气培养高层次的道教人才。首先，要创建数所道教自己的高等院校，举办研究班，编订统一教材，既要培养一批具有一定学识的教务和管理人才，又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较高学识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还要培养道教弘道、宣教人才，培养道教的外语型人才。其次，各道观建立讲经堂，定期演讲道经和宣传道教真义。同时，还要举办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培训班，使广大信教徒也能学习和了解有关道教知识。再其次，要培养跨国道教人才，一方面派出道长赴国外讲学传道，另一方面还要接受国外道教徒、道教学者的留学和深造，要使中国的道教院校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培养道教人才的专门学校。最后，要普及广

大道教徒的高等教育，对专门的教学人才和研究人才要求具有硕士、甚至博士的学历。这项工作需要我们道教界与学术界共同来完成，我们必须依靠学术界的力量。因此，我们一定要广泛地团结一大批道教学者，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为道教人才的培养多做工作。作为道门自身也要全身心地投入，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和刻苦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世纪道教事业发展的需要，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只有这样，我们广大道教徒才能担负起弘扬道教的历史重任。

四、适应社会是道教发展的前提

新世纪的道教，必须把适应社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因为适应社会才是道教发展的前提。

道教是人的信仰，而人都生活在变化中的社会和时代之中。天师道创立正一盟威道，一开始就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魏晋隋唐时期的高道们，都曾接受过皇朝的赏赐，这说明道教在历史上就同朝廷政治有密切联系。金元时期出现的全真道派更是道教顺应时代生活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在道教和时代关系上，只能是我们道教主动去适应时代，而决不是相反。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道教在政治上要坚持爱国主义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在经济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社会，有益民众。这些都是我们道教适应时代的内容。

新世纪的道教，首先，要在教理教义上丰富和发展对于“道”的认识。“道”是我们道教徒的基本信仰，信道、崇道那是不能改变的；但是“道”的内容应该随着时代而丰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时代经济的突飞猛进，丰富和扩展了我们对“道”的认识，我们当代道教徒应该对“道”作出新的解释。要从弘扬道教根本教义出发，进一步丰富发展其教理教义，从而建立起切合社会文明的教义体系，裨益于人类的文明进步。以“道法自然”的教义思想调整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以清静寡欲、柔弱不争的教义思想来平和人的心境，协调过度的利欲纷争。其次，道教的神学观要随着教义思想的发展，成为协调社会、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内容，适应新世纪人们的精神需求。再其次，在道法、道术和道教仪规方面，某些为新世纪社会生活需要的内容，应该发扬光大；某些不适应的内容应该适当调整。如道教的养生理论、延年益寿之法，应该加以整理、充实和弘扬，对仪式的内容、时间和活动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适应时代。

五、爱国爱教是道教发展的方向

新世纪的道教，必须把“爱国爱教”作为我们广大道教徒自身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它是道教发展的方向。

早在1982年，中国道协三届二次理事会就通过了

《道教界爱国爱教公约》，对爱国爱教的具体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所谓爱国，就是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要积极投入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要多服务社会，报效祖国。所谓爱教，就是要热爱自己的道教。要做到爱教，就要有坚定的道教信仰，要有一定的道教学识；还要严格遵守戒规纪律。这些都是爱国爱教的基本内容，是我们广大道教徒必须遵守和执行的。

新世纪的道教，不仅要继续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



上海市道教学习参观团与崂山太清宫监院匡常道长(左四)等留影于三清殿前，右四为陈莲笙道长(1983年5月)。

统，而且还应增加诸多新的内容。在爱国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还要积极引导广大道教信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使他们既成为爱国的标兵，又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在法制化社会中，我们道教徒要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在爱教的基础上，还要积极宣传道教、弘扬道教文化。宣传道教，就是要使道教逐步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宗教；弘扬文化，就是要使道教的优秀文化服务社会，使道教的养生理论造福人类；要把道教经典译成外文，向世界各国传播。同时，还要组建道教历史博物馆，向世人展示道教历史；还应建立道教信息资料库，以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社会，更好地宣传道教、弘扬道教文化。

由此可见，新世纪的道教不仅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且更多的是要适应社会、适应新的时代。要在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积极开拓，勇于进取。因此，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回眸过去，展望未来，对新世纪道教的弘扬与发展进行思考，其目的就是要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旗帜，把一个充满生机的道教带入 21 世纪。

道教徒 修养 讲座

第一讲 奉道行事

我们做道士的常说，我们的道教已经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光荣，因为道教历史悠久。近两千年中，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历史上有多少风风火火的东西都消失了，湮没了，但是道教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道观仍然存在，神像仍然存在，经书仍然存在，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道士一代一代传到了今天。今天，我们还要培养青年道士，使道教继续传下去，直到将来。

社会要发展，时代要变化，一代与一代的道士都不一样。我们这一代的道士和我们的度师就不同了。我们同天师初创道教时代的道士就更不同了。将来的道士和我们这一代比肯定会有更大的变化。我相信更加进步，更加提高，更加有出息。但是，不论有多大的变化，道士总是道士，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作为道士，他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是道士了。这就是一个道士对道教的信仰不能变。一个道士如果连信仰都没有了，那他就不是道士了。即使他还留在道观里，穿着道装，他的心也不是道士了。

有一部经，叫《太霄琅书经》，里面说到“人行大道，

号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士，故称道士”。这段话就是说，按大道行事的人才称为道士。做道士的人，要信仰道，追随道，按道的内容身体力行，奉道办事。不然就不能称为道士。这些话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道士应该有的重要的修养，是做一个道士的第一位事情。

说到“奉道”，大家都知道太上的《道德经》五千言。两千多年来，道门内外对于《道德经》作过上千种解释和研究，现在外国人也都在研究太上的《道德经》，认为包含着许多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道门中的人当然就要更加重视《道德经》。我们这一辈的道士，有些人可以背出上万句经书，像《皇经》和《净坛》、《进表》、《告斗》的经句，但是有些人却不一定背得出《道德经》，那是时代造成的。在那个有些人腰缠万贯、有些人一贫如洗的社会里，“三教”总是和“九流”放在一起的。做道士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能谋生的就学，《道德经》也就不念、不背了。这不能责备我们的度师，也用不着责备自己，这是时代的限制。建国以后，时代变了，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就说过：“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对于道教来说，就是纯洁的信仰。在旧社会里，一些老道士把接待丧家商议道场的安排，称做“讲生意”。建国以后，我们改称为“经忏接待”。表面上看这是改几个字，实质上，反映了我们道教徒修养水平的提高，我们不再把做道场看成是“做生意”，而是

把它看成我们为信徒服务，帮助信徒了愿，使丧家先人早登仙界，也是自己在做善功。当然，因为现在是商品社会，信徒也给我们一点酬劳，帮助我们维持生活，这是正常的、合理的。就是在祖天师的时代，还要交“五斗米”。但是这点酬劳也仅仅是五斗米的水平，维持生活的水平，不是“做生意”。做生意是为赚大钱，要赚大钱千万不要进道观做道士，因为第一不允许，第二不可能。不允许，因为建国后的道教是纯洁的道教，要奉道行事。不可能，因为道教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规戒严肃，制度齐全，不可能在道教内部搞不合法的手段。

说到“奉道”，就有奉一个什么样的“道”的问题。道教用“道”字作为它自己教派的名称，当然，它把“道”作为自己最高的信仰。那么什么是“道”呢？现在社会上有许多解释，所以《道德经》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就是说，可以解说的“道”，就不是永远不变的“道”，不是真正的“道”。俗话说，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道”就是这样的。太上在《道德经》说到的“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为、无所不能的。它“先天地生”，产生在天地之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天地人都要按“道”办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宇宙天地、人和万物，没有一样不是由“道”产生的。“道”又体现在宇宙天地、人和万物之中，因此，“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万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

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之中，只要有形象的、有生命的、有精质的里面都包含着“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无数个发明创造，可以说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道”产生的，都是“道”的体现。人类社会还有许多没有被发明、没有被认识的东西，它们也都是“道”产生的，也都是“道”的体现，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认识和理解那些“道”的水平，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得道”。人们要问，万能的“道”、体现万物的“道”是哪里来的？我们道教徒认为“道”是太上在冥冥之中创造的、规定的。因此，太上就是“道”的化身。我们“奉道”，就是要信仰太上，信仰先天地生的各位尊神，相信是他们创造了“道”，由“道”再衍出天地万物，并且再让“道”体现在天地万物之中。各位尊神在注视着我們，我们丝毫不能轻慢。

说到“行事”，就有一个按什么原则来“行”的问题。经文说“人行大道，号曰道士”，就是指出道教徒行事的原则，是按道行事。按道行事，就是“得道”，不按道行事，就是“失道”。其实世界上人的所有事情，以及由此给人带来的高兴和悲伤，喜悦和忧愁，都是由“得”和“失”两个字引起的。一些追求世俗利益的人，就是希望得到钱，得到名，得到妻儿，或者得到彩电、冰箱，摸彩得到大奖，等等。我不是反对这些利益，因为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总是要和这些世俗利益相联系的。问题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的看法：

第一，不能把世俗利益作为道教徒的行为准则或目标。有人说过，吃饭为了生活，生活不能为了吃饭。我们应该说，吃饭为了修道，而修道不能为了吃饭。如果不能按“大道”行事，而按世俗利益行事，那么我们信道教的人同普通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为了一点做道场的酬劳争吵或闹情绪，那么我们同社会上的争工资、争待遇有什么两样呢？如果我们为了一个职务、一个头衔争吵或闹情绪，那么我们同社会上的争名誉、争地位有什么两样呢？真正按大道行事的人，对于世俗利益的一套东西是绝不追求，也不放在首位的。

第二，不要把“得”和“失”对立起来，绝对化。太上在《道德经》里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辩证法的思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就是说，有和没有，困难和容易，长和短，高和低，声音和音调，前和后，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得和失也是如此。有得到的，就有失去的。有过去得到了，就有现在失去的。有现在得到了，也有将来失去的。得未必是福，失未必是祸。奉行大道的人，就要有这样的气度、胸襟和目光。

第三，要有为道教事业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准备。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政府真心实意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可以说，近百年来道教徒从来没有得到像今天这样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我们现在做道教徒一定要珍惜形势，做一点对得起祖师、对



陈莲笙道长(中)与刘仲宇教授等参访道教发源地四川鹤鸣山留影(1994年)。

得起后辈的事，要有一点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大家想一想，祖天师张道陵为了求道，孤身一人，徒步从江苏经浙江、转陕西最终到达四川鹤鸣山修道。南北朝的陆修静走遍三山五岳，最后在庐山脚下，结茅建观。陶弘景抛弃优厚的做官生活，到茅山建观修炼。他们图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奉道行事”，而做出了牺牲吗？比起他们来，比起现在三山五岳、穷乡僻壤修道行事的道友，我们上海的修道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道教事业的发展多做些贡献呢？

“奉道行事”，是我们道教徒的第一位的修养，切记，切记。

第二讲 爱国爱教

“爱国爱教”，是我们嘴上常说的。有时还同另外四个字连在一起，叫做“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因此，有些同道就认为“爱国爱教”是政府对我们的要求。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因为它的意思是政府要我们这样做，我们是被动的。全面的看法应该加上我们的主动性，就是我们道教徒应该自觉地“爱国爱教”，把“爱国爱教”作为自己行为的一个准则，作为道教徒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把政府要我们“爱国爱教”变成我们道教徒的自觉行动。

讲到“爱国”，大家都知道爱祖国的道理。我们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伟大，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有吃苦耐劳的人民。在当今世界上，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自豪的。但是光有这点认识还不够，因为我们爱国不仅爱历史上的祖国，还必须爱现实的祖国，爱社会主义祖国，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道士，有过旧社会生活的经历。那个社会是剥削人的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而被剥削的人忍饥挨饿、朝不保夕。有钱人家做道场，厅堂华贵，仆婢成群。我也为许许多多终生住在棚棚和阁

楼里的亡灵“开路”，几块薄板或者一张席子，尽管我们做道士的也穷，但是也不忍心伸手拿一点点酬劳。在那个社会里，做道士的一直同乞丐一样被当作社会末流，“三教九流”嘛，更不要说有什么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了。有些小道士埋怨我们这些老头子没有文化，没有水平，我们不能批评这些小道士不对，但是他们太不了解我们年轻时生活的那个社会了。那时候没有义务教育，没有道学班，更没有道学院，而我们这些老道士大多出身贫苦，八九岁起就要谋生吃饭，哪里去学文化呢？我们这一代老道士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正是旧社会造成的。建国以后，作为新中国的公民，我们道教徒在政治上、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享有和别人同等的权利，这就是翻了身。我们的道教信仰和正当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还建立了自己有代表地位的道教组织，参与了国家大事的咨询活动，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别是这十年来，宗教政策拨乱反正以后，道教协会正式成立，道观陆续修复开放，并且用新的方法培养了第一批小道士。政府在帮助道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那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要热爱新社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讲到“爱教”，大家也都知道热爱自己道教的道理。我们的道教是值得我们做道士的热爱的，值得道门外的人尊重的。中国的一部《二十五史》里到处有道教留下的痕迹。道教或者成为民众运动的纽带，或者成为反抗

统治的口号，或者影响到朝廷政治，或者塑造了一代代的社会思潮。人们说中国漫长的文化史是儒释道三足鼎立支撑着的，道家和道教就是其中的一足。可以这样说，残缺了道家和道教的话，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就是不完整的。今天的时代虽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道家和道教对于社会思想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依然保持着，有时候在有的地区还相当大。我们道门中的人，作为道家和道教文化的继承者，不仅光荣，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们热爱道教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那么，怎样才称得上“爱教”呢？第一，道心要坚，就是要有坚定的道教信仰。信仰“道”并且相信“道”能够因修而得，就是得道；第二，道术要精，就是要刻苦学习道教学问，不论是道教知识、科仪修持或者宫观管理等等，都要学精学通；第三，道戒要严，就是要严格遵守戒规纪律，不论是衣着饮食、殿堂作业、早晚功课或者出入宫观等等，都要照规矩办事。青年道友特别要处理好家庭和事业、自由和规戒、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之间的关系，绝不能做出对不起道教、对不起祖师爷、对不起师长的事情来，玷污“有道之士”的称号。

怎样才称得上“爱国”呢？第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最大利益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我们要坚决抵制。第二，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

我们要体谅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把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组织得有条不紊是不容易的，不得不有法律和规定。既然有法律，就有保护，也有限制。从根本上说，保护也罢，限制也罢，都是为了民众自己的利益，包括我们道教徒的利益。如果我们不按法律执行，让巫婆神汉，跳神装鬼，算命看相，诈骗财物的那一套都进庙来，我们的道教不就要乌烟瘴气了吗？第三，积极投入祖国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爱国就要奉献，历史上爱国的像岳飞、文天祥等等都是尽忠报国，献出了生命的。我们投入四化事业，买点公债、国库券，参加爱国卫生、消防练习，接待来访参观等等，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爱国和爱教是相互联系的。统一起来，就是我们当代道教徒修养的一项方向性的内容。我们不能把爱国和爱教对立起来。有人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爱国就不能爱教，爱教就不能爱国。这种观点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我们要明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并不是全社会都是共产党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着几千年历史的痕迹和亿万群众的历史传统。道教就是其中的一种。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宗教政策就是把团结信教群众参加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大业中去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而不是要把我们宗教徒推到被消灭的对立面上去，因此，爱国和爱教不是对立的。就从社会理想而言，我们道教所追求的和社会主义社会所要实

现的，也是不矛盾的，东汉末年道教创立时追求的就是“太平”社会，《太平经》中说：“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就是人人要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太平经》还说：“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就是反对剥削压迫，反对贫富不均。《太平经》赞美的“太平”理想就是普遍的平等，“凡事悉理，无复奸私”，做事情都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再有人行奸谋私。这样的社会理想当时是反映劳动阶级利益的，今天也是同社会主义要达到的目标相一致的。从我们道士自己来说，问题倒是我们自己为实现道教的“太平”理想做了些什么，或者做了多少。

当然，爱国和爱教又是统一的两个方面，它们有不同的内容，有不同就有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在十年动乱中，一些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做了一些关庙、烧经书、砸神像的蠢事，他们在做的时候说的都是“最最革命、最最进步”的话。对此我们是放弃道教还是坚定信仰呢？绝大多数老道长们都坚定地“爱教”。今天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要使局部的暂时的不一致服从于整体的长远的一致。当然，在爱国的前提下，我们也要保护自己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道观的正当宗教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我们要紧密依靠政府的领导，以法律为准绳，敢于在协商不成、调解无效时，对簿公堂。

第三讲 学道为人

唐代初年有个高道，名叫王玄览。他是四川绵竹人，三十岁的时候和几个同乡一起到茅山去学道。从四川到江苏，千里迢迢，现在坐火车也要五十多小时。他走到半路就独自回四川去了，是不是怕走路，怕艰苦呢？不是的，因为他认为“长生之道，无可同修”。

“无可同修”这四个字，各人理解不尽相同。如果理解为修道是不能由别人代修或者代别人而修，这当然是正确的。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修道和学道只能依靠各人自己的努力。

“无可同修”这四个字，如果理解为修道仅仅是为了自己，或者在修道中完全不需别人帮助，和他人无关，那就错了。因为我们修道和学道不光是为了自己，而且应该处理好和同道之间的关系，离不开信众的帮助。这里面牵涉到我们道教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精神”的问题。

宋朝编修的《云笈七籤》里有一句话，叫“古之学道为己，今之学道为人”。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值得我们道教徒去认真领会。

第一，它指出学道的目的在古今是有区别的。古今

社会变化很大。过去学道上山，结茅为庐，饮清泉，食松果，离尘出世。这一方面是修道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没有生活来源的必然结果。但是现在的山上，不论茅山还是青城山，都有钢筋水泥的殿堂，晚上敞亮的电灯，有的还有自来水、电话。学道人的吃穿，也大多买自集市。因此，今日的修道生活同社会生活关系异常密切，更不用说北京、上海和广州等都市的道士了。过去一进门就被称为“方外”之人，方外指的就是世俗社会的四方之外。但是今天我们道士享受国家保护的公民权利，承担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一样可以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方内和方外的联系也从未像今天那样紧密过。古今社会的差别如此之大，这就要求我们的学道目的也要有所变化。社会和民众给我们如此之多，我们还是光为自己，不也太自私了吗？

第二，学道为人是我们道教的教义和理想规定的。在《道德经》的第八章里，太上训诫我们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里，太上用“水”来比喻“道”，来要求我们学道的人。水是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它从来往低处流，总是流到人迹不去的地方，但是它又不是自我孤立的。水滋润着天下万物，人如果一天不喝水就要干渴得无法生存，植物离开水就会枯萎，土地如果没有水就会龟裂而变成沙漠。在我们上海，如果有一天自来水管子放不出水来，这个大都市就会一片混乱。水悄悄地作着自己的贡献，牺牲

着自己，但是，从来不同万物相争。我们学道的人，就应该学习“水”，去为万物服务，使万物得利，这就是“道”。拿“水”的教义思想去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学道为人”。

我们道教徒都向往成仙，做神仙就是自顾自的吗？不是的。经籍里对于神仙世界有许多描绘。《太平经》里说到天上“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相遗”。神仙们是相亲相爱，相扶相助，没有私心杂念的，否则怎么能算神仙呢？太平道向往的理想社会就是“太平”。太是天的意思，像天那样胸襟开阔，毫不偏袒照耀万物；平是地的意思，像地那样养育万物。天地对于万物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道教向往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我们道教徒在社会上也应该有无私的牺牲精神。

那么。我们怎样做到“学道为人”呢？

我们面前的“人”，有的是道门中的，有的是社会上的。我们学道为人，首先应该是为全社会的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学道为人就是要为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有八个字，“齐同慈爱，异骨成亲”。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普天下的人都“慈爱”，都像亲人一样。要做到这一点，经文要我们“十恶不生”，就是“不杀、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盗、不贪、不欲、不憎、不妒”，行为要符合“真常”天道。赵朴初先生和中国佛教

协会提倡人间佛教的精神，有八个字“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个“有情”指的就是人，使人民大众得“利”得“乐”。在这一点上，学道为人和学佛为人，应该是完全相通的。

当然，“为人”不是空话，而应该身体力行。平时，我们对来道观做功德的信众比较关心，有的还和我们建立了联系。但是，我们对一般的信众主动关心不够，应该说，他们来烧香叩头大多是有所求的，或者遇到了挫折，或者身染顽疾，或者带有某种希望。他们在社会上暂时找不到慰藉就到庙里来求告神明。如果我们值殿接待的道士能够主动一点，给这些信众一点安慰和鼓励，那么或许会缓解他们的痛苦和焦虑，对他们的生活发生好的影响。前辈高道们常常说“度世”，我们如果能以语言和笑容帮助信众，那也就是“度世”。因此，我们都应该主动一点，做好信众工作。

其次，我们也要妥善处理同其他道门中人的关系。我们常说：天下同道是一家，一方有事，十方支持，相互帮助。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道门中也有世俗社会的“同行是冤家”的反映，有时候少数地方问题还很严重。处理这些问题，只能从加强自己的“为人”修养着手，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盘山语录》里说到修道的人应该结伴“递相扶持，不至偏颇”，但是事实上五个手指不一样齐，修道的也可分为三等：一等是云朋霞友，他们“有志节，炼心地，究罪福，绝尘俗，

逍遥方外，同志相求，遂为笃友”；二等是良朋知友，他们“有习学经教，琴书吟咏，高谈阔论，褒贬是非”；三等是狂朋怪友，他们“不治心地，不看经书，不顾罪福，出语乖讹，作事诳荡，触着一毛，便起争斗，夸狂逞俊，恃力持胜，欺压善良，相率成党”。由此可见，同道中的不良关系，古已有之。三类同道，随其功业，将来会各得其报的。在现实的相处关系中，对于一二类道友，我们应该谦虚谨慎，相互学习，同成正果；对于第三类道友，一方面应该以清规戒律约束言行，另外我们也要耐心劝导，使其醒悟。对一般信众，我们尚且要“度”，对于这类道友当然也要“度”，耐心劝导，使其醒悟，同登仙界。

世界是复杂的，人也有善恶。我们的“学道为人”当然是为最大多数善人的，而不是为了恶人。帮助善人，自己是行善功；帮了恶人，自己也是行恶。因此，我们必须睁开双眼，提高识别能力。

学道的人，要做到不损人，这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做到处处为人却是很难很难的事，需要将自己的身心和行为都修炼得像“水”一样的透明、纯洁、无私和奉献。这样才是真正上善得道的人。

第四讲 多行善功

许多佛道教的庙观，都挂有一副对联，叫做“诸恶莫作，从善奉行”。这副对联出自明清时期十分流行的道教善书《太上感应篇》，庙观里挂这副对联是对于信徒行为的规劝，就是一生要做善事，不要做坏事。

世界上各种宗教都劝人行善，道教也是如此。在《道德经》里，太上对我们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在《太平经》里多次说到“天道无亲，唯善是与”。“亲”有两个意思，一是血亲，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姊妹；二是亲朋好友，关系密切。这就是说天道是不分血缘和亲疏关系的，天道是最公平的，不讲情面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开后门的。它只给予那些行善的人。修道的人目的就是得到天道，与天同寿，怎样才能做到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行善。

那么，什么是“善”呢？道教的“善”就是一切行为要符合天地万物的自然，不要做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反过来说，所谓“恶”，也就是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各种行为。具体地说：爱护自然环境。葛洪说“慈心于物，仁逮昆虫”就是这个意思。整个自然界是一个

相生相克的循环，行善的人是不会去人为破坏这个循环的。山居的道士要爱护林木花草，不要在春夏季节渔猎，弹射飞鸟，挖胎破卵，残害生灵。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日本侵略军的烧掠，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林木破坏得所剩无几，建国以后由于建设需要，又大量砍伐，新种的树木又几遭人为摧残，因此我们要加倍爱护，种树造林，造福子孙。都市里的道士也要爱护绿化，植树栽花。俗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说的是种树泽及后代。从现代科学揭示的自然之道，它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一点，因为林木生长有利于空气更新，有利于保护水土，有利于大气润湿，有利于动植物生长，当然归根结底有利于人自身的健康生活。我们道士中有一派即全真派是不吃荤的，他们手不伤生，食不茹荤，是保护动物的榜样。正一派的道士在斋醮期间也茹素，那是为了斋坛洁净，仪式严肃，平时可以吃一点荤，但是牛肉是不能吃的，因为牛是太上的坐骑。我们中国有浩如烟海的食谱，有眼花缭乱的食文化，大概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不管有毒无毒，都可以弄上餐桌来美食一番的。11亿张嘴啊，5张嘴1只鸡的话，一餐就可以消灭2亿多只鸡。动物也是天道循环中的一环，我们要少吃或不吃动物，春夏季更要少吃，特别是决不能伤害珍稀动物，让自然界能自然无为地生息不止，当然归根到底也是有利于我们自身的生存，动物的脂肪和胆固醇之类摄入过量，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

正确处理社会关系。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我们道士和道观仅仅是社会中的一个小小的成员，我们周围有无数关系要处理。葛洪说“积善立功”，“恕己及人”。归结起来：

一是“忠”，忠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忠于自己的道教信仰。决不做有伤国格、人格和道教形象的事。

二是“恕”，为别人的高兴而高兴，同情别人的疾苦，周济别人的急难，救济别人的穷困，谅解别人的过失。

三是“俭”，不贪污受贿，不奢侈浪费。一草一木，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以节约为美德。

四是“诚”，见人之得如同自己所得，见人之失如同自己所失。诚恳待人，不嫉妒，不中伤，不欺骗，不背后议论人之长短，不口是心非，不作伪证。

五是“朴”，谦虚朴实，不自以为是，不骄傲自大，不骄横拔扈、盛气凌人，不奉承拍马。

六是“孝”，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不论他们贫富，都能始终如一的问寒问暖。父母和师长年迈体弱，应该关怀备至，服侍照料。

七是“信”，说话办事讲信用，承诺的必定做到，借人的必定偿还，损坏他人的必定赔偿，不贪小便宜。

八是“慈”，无论是对于亲人或者陌生人，都要怀有一片慈爱之心。特别是像婆媳关系、师友关系等处理，更要彼此间多一点相互体谅的慈心。

九是“礼”，待人接物，万事要讲礼貌。俗话说，礼

多人不怪。讲礼貌，体现在一举一动之中，不能将礼庸俗化为送礼。老话说，礼轻情义重，不能计较礼物价值。

十是“义”，兄弟姊妹或者同师的弟兄姊妹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相互帮助，友爱关心。一人有难，众人相助。

这十个方面是我们道教徒处理社会关系的“善行”的道德要求。它是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道教徒修道、得道必须做到的积善立功。对于“善”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但是“天道”是“自然”的这一条基本内容，却是不会变化的。

道经上说人身上有“三尸”，专门记录人的善恶功过，每逢庚申之夜，趁人熟睡时，就要上天说人善恶，增人之寿，夺人之算。民间也有灶神每年腊月二十三日上天说人善恶的传说，给人以报应。《玉铃经》上还说：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这里说的立三百善或者立千二百善的标准是很高的，因为，一个人做些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得道成仙，名利仙班是件很难的事，不然的话，神仙世界也要爆满了。但是，只要我们多行善功，在老之将至的时候，我们对得起祖师，对得起子孙，一定会得到善报的。

第五讲 我命在我

“我命在我”，是我们道教教义中一句警句，一句名言，现在已经受到社会上普遍注意和引用。在许多思想史专家著作中都指出，它有积极的、能动的意义。那么，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呢？一处是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的《黄白》篇中，葛洪引用《龟甲文》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另一处是在齐梁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中，陶弘景称：“《仙经》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再一处是在南北朝时期问世的《西升经》中，经文说：“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因此，这句名言，至少已经有一千六百年的历史了。

怎样理解“我命在我”呢？我以为首先要弄清楚道教怎样解释“命”，因为现在常常有人用儒家的“命”来理解道家 and 道教的“命”。《论语》里有一句历世传诵的话，叫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对举，因此它的内容自然就是两个内容：生死寿夭和富贵贫贱，也就是包括人生的一切。但是，我们仔细体味一下上面引用的三处道教典籍和经文，就会发现，道教的“命”只讲生死寿夭，没有富贵贫贱的意思在内。这是因为道教要求信徒清静无为，自放草泽，不要把人生的富贵贫贱看得

很重，重要的是学道、得道，长生升仙。《道德经》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就是“复还性命”，性命的根源就是“道”。《南华真经》的《大宗师》还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全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以极者，求也夫”，这里的“命”也就是天地之上的自然之理，也就是“道”。我们道教以三清作为道的化身，因此以三清作为人的“命”的主宰。有些人以为我们道教讲“我命在我”，就不相信“命”了，这是误解，因为如果不信仰三清是命的主宰，那么他就不是道教徒。但是，我们道教徒又不是消极对待命。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一就是“畏天命”，认为人的顺逆、吉凶，常常不可捉摸，令人生畏。我们道教对于顺逆、吉凶，既然认为是道的体现、命的主宰，就不畏天命，而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安天命而知足。《冲虚至德真经》里有一篇叫《力命》，唐代卢重玄曾经解释“力命”说：“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进取之力，非命不就。有其命者，必资其力。有其力者，或副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无命也。持命而不力求者，候时也。信命而不信力者，失之远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命是神灵主宰赐予的名分，但是人如果不努力也是实现不了的。人的努力可以取得成功，但是如果神灵主宰没有这个名分，也是枉费。有命的人，一定要依靠努力。有的人，努力了，成功了，那是实现了他的命。有的人努力了，却不能成功，那是命中没有名

分。如果有命而不去努力，那就只能等待时机了。光信仰命而不去努力的，就不会成功。光依靠努力而不信仰命的，也是不恰当的。这段话说得很好，很完整。我认为，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道教徒既信天命，又要努力的思想。在世界各种宗教的命运观念中，我们道教的“我命在我”思想，应该说是比较能动，颇具特色的。

其次，我们还要弄清楚一个“我”字。我可以理解为大“我”和小“我”，国家民族的“我”，道教的“我”以及道士个人的“我”。

从国家民族的“我”来说，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历尽沧海桑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民族展开了新的一页，劳动人民翻了身，我们道教徒也结束了被人瞧不起的“三教九流”的地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昌盛，国运和民族运都有了极大的转机。这是“道”的体现，也是全国和全民族的人认识了“道”的结果，用社会上的话说，就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为了实现“小康”和“富裕”的目标，还需要全国全民族的努力，包括我们道教徒的努力，这就是“我命在我”。

从道教的“我”来说，我们的道教近二千年中经历了创教、改革、隆盛、分派的过程，也是历尽沧海桑田、兴衰变化。从清代以后，道教的“命”似乎逐渐不济，这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条件变化有关，也和道门缺乏优

秀的人才以及管理弘传不力有关。清代龙门派出了个王常月，他辛勤传戒，走南闯北，终于使龙门派获得了中兴。辛亥革命以后，名山宫观逐渐凋敝。可是沿海各大城市的道教仍很兴旺。1957年以后，宗教活动一度受到限制，道教宫观关闭，道门后继乏人。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地宫观陆续恢复，道教的“命”又出现了转机。然而要把握转机，关键是我们道教徒的努力，努力的关键

是出人才。道教的命运在我们道教徒自己手里，这也是“我命在我”。

从我们道士个人的“我”来说，从每个人的“我”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生死、盛衰、贫富、贵贱的过程。其中有命的主宰，但是仍旧有赖于人的主观努力。一个人的身体再好，如果起居无节、饮食无度，自



陈莲笙道长（中）参访青城山，与傅元天道长（左二）等合影（1994年）。

己戕害自己，那么必然不能终其天命。反之，一个多病的人，如果能山居清修，静功疗养，善于保养自己，那么也能终享天命。一个人在春风得意时，如果能居安思危，注意节俭，那么就能万事顺利。反之，如果得意忘形，贪污腐化，那么必然因福得祸，害人害己。社会上的人如此，我们道门中的人也是如此。许多青年道士都不理解我们的先辈为何订出了繁细的清规戒律，他们不理解防患于未然的道理，也不理解消极的防范包含着积极的爱护的意思。道教的“命”有赖于道士，而道士的“命”既有天神的主宰，亦有赖于自身的努力，这也是“我命在我”。

发扬优良传统，继承历史遗产，这是今天我们道教徒的历史责任。国运昌盛，社会稳定，道教的“命”自有天机。但是，对于我们每个教徒来说，一定要作出努力，上对得起祖师，下对得起后辈，把发扬和继承的“命”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第六讲 斋醮度人

斋醮俗称“道场”，是我们道教称呼仪式的专门名词。

这几年，到江南一带道教庙观里做道场的信徒很多。苏州的玄妙观，在打醮的季节里“道场”一天做两场还来不及，还是不能满足四乡来的信徒的要求。茅山的信徒大多是黄昏上山，夜里通宵“做道场”，第二天下山。朝山的季节里，茅山的道士们忙得眼睛熬红了，喉咙嘶哑了。我们这里有人曾经在青城山天师洞看到广元来的香客，夜里执意要请高功江至霖法师在黄帝殿里通疏祝愿，灯火通明，钟鼓齐鸣，香烟缭绕，在高亢的川腔吟诵之中，满殿的信徒虔诚礼拜，第二天一早又带着了愿的心情返回乡里。不论是正一派或者全真派，“做道场”是道教主要的仪式活动，如同佛教有佛事、开水陆法会，天主教有弥撒，基督教有礼拜，伊斯兰教有五功一样。

对于我们道士“做道场”，人们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道教徒在道场里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超度祖先亡灵、早登仙界的愿望，无疑是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的。

对于“做道场”，人们还有一种批评意见，那就是收

取费用。但是，对于庙观里进行的道场，道教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入的一部分供道士维持生计，一部分作为庙观的日常开支和维修费用。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问题倒是，我们道教徒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人们有那么多批评意见。我们自己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斋醮的意义，以及用怎样的态度来为信徒们做法场。

关于斋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做法场？前辈高道有很多说明。陆修静曾经说过：“以人三关躁扰，不能闲停，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这就是说，我们学道修道的人总是要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就会有欲念滋生，言行错误。如果我们能虔诚地斋醮、礼拜、诵经和思神，就能达到“洗心净心，心行精至”。因此，首先，我们做法场是为了自己的学道修道，也就是修道生活的一部分。陆修静还说过：“一切莫过乎斋转经者也。夫斋直是求道之本，莫不由斯成矣。”

其次，做法场是为了道教信众。杜光庭说：“醮者，祭之别名也。香花灯烛，果酒茶汤，降天地，致万神，禳灾祷福，兼利天下”，这就是说，我们做法场，祝愿天地，求告万神，是为了禳灾祷福，生灵健康长寿，亡灵早登仙界。因此，做法场，对于我们道士来说，也是做善功，是为别人消灾降福。明太祖《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称：



陈莲笙道长（前左一）在北京白云观举行的“祈祷世界和平，护国佑民罗天大醮”欢迎典礼上（1993年9月）。

“教与正乙，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这就是说，做道场是为了社会伦理、孝子慈亲，所以它是有功于社会的。

因此，我们做道场是一件十分严肃而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唐代张万福法师说过：“夫斋法精严，诸天上圣并垂降鉴，每事须合法度，不得迟留稽废法仪。”意思是，道场的做法是精致而严肃的，每一个礼拜动作和每一个吟诵唱腔都有规定的法度和程式，不得轻慢。所以，道教徒进入斋醮坛场要严肃认真。香港有一个旅美道士叫谢满根的，他说过一些话很有启发。他说：我们自己要认真，管庙、做道场、清洁卫生这些事，如果我们自己也马马虎虎，怎么要求人家尊重我们呢？这话说得很中

肯，因为它指出一个道理：自重人重。只有自己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从我做起”。

人们批评有的道观像商店，做道场像做生意，有些道士在钱财上斤斤计较。检查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有些道士并没有真正认识斋醮的意义和目的。有的老道士做道场是“为了赚烟酒钱”，有的小道士做道场是“为了养家活口”，他们把做道场说成是“做生意”，醮坛上马马虎虎，个别人为了酬劳多少而争争吵吵，甚至当场“甩纱帽”。这类事尽管不多，而且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性质是严重的，影响很坏。因为，他们违背了斋醮的修道度人的目的，也破坏了坛场的尊严，亵渎了神灵，而且也在信徒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难怪教内外都有人批评个别道士钱迷心窍。大多数正派的道士觉得委屈，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不批评，关键是我们要改变自己这些个别的现象。

不论是金箓、黄箓大道场，或者是超度亡灵的小道场，信徒们常常一早就赶到坛场来了。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将愿望上告神灵，希望依靠我们荐拔祖先亡灵。尽管我们也是普通教徒，但是在信徒们的眼里，我们是介乎神人之间的道士，是具有道术的人。我们应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满足信徒们的愿望。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对个别道士的表现不满意了：钟鼓已经响起来，个别道士才刚刚奔

到坛场，一边穿道衣，一边说话，嘴里还叼着烟；在坛场里，个别道士一边念经一边却在做小动作。法事还没有结束，有的却已心不在焉，马马虎虎。所有这些不严肃的态度，不仅破坏了斋仪的严肃性，也损害了我们道士自己的形象。

全真七子之一的刘处玄在《仙乐集》中有四言诗一首，十分通俗地写出了斋醮度人的目的和意义。诗说：“明真之醮，所料紧要。荐拔先灵，各愿管了。休问使钱，共用多少。收支无私，置历二道。临醮众人，戒欲为妙。且远腥膻，纵意寿夭。吏神暗察，罪福非小。近醮朝真，不得唤叫。高功道法，显扬大教。所篆符简，众职明晓。追荐文字，未有别料。百日之功，莫生虚矫。季冬望后，要显光耀。休分昼夜，俗事除剿。”其中关于“收支无私”、“戒欲为妙”、“不得唤叫”、“莫生虚矫”等等的对“临醮众人”的要求，是很值得我们后代的道士，不管是全真派或者正一派，加以重视的。

第七讲 众术合修

当今社会有许多种“热”，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其中一种就是“气功热”。碰到我的人常常问：气功是不是道教的？马路上贴了许多招收学员的广告；有的说是崆峒派嫡传，有的说得到张三丰的秘诀，包治百病，无病长生，等等。有人就问我，崆峒派是否是道教的？张三丰是否是道教祖师？有否秘诀传世？等等。

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二语、一时半刻可以回答清楚的。我想，我们道门中的人有二是应该明确的：第一，道教是追求修身养性、长生成仙的；第二，修身是为了实践道，而不是为了欲或者为了钱。

我们道教徒信仰“道”，而道是无生无死的，因此，道教徒历来追求长生成仙。社会上有些人批评我们说，道教徒历来追求是骗人，因为人不可能不死。我们说，这是误解。《道德经》里说“道”是“天长地久”，与天地同在的，从没有说过，人的躯体是可以“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七章）而我们的身体是父母“自生”的，自生之物能与天地并论吗？当然不能。道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而人的躯体是有形的，是形而下的。道是无始无终的，人的躯体是有始

有终的。因此，人的躯体总是要衰老的，要终了的，这也是“道”，也是天意。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样是“天长地久”的，就是人的精神，人对于“道”的追求。《道德经》还说过，“天道无亲”，因此，人的躯体存世的天年应该是公平的。那么为什么人的生命有长有短呢？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挫折和伤害，使人不能终其天年。所以历代道教徒在强调戒欲慎行，保持健康的同时，还探索种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以求长生。

道教是有气功的，不过“气功”是一个现代名词，近些年才流行起来。它的功法，百花纷呈，其中有佛教的，也有道家的。根据考古发现，行气的养生功法早在战国时就已经开始流传了。《行气铭》称：“行气，吞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明，明则长，长则复，复则天。天其本在上，地其本在下，顺则生，逆则死”。到了汉代，流行“气”的哲学，将“道生一”的“一”解释为混沌中的一团气，由“气”生出阴阳，再生出天地人来。道教创立的时候，将“气”的哲学和“气”的养生功法也都吸收和继承了下来。从汉代至唐代，历代道教徒对于养生的技巧作了种种探索。例如汉至魏晋时流行“守一”，“一”就是道，把自己的思想集中于“道”之中，摒除杂念。

魏晋南北朝时，流行“内视”，就是认为自己的脏腑都有神灵守卫，把自己的思想集中于脏腑神灵的名称、

形色等等。

南北朝时，还流行“吐纳”、“食气”，“餐霞”等等，就是选择早晚在空气洁净的山林之中，呼出胸中浊气，吸进新鲜空气。

唐代时，流行“坐忘”，司马承祯将“坐忘”之法系统化七个步骤，即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这一主静的功法对于唐宋道教修身养性方法乃至理学有很大的影响。

金元以后，全真道派产生并且逐渐发展。全真道士追求“全其本真”，因此，十分注意内修，先后形成了内丹的北宗(先性后命)、南宗(先命后性)、中派(性命双修)以及东派和西派。明清以后，《性命圭旨》和伍柳仙派的内丹理论广泛流传，它们的“筑基填亏”、“炼气化精”和“炼神返虚”的修炼方法至今仍然有很大影响。

从历史文献来看，道教对于养生方法的探索，远远超出气功的范围。《太平经》中说到的功法，就有二十四种，其中“气功”类的以外，还有：食松梨、食李枣、食凤脑、食竹笋、服云腴、服华丹等等。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也说到“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杂应》)。养生之法既然很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掌握呢？在葛洪的时代，就有人提出“何者为善”的问题，葛洪回答说：“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则其小者不



陈莲笙道长参访四川眉山三苏祠留影（1987年11月）。

可不广知也。盖籍众术之共成长生也”（《微旨》）。后人将葛洪的思想就概括为“众术合修”。

众术合修的养生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道”是无限的，而“术”是有限的。人在后天受到的干扰和损伤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人的养生必须在精神上、内脏功能上以及躯体保健上给予全面的照顾。认为气功可以包治百病，或者认为采用某种功法就可长生的说法，显然都是片面的。如果以此实行，那么在实践中就可能得到片面的后果。

前几年，我在上海接待过一位来自北方的道姑，她千里迢迢来上海寻道访友，在体力上是消耗很大的，但是，她每天只吃几颗大枣，饮一点水，因此，人显得十

分消瘦和虚弱。在现代社会，我们修道人的作息安排，车旅劳顿，人事思虑等等同古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养生中当然不能简单生搬硬套辟谷之类的功法。

这几年，我在上海还听到和看到了一些由于气功操练不当致病的练功者。从客观上说，这些练功的人缺乏有真知灼见的老师指点，因而走火入魔。从主观上说，这些因练功而得病的人实在是对气功缺乏完整的认识，气功功法既是操作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如果练功的人不能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无求无欲，那么就越练越烦，心不能静，怎么能避免走火入魔呢？

目前，在道教研究中，还有一种看法，似乎道教中只有全真道士讲修身养性，而正一派道士似乎只讲斋醮符箓，而不做修持功夫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道教的历史上，作为正一派源头的茅山、閤皂山和龙虎山三山符箓，都有注重修身养性的高道和道教典籍。陶弘景和司马承祯都是茅山的祖师，他们的《养性延命录》和《坐忘论》都是中国医学史和道教史上的名篇，是每个修身养性的人都必须学习的。至于在斋醮仪式上，常常有存想请神的内容，有运神出窍的内容，有大气呵叱的内容，这些都需要法师先炼自身后再度众身的内功。因此，我们不能说正一派道士不做修持工夫。只是正一派道士并不专注内丹，而倾向于众术合修。当然，确实有些正一道士不注意修持的，但是不能因此说正一派不养生。

中国社会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老人了。由于社会

安定，经济繁荣，老人们都希望多享受几年幸福的晚年生活，因此，有许多老人热衷于养生，到道教中来寻求长寿延年的窍门。现在一些道教外的人假借道教的名义在干一些或真或假的传授功法之类的事，我们道教中的人当然决不能对此置若罔闻，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自己加强养生研究和传授工作，把道教养生功法的旗帜自己树、自己扛起来，自己来发扬光大。当然，我们搞道教养生就是为了整理道教遗产，弘扬道教文化，如果谁要是利用这面旗帜，谋自己的私利，那么一定会自搬石头自压脚的。

第八讲 适应时代

说到适应时代，某些年长的道友就反感，认为道教就是道教，道教不能去适应时代，要“以不变应万变”，宁可道教没有了，也不能让道教变化去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些老道友的道心是坚贞的，信仰是虔诚的，这一点是要肯定的。但是，应该说，他们对于祖师爷们创立二千年的道教这份家业的认识是片面的。

说到适应时代，某些年轻的道友是赞成的。但是，他们脑子里想的和嘴上说的适应时代，往往就是增加工资待遇、参与市场经济、兴办第三产业乃至改变祖师们传下来的一些清规戒律。这些青年道友的热情是应该保护的，也不能据此就说其信仰不坚定、不虔诚，他们希望道教能适应社会，同社会发展合拍，使道教在当代社会发扬光大。但是，他们的认识也有片面。

为什么说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呢？因为，它们对于时代的认识，对于道教和时代的关系的认识都有不足之处。

道教是人的信仰，而人都生活在变化中的社会 and 时代之中。天师创立五斗米道，要入道的人交五斗米，这说明道教从一开始就和社会生活有紧密联系。魏晋隋唐

时期的高道们，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王远知、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等，都曾接受皇朝的赏赐，这说明道教在历史上就同朝廷政治有密切联系。金元时期出现的全真道派更是道教顺应时代生活的结果。历史告诉我们，在道教和时代的关系上，只能是我们道教去主动适应时代，而决不是相反。在当代中国，我们道教在政治上要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在经济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服务社会，有益民众。这些都是我们道教适应时代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两耳只闻钟鼓声，“以不变应万变”，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不可能做到的，其结果也必然是自误误人，最终使道教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丧失立足之地。

青年道友们常常喜欢谈时代，今天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上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人说今天是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从政治角度说的。

有人说今天是大动荡、大组合的时代，这是从国际形势角度说的。

有人说今天是信息时代，这是从通讯技术发展的角度说的，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密切程度。

所有这些对于时代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时代，回答道教如何适应时代的问题，都是有用的。但是，它们

都只是一个方面的认识。如果据此回答，其结论也会是片面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80年代初我们刚打开国门，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时，人们常常带着鄙视的口气，议论港台和海外道观里的彩色电灯、霓虹灯、电蜡烛、电香和念经的录音带等等。但是，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东西在我们各地的道观里，前前后后也都出现了。绝大多数的道教徒也已经容忍和接受了，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新的合理的有用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宗教生活，丰富道教。十年来，给我启发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观念要改变。如果我们观念不改变，就不可能使道教适应时代。因此，道教适应时代的问题，首要的不是去改变细枝末节，而是去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

改变我们的观念，首先是在教理教义上丰富和发展对于“道”的认识。“道”是我们道教的基本信仰，信道、崇道那是不能变化的，但是“道”的内容是应该随着时代而丰富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物质本原、宇宙起源以及生命奥秘等等都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些新发现大大扩展了我们对道的认识，我们当代道教徒应该对道作出解释，以丰富或修正前辈道长们的阐述。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它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世界已有很大差别，前辈道长们对于社会之道和人生之道的论述，也应该由我们当代道教徒作出补充、修正和发展，因

此，丰富和发展道教的教义教理，特别是对于“道”的认识是道教适应时代的首要内容。

其次，在道法、道术和道教仪规方面，某些为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的部分，应该发扬光大；某些不适应的部分，应该适当调整。例如：当代社会的中老年人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安居乐业，期望长寿，因此，服食方法、内丹功法以及动静结合的导引术、八段锦之类应该不断整理、充实和弘扬。再如：道教仪式过去时间都较长，传统上还以长短作为规格高低、规模大小的标准。这样的时间和指导思想在现代社会里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生活，我们还要改变道教组织的观念。1957年，我们道教成立了跨宗派、跨地区的联合的道教协会，各省市先后也都成立了跨宗派的协会。这是道教组织适应现代社会的重要步骤，因为它改变了历史上的按宗派、按宫观、按师承关系建立的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的组织面貌。联合的观念应该贯穿在道教各派之间、道教宫观之间、道教徒之间以及道士同信徒之间。根据上海、茅山和苏州等地的做法，适当吸收道教信徒参加道教协会的工作，密切道观同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信徒代表的关系，道协和道观主动为道教徒解忧扶困，参与社会生活，使道教作为一个实体出现在当代社会生活之中，其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好。

改变我们的观念，还要表现在培养新一代道教徒和提高老道士的修养方面。1957年中国道协成立以后，在

陈樱宁先生主持下，创办了道教知识专修班，专修班培养的人才和编写的教材，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1981年以后，各地道教宫观都培养了一批青年道士，北京、四川、上海和苏州等地还用办学和办班的形式，培养青年道士。青年道士们已经在道教仪式、宫观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主要角色的作用，有的还担任了领导工作，使宫观和协会活动充满了生气。随着道教宫观的不断开放增多，青年道教徒的数量缺口仍然很大，因此，培养青年教徒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至于，要培养出有高度学识水准的、有精明管理能力的和协会工作能力的、有高超的法和仪范水平的高道，恐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需要我们几代道长的持久



上海市道教协会陈莲笙会长向香港道教联合参访团赠送纪念品（1998年）。

而共同的努力。我们切不可因为培养的青年道士已有一定数量而有任何放松。老一代道教徒也要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学修养，去弘扬道法和教育后辈。

改变我们道教徒的某些不适应时代的观念，这是道教适应时代的最重要的一步。任何急于求成或者自我封闭的思想都不会有好结果。

我们要珍惜道教今天在政治上社会上获得的地位，在信仰上获得的尊重，在文化上获得的弘扬。我们这些老道士都明白，从清代中叶至今的几百年中，道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社会的重视，其作用得到像今日这样的发挥。正因为如此，我们道教徒要不分地域宗派，不论年龄性别，紧密联合，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自己的信仰和修养水平，弘扬道教，服务社会，善导众生，造福人类。

我的“道教徒修养讲话”共八讲，至此都讲完了。欢迎各方道众指正，共事道化。

道教宫观 管理 讲座

第一讲 重视管理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参访过全国各地许多道观，看到有的道观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有的道观修复工程井然有序，一个殿一个殿，一条路一个园逐年修复，年年有进步，年年有变化；有的道观汇报账目清楚，收支公开，量入为出，既有远期目标，又有近期打算。

然而，我也看到有些道观殿宇不洁、垃圾狼藉，有些道观人员混杂、道风不正；有些道观汇报账册不全、管理松驰；有些道观既无远大目标，更无近期打算。

这种差别，在有的地区有些道观还表现得很突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我想，问题出在道观管理上，有的道观管理得好，而有的则管理得不好。

首先，我们道教中的人，应该树立起“管理”这个观念。这是因为道教是一个由共同信仰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上海市道教协会就是一个社会团体。既然是道教团体，这个团体就有道士和信徒，道士各司其职，套用社会上的说法，那就是“人”；这个团体就有供养、助愿、经忏、门票的收入，就有工资、水电煤电话和各种费用的开销，那就是“财”；这个团体就有宫观、房产、设施和法器、法具等，套用社会上的说法，那就是“物”。既

然有那么多的“人财物”，加上道教团体和社会各界、方方面面又有那么多的联系，那就必须要加强管理。因此，这里不是你要不要管理，愿不愿管理的问题，而是当代社会中道教必须面对和必须重视的问题。

有些道长不重视管理，还拿出“无为”两个字作挡箭牌，认为道教崇尚无为，一切顺其自然，于是清洁卫生没人做，斋堂卫生没人理，宫观环境布置乱糟糟。不过，我要不客气地说，这些人对于资(津贴)却是限时限刻、分毫必争的。对于太上的“无为”作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太上说到“无为”总是与“有为”、“无不为”联系在一起的。《道德经》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又说：“无为而无不为”。我以为，“无为”可以理解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管理境界，而“无不为”则可以理解为管理措施的严格执行。如果我们宫观里的执事们人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职，整个宫观的“人财物”的管理自然就有条不紊，自“无不为”而到“无为”。无论是“人”或者是“财物”都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一些名山宫观历经沧桑，巍然现存，那是前辈上千年惨淡经营的成果，是祖业家产。对于这份祖业家产，我们能不管理好吗？有的宫观是改革开放时期民众的奉献，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那是人民的财产。如果我们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也应该将它们管好，那才叫对人民负责。

其次，道教宫观的管理应该怎么管呢？我以为，道教

徒的管理也应该坚持“奉道行事”的原则，也就是要以“道”的思想来管理，而在方法上则应敞开胸怀，吸收各种有用的现代管理的科学方法。

第一，要管理就要有权威，权威建立在公心上，公心就是道。《道德经》十六章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就是说，以道的思想管理宫观，要宽容和大公无私。道教中人，无论是谁，都不能把道教的“人财物”看作是个人的私产或者用之“以权谋私”。有人当上了住持，却把修庙的材料往家里拉，把庙产当成了私产。有人经营某些事务，可是从中捞利，中饱私囊。有人把同乡同好拉在身边，结成“小团体”，在用人上不能出于公心。这些不公而失道的举止，是会有报应的，那就是失去权威，失去人助，最后被逐出道门。

第二，要管理就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处理关系建立在适应上，适应就是道。《道德经》十四章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今之“有”区别很大，因此执道之法也应该有所不同。一些管理不善的道观，大多和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关系有关。一些住持沿用旧子孙庙的家长制的管理办法，不能发挥和健全宫观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作用，用人、化钱和理物等都是一个人说了算。财务管理也没有健全制度，也不和社会上的财务、审计等制度接轨，搞成一笔糊涂账。

第三，要管理就会有条理，条理建立在通达上，通



上海市道教协会举办“宫观管理研讨班”。图为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杨奇庆在研讨班上讲话（2000年8月）。

达就是道。道原来就是道路的意思，道教内部各个线条，道教和教外各个线条，一定要保持通畅。通畅了，就有道；堵塞了，就失道。从管理角度看，主要是才路、财路和物品管理的通达。在这些方面，绝不能搞封闭，而是要坚持开放、通畅。据说台湾道教护法黄胜得先生在茅山问道：如果现在有博士生、硕士生愿意到道观里来，你们能不能容纳他们。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因为这是对陈旧、封闭的管理观念的挑战，特别是对那些有“武大郎开店”的观念的人的挑战。我以为，如果道教中人能够出于公心，广开才路，而博士生、硕士生确实有道的信仰，道教中人应该欢迎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人才进入道门以提高道教徒的素质。不搞终身制。才路通畅，让

有才能的人在道教中都有发挥机会，这是道教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希望，我们都能以实际行动对黄胜得先生的问题作出回答。

第四，要管理就要有规章制度，规章制度建立在规律上，规律就是道。《道德经》三十七章云：“道常无为而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要守，守的就是规律。掌握了规律，就能管理好人财物。我们常常说“依法管理”，法也就是一条条的条文。依法管理的目的是什么？其中之一是保护道教自身合法权益。过去，我们总是把眼光看着教外，同教外人争合法权益。现在，我们还要看到身后有没有榔头，防止墙内的人利用管理不善窃取私利。加强道观管理，说到底，也是为了堵塞漏洞，防止我们道教的合法权益的流失。

一座座道观正在修建、恢复和开放，一批批年轻的道士正在走上神职、执掌大权。现在，正是我们要重视管理的时候了。

第二讲 分清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兄弟省市和上海都陆续恢复开放了一批道观，一批年轻的住持或执事已经接手宫观的管理事务。碰到这些青年当家，我时常会问问他们的状况，他们大多数人回答说，都是夜以继日地做事，上下奔忙，左右沟通，辛苦异常。有的还说自己像“捏着一把乱头发”。我是一个年已八十的老道士了，对于这些青年当家这些年来的辛苦劳作，是既钦佩，又爱惜的，希望他们为道教振兴作出成绩，又希望他们不要累坏身体，因为他们是任重而道远啊。

至于“捏着一把乱头发”，我想大概就是工作“一团乱麻”的意思。根据我的经验，造成他们工作忙乱的原因不少是因为工作经验不足、安排不尽妥当、考虑不够成熟等主观的原因。这些青年住持或执事毕竟还年轻，像他们这样的年纪时，我当年还只是跟着家父陈荣庆(宏明)先生做做道场，念念法事而已，哪能像他们那样已经挑起“当家”的担子了呢？另外，当家的“家”的内容，现在和过去也大不相同了。现在的“家”的内容比起过去要复杂得多。当家、理家、治家也比过去要难得多。当代的一个道观就是一个小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一大堆。

打个比方来说，一个道观的当家就像社会上的一个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或是一个企业的经理。说实在的话，现在仍然沿用过去道观里当家的一套来当今天的“家”，那已完全不行了。如果我们在管理方法上不作改进，不是“一团乱麻”反而倒成了一个奇迹。

这些年来，我也参观过不少港台道观。一些管理得好的道观就让人感到井井有条。了解一下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后，采用社会上的说法来总结，实际就是大权集中，小权分散；集体研究，个人负责；分清脉络，各司其职等等。

《道德经》三十一章说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意思是说，一个车轮子有三十根辐条，辐条集中到中间的车轳上，一个车轮就组成了，就可以当车轮来使用了。大权集中就好像车轮中间的车轳，车轳就像各个道观里的当家、住持、观长和主席等负责人。港台道观里的一些大事大多由理事会、董事会等集体研究决定，由当家等负责执行。这就是说，道观的大权掌在集体手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当家等有职有权，那职权是集体授予的。

一个车轮子光有车轳是不行的，还要有车辐条。《道德经》说到，车辐条插在车轳上以后，那车轮子才会好用。插在车轳上的辐条就好像道观里的各个部门，企业、事业单位里称它们为科室。各个部门科室各自发挥作用，运转起来了，那么道教宫观这个轮子就组成了，

并且转动起来了。当然，部门设置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对当代道观的活动有深刻的了解和分析。综合港台地区一些道观的经验，当代道观的活动大致有三条脉络。第一条是庙务活动的管理，例如：办公室(处理董事会、观长的事务，考勤登记，信函收发，档案整理保存，仓库管理，清洁卫生等等)，财务处(处理各种收支事项，银行往来等等)，法务处(处理殿堂管理事务，接待信众的法务要求，调度安排经忏活动等等)，宣道处(开展文化研究，印制和发送各种弘道传法资料，培养道教人才等等)。第二条是社会活动的管理，例如：教育处(处理资助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经费以及设立奖学金等等)，慈善事业处(处理安老院、康复院和施诊给药的经费等等)。第三条是附属事业的管理，例如：骨灰寄存园的管理，苗圃和盆景园的管理，藏经楼(图书馆)的管理，某些宗教用品制作工场的管理等等。三条脉络分清以后，各种事务都有人负责处理，并且向当家的和董事会负责。这样一来，自然整个道观的活动井井有条，自然不会出现有事没人做、有人没事做的局面。当然，我们这里的情况和港台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我们的财力还不允许有许多社会公益活动。我们的道观都有一个修复、整新或添建的任务，方案设计、图纸审核、投资估算、施工招标、施工监督、资金筹措、材料采购、内部装修、殿堂布置、塑像贴金等等事情一大堆，没有可靠的人选负责是不行的，借用社会上企事业的做法，就是我们还有一条基建技术

的脉络。

上面我说到港台地区一些大道观的部门设置，并没有要我们这里盲目仿效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我们今天乃至明天的道观管理同过去比较起来，内容增加了，任务繁重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如果我们继续一切由一个当家说了算，恐怕是不能完满胜任的。看来只有把管理工作理清脉络后，交给众道长以及信徒一起来承担。一把乱头发捏在手上，首先要梳通，理顺，然后编成一根根辫子。每根辫子都有人牵，这头发不就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了吗。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以为一个道观管理得好不好，首先就是我们梳理头发的功夫到不到家，我们对于当今道观活动的内容是不是吃透，认识是不是符合实际。就像一个医生要看病，首先要对人体结构和得病原因有个正确的认识一样。一个心脏血管堵塞的病人，你给他吃止泻的黄连素是没有用的。《道德经》六十三章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说，处理难事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办理大事要从细小的地方着手。天下的难事一定从容易的地方做起，天下的大事一定从细小的地方做起。宫观管理是件大事，做这个大事就要把大事分析成一件件细小的事情，然后把一件件小事交给一个个部门负责。各部门职责分明，可以检查，可以比较。我想，这样就可以分清脉络了。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那就是定岗位，明职责，岗位责任制。

我们的道观恢复有的还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我们还不可能有很多人手去应付各个部门的工作，除了聘请一些义工外，常常一个人要兼几个职，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家的心中要有数，当家的本事就在于把有限的人力组织起来，使各人各行其事，又相互配合，共同使道观的运作既适应社会的要求，又满足广大信众的需要。三十辐的车轮缺几根辐条是常有的事，但是其他辐条顶得上，那么车轮一样可以转得很好。

台湾的道教护法黄胜得先生是一位有道的企业家，他从企业管理的要求出发，提出道观要有发展机制和监督机制。按我的理解，所谓发展机制就是道观中要有人思考今后我们道观还应该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和怎么做。所谓监督机制就是道观中要有人监督条条脉络的活动，互相牵制，不出差错乃至防止教职人员的腐败蜕化。这两种机制无疑是很重要的，不过，从我们道观管理的实际水平看，还只能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

从当家的一长制到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再发展到健全的多部门管理，上海的道观都由道长们组成庙管会，庙管会下面设立不少组，法务、财务、后勤、行政、安全、卫生、接待等组，这是道教宫观管理适应社会的必然过程，我们要欢迎它，全力支持它，使我们祖师创下的道教家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更加发扬光大。

第三讲 选拔人才

在1992年10月西安召开的“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上，我曾经就道教文化的当代发展谈过三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在会议上，我说过“当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要大力注意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启用人才和留住人才”。从那时至今已过去了五年。五年之中，我们道教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但是，培养道教人才的问题，仍然是个迫切而首要的问题。在这五年里，不是说我们没有培养人才。我们培养出了一批青年道士，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只是道教缺乏人才的问题仍要进一步努力解决。各地恢复开放的道观越来越多，都需要有道士驻观进行宗教活动。目前不少老道士年老体弱，病的病、瘫的瘫、走的走，即使还坚持在道观里的，也大多是体弱力衰，难以长期胜任了。而在已经充实了青年道士的道观里，也需要继续补充，提高素质，提高层次以适应日益繁重的道观管理工作的要求。同时要逐步使道观中道士的年龄结构形成较合理的梯队层次，使道教事业能有序地一代一代继承下去。从这些实际状况出发，在整个道教界，人才缺乏的问题仍然存在着，有的地方还显得很突出。

在那次会议上，我还说过：“道由人显，道教的存在归根结底依靠道教徒的存在。道教的发展也取决于道教徒素质的提高，道教人才的多寡。”道教宫观管理得好坏也有赖于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因此，为了搞好宫观的管理，我们道教还有个管理人才的选拔的问题。这样的人才就是明代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说到的“住持领袖”。

天师张宇初说：“凡名山福地，靖庐治化，丛林宫观，住持之士，或甲乙往还，或本山推举，必得高年耆德，刚方正直之士，言行端庄，问学明博，足为丛林之师表，福地之皈依者为之。”这段话指出了担当“住持领袖”应该具备的条件，其中“言行端庄”指的是个人仪表修养和社会活动能力，“问学明博”指的是知识才学的水平，“刚方正直”指的是信仰和道德水准，特别是判别是非的能力和锲而不舍的毅力。至于“高年耆德”，我们如果不拘泥于字眼，就可以理解为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高度的道德文章的水平以及一定的社会声望，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稳健、成熟和有影响的意思。天师张宇初所说的条件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才兼备的标准。天师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还说到道观的知堂(即知客)、库管等职员的任职条件，其选拔的条件也大致要从德和才两方面加以考虑。同五年前的情况相比较，我们道教的一些宫观关于要不要选拔青年道士担当“住持领袖”的问题已经没有大的争议了。但是，选拔什么样的人来担

当“住持领袖”还是有不少议论的。对选拔的青年道士是“求全责备”，还是在培养教育中“扬长补短”。

最近，看到一则某企业招聘人才的报道，令我感慨不已。据说这家企业在招聘现场进出的路旁放倒一把扫帚，应试的才子们面对考官个个大谈企业经营之道，宣传自己的宏才大略，但是对于脚边的扫把却熟视无睹，不屑理会。只有一名应试青年主动拾起路旁的扫把并安放在门角落里，然后从容应答。结果这名被人认为多管闲事的青年被录取聘用了。对于一个人企业来说，拾不拾一把扫帚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是从这件小事中考官们看到的是这个青年为人处世的踏实认真以及个人道德修养的水准。这个青年尽管在应试中知识面多少有所不足，经验有所缺乏，但这些都是在今后的认真踏实的工作实践中可以充实和提高的。这一点也正是这个招聘企业在选拔人才时的高明之处。联想到我们的一些选拔到“住持领袖”岗位上的青年道士，他们身上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我想只要他们坚定道心，严守道戒，他们的经验会逐渐丰富起来，他们的才干也会逐渐发挥出来的。我们不能要求选拔出来的青年道士个个十全十美，像我们这些老人一样稳健成熟。另外，我们还要看到这些青年“住持领袖”比起我们当年来说是要成熟得多了，而且将来会更有出息。

当然，说到人才的选拔，也要说到人才的淘汰。《道德经》二章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

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有选拔就有淘汰，对一个人来说有上任也会有离任，借用一句社会上的话来说，就是“能上能下”、“人才流动”。太上说：“恒也”，就是说，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是如此。道教宫观管理的人才也不能固定不动，搞终身制，或者只能上不能下，这是不利于道观管理的进步的。只有让人才能上能下，让人才公平竞争，才是符合天道的。当然人才的上下流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使人才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熟悉各种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住持领袖”的道学水平和业务能力。一种是为了保护人才，不使人才在某个岗位做久了，陷进复杂的人事和社会关系中去。俗话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让涉世不深的青年“领袖”在河边、陆地和山间换换环境，湿鞋的可能性也就少一点。还有一种，正如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严厉批评过的：“华衣美食，广厦细毡，昧公营私，出入骑乘，呵拥仆御，交接权势，以致教化不行，源清流浊。甚则耽迷声色，外饰内乖，不畏香火神明，灵坛古迹，私蓄俗眷，秽褻神祇。所辖住持，宜闻于有司，处决下山，不得蒙昧阿私，有坏规法。”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借用社会上的话，如果“住持领袖”，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违反国法政纪的，绳之以法，违背教义和宫观戒规的，我们也必须把他们从“领袖”的位置上淘汰下来，否则无以制约，不能服众。因为我们的道教落在这样的离经叛道

的人的手上，必然是“仪范犹乖，纪纲不振”的。天师张宇初提醒过后世道流称，“苟非道材法器，凡滥收录，或不成材，肆暴为非，罔守戒训，不惟贻玷玄门，又且成败兴废所系”。选拔人才或者淘汰顽劣，事关道教成败兴废的大业，我们不能不严肃对待。

无论是选拔人才或者是淘汰顽劣，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对于人的爱护，都是对于道教宫观管理的负责，都是对于道教事业兴废成败的负责。因此，在选拔人才方面，我们要有个培养的过程，循序渐进，不能揠苗助长；在淘汰某些不称职的人员时，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另外，在选拔人才时，要提倡公平竞争，走群众路线；在淘汰某些不称职的人员时，也要公正透明，听取道众的意见。而每一个待选拔的道教人才，则应该自始至终摆正自己的位置，有了成绩不骄傲，遭到挫折不气馁，得到选拔不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调动工作不垂头丧气，继续努力，终身为道教事业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不要把选拔看成是获得个人名利的进身阶梯。天师张宇初说到住持领袖“务必慈仁俭约，德量含弘，规矩公正”，我想我们选拔的人才如果都能做到这十二个字，那么道教宫观就一定能够管理好，道教事业兴旺发达。

第四讲 健全制度

有一句老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里说的规矩，本来的意思只是工具。规是圆规，有了圆规才能画出标准的圆来。矩是角尺，有了角尺才能画出标准的方来。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生在世要做一番事业，要做得好而标准，要做得令人满意，就必须有个原则，有个标准，有个制度。不然，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道教的宫观管理，也必须有个“规矩”。道教的规矩就是“道”。我们的一切都讲“奉道行事”，宫观管理概莫能外。不过，在管理工作中，社会上习惯地将“规矩”说成是制度。道友们在宫观里学道、行道等要奉道行事，按制度执行，这样才能使宫观活动有序地进行，发挥宫观的弘道立德、教化信众的作用。

早期道教一开始就有《老君想尔戒》共九条，但是条文过于原则和简单，不便操作和实行。后来，又衍生出老君二十七戒，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南朝陆修静的《陆先生道门科略》就说过：“道士不受老君一百八十戒，其身无德，则非道士，不得当百姓拜，不可以收治鬼神”。这就是说，按戒行事就是有德，反之就是无德。因此，“戒”就是人的行为有道的体现，“戒”就是道士行事的

规矩。从老君一百八十戒的内容看，大多是针对个人的行为而作的，这是因为当时道士的修道生活比较单纯，道观的规模也不大，它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同社会的关系也较简单，道观内的管理也不复杂，所以一百八十戒的内容牵涉到管理的也不多。宋明以后，社会生活逐渐复杂起来，道观规模越来越大，道观内部的管理事务也越来越多，因此，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著有《道门十规》，对于道观的管理制度也有所阐述了。《道门十规》中有“住持领袖”一节，说到宫观住持和各执事的任职条件，以及选拔的办法，《道门十规》中另有“云水参访”和“立观度人”等各一节，说到收录道士的条件和道士修持的要求。《道门十规》中还有“金谷田粮”一节，说到道观的财物管理，称收入“必以贍众为先，悠久为志，务要公同出纳，明白登载。不得指私为公，各畜私财，互分各据，擅自支遣”，“常住田土，例不许卖，亦不得私立契约，破荡卖易”。《道门十规》中还有“宫观修葺”一节，说到殿堂管理，称宫观“系前代真仙古迹灵坛，岂宜废弛，必合依时修葺”。所有这些应做和不应做的，在《道门十规》中，只是以文字表达出来的，并没有写成如同现在制度条文样式，但是它已经反映了道观内部的人事、财务、基建、纪律等等的内容，显示出明代道观内部复杂的运作以及道观和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张宇初天师以“道门十规”作为文章的标题，也显示了道教宫观内部的管理制度已经摆上了日常的议程。不过，清代

和民国时期，我们道教的处境日艰，经济匮乏，人才流散，观内管理松弛，对外缺乏活力。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又怎能谈得上加强管理、健全制度呢？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道教出现了振兴的局面，香火旺盛，信徒云集，捐资供养，重修庙堂，新的住持和执事等一批批走上岗位，客观上把加强道教宫观管理的要求又提了出来，有的地方还提得十分迫切。道教宫观管理的繁重事务要求我们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仓库管理制度，殿堂管理制度，法务管理制度，人员选拔、宾客接待和安全保护等制度。

有的道友说，健全制度不就是制订一些条文吗。意思是这是一件拍拍脑袋的简单事。首先，这个想法实在是了解健全制度的含义。制订一些条文只是健全制度的部分内容。制度，从形式上看确实只是一些条文，但是，条文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应该从道观内各种实际活动的需要中总结出来。有了规范实际活动的需要，才可能形成符合实际的条文。对于实际活动的规范，既牵涉到爱国爱教的政治原则，又关系到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集体领导与民主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原则，责权利紧密结合的分配原则，而规范实际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调动宫观内道众的积极因素，共同使道观组织有序运作，发挥其弘道立德、教化信众和传承道教文化的基地的功能，为团结道教徒积极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从道教教义的立场看，只有符合这些规范内容的制度，才是有“道”的制度，因为

它符合当今道观内部活动的规律，也符合道观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的规律。当然有“道”的制度是不可能由一个人拍脑袋想出来，而只能是全体道众学道、悟道，从制订制度的目的出发，在管理工作的实际中才能创造、修订和确定下来。

其次，认为健全制度只是编条文的想法，还忽略了制度是操作用的，而不是单纯印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健全制度，首先是加强道观管理的行为。它应该是真功夫，而决不应该是花架子。这就是说，制订制度条文是为了切切实实的实行，拿来规范我们的管理行为。不然，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化那么大的力气去制订或者修订这些条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宫观的住持要领导好一个宫观就必须身体力行地去执行制度，在工作中表扬和奖励执行制度的，批评和惩罚违反制度的。没有制度的，要建立有“道”的制度；建立了制度的，就要坚持实行、监督实行符合“道”的制度。这也正是宫观道士在当今学道、修道和行道的一项重要内容。

悟道有先后。对于制度的认识和执行，各个道教宫观和宫观中的道友们的认识也会有先有后，贯彻执行起来也有努力或消极的差距。至于一些身在道门而心不在道门的人，还可能会有阳奉阴违、损公肥私甚至破坏制度的行为。这些也都是不奇怪的。关键是，我们年轻的住持们要懂得根据制度来治庙，而不是凭个人感情或者想当然来治庙；我们年轻的道友们要懂得根据制度来为

人处世，安身立命。因为，制度是我们学道、修道、行道和弘道的行为规范，是当今时代“道”的内容的一个方面。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于道的认识也会发展变化，庙观制度的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有的要淘汰，有的要新增，有的要丰富和发展。因此，健全制度还应该包含这样的意思，那就是要不断去完善制度，不断去修改制度，使制度在实行中发挥更加切实的效用。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们对道的认识要不断充实、丰富和提高。

第五讲 发扬民主

“民主”这个名词在我国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叫响的，当时人称“德先生”。从“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请进来以后，中国就开始了新文化的运动。我的青年时代就亲身经历其中。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概要“打倒”。“打倒孔家店”是其一，打倒佛道教是其二。几十年来，我一直疑惑不解，中国传统文化三项支柱内容统统被打倒了，那么我们中国还有什么呢？当时中国的政治动荡，军阀混战，经济落后，军事软弱，于是“全盘西化”就登场了，月亮也是人家的圆，面包比大米有营养，刀子叉子比筷子文明，等等。这些，当今的思想界正在作“反思”，外国的现代科学文明要引进，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要保护、要继承，这才是今天我们在创造新文化时应有的科学而辩证的合理态度。

其实，“民”和“主”这两个字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打倒一切的人当然也讨厌方块字，于是称民主为“德先生”。那么，“德、先、生”这三个字就不是方块字了？

“民主”这个词，按我的理解就是以民为主的意思，用社会上常说的话说，那就是要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以民为主和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本是早已有之的。孔家店

中有，道家思想中也有。《道德经》说“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十章)，意思是在爱人民、治国家时，要保持一种博爱而无为之心。《道德经》中还说到“对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如果说一个治理国家的人没有私心杂念，以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当然这个治国之人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以民为主和以民为本了。道教的《太平经》产生于东汉末年的民众运动之中。《太平经》宣扬一种“太平”社会的理想，称“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地之执平也。”太平就是平等。有了平等，才有民主。《太平经》并不否定国有国君、朝有良臣，但它认为“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对于《太平经》的君和臣，社会上通常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东汉时的国君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臣子则是地主阶级的官僚，因此。《太平经》追求的君臣民关系以及民为本的治国之道，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对于这样一种美好的幻想，太平道和《太平经》也确实付出过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去追求过。这就是说，我们道教在历史上一开始就曾为“民主”的理想去追求过和付出过。当然，我们的先贤追求的民主和我们今天

在创造的民主生活都有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它和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德先生”式的民主不同，也和无政府主义的“民主”的含义不同。

从道教宫观管理的角度来认识“民主”，当然是推进道教宫观正常管理下的民主，也就是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下的“民主”。如果用一个不很恰当的比方，那就是像《太平经》中说到的在“君”“臣”管理下的“以民为本”。一方面讲“管理”，一方面又要讲“民主”，似乎是矛盾的，因为管理就要集中，而集中和民主似乎就是天然对立的，不过，它们又是统一的。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那就是，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只有相互依存，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道教宫观管理有序地进行。

道教宫观管理中要发扬的“民主”，指的是三个方面的“民主”，也就是人事管理的民主，财务和总务活动中的民主以及教务活动方面的民主。首先，所谓人事管理的民主，主要是宫观管理的执事人选要任人惟贤，广开才路，不搞任人惟亲。在选拔执事人员和教职人员时，事前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且经过法定程序公平地确定，把认真踏实和扎实肯干的道众选拔出来担当宫观的管理工作。一些大的宫观在推举住持时，除了要听取本观道众的意见，还要认真征求诸山长老的意见，得到诸山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这就是人事管理上的民主。即使是子孙庙的管理，也是传徒不传子，对于传授哪一

个徒弟，师傅在决策前也要听取本观道众的意见。这样一种在人事管理上的民主就可以保证宫观管理的大权掌握在道心坚定、道风纯正和道业精湛的道众手中，使我们道教宫观管理健康有序的进行。其次，所谓财务活动的民主，主要是宫观财务活动要公开。收入的账目要公开，支出的账目要公开。道众的分配所得也要公开。在分配所得方面，要掌握公平的原则，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无依据的扩大差距。不能鞭打快牛，应该明确地奖勤罚懒。一些重大的开支项目以及一些牵涉面很大的分配项目应该经过宫观执事班子的充分讨论。这样一种财务管理上的民主可以保证宫观财务管理廉洁和节俭，保证道观的发展有个比较稳定的基础。第三，所谓教务活动的民主，主要是教务活动要公开。教务活动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做等等，都要听取道众的意见以及广大信徒的要求，并且把尽可能多的道众组织到教务活动中来。所有这些管理活动的“民主”，其目的就是要发扬宫观内道众和信徒的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调动大家积极参与宫观管理的积极性。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扬民主，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在加强道观管理工作中，通过发扬民主，给予道众和信徒对道观的人事、财务、总务和教务等工作以发言权、申述权、辩解权和参与权，并且对于他们的意见充分尊重和重视。如果我们能自觉地利用好这种手段，那么我们道教宫观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就会搞得更好，

而不是搞得更糟。反之，如果我们不是把发扬民主当成手段，而是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那么结果必然造成群龙无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等混乱的局面，真正吃亏的还是我们宫观管理工作的本身。

我到有些名山宫观去参观，有的道观中有事没人做，有人没事做，各殿堂执事道众各人自搞一套。住持和监院等有令不能禁，有禁不能止。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片面强调民主，不注意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决不能理解为道众和信众的自说自话、自搞一套。我们道教宫观管理的人事、财务、总务乃至教务等活动，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发表各自的看法，但是，一旦形成决议就必须服从执行，不能自搞一套。只有这样，道教宫观管理才能正常而有序的开展。

在50年代，我们道教宫观管理曾经开展过民主改革，出现过一种民主管理组织叫“民主管理委员会”。民主管理委员会后来就成为道观管理组织中的重要机构和制度。80年代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各开放道观的执事制度和民主管理委员会都已陆续恢复。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既有执事也有道众和信徒的代表，让道众和信徒代表与宫观执事一起讨论和议决本观各种事务，集思广益，改善和完善管理。民主管理委员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发扬民主的好方法，应该得到重视并且加以完善。

第六讲 集中统一

上一讲，我讲了发扬民主，意思就是在宫观管理中要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就是宫观中每一个道士以及每一位职工都积极地参与到宫观的事务中来，一起来搞好宫观管理。不过，光有“发扬民主”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强调另一个方面，就是“集中统一”。

讲“集中统一”，有些参加宫观活动的散居道士就不习惯，因为长期散居，散漫惯了。到了庙观里，一听有那么多制度管束就摇头，一看有那么多规定的工作要做就溜走。或者不逃走，也仍然拿出那种泡在茶馆里悠哉悠哉、说三道四的派头。这样的结果，就使宫观管理出现某一些环节管理薄弱。我原来也是散居道士，对于散居的“散”字实在是亲身体会的。当然，我并非在这里就是批评散居道士，并不就是说住庙的道士没有这类散的问题。可以这么说，住庙道士中“散”的习性同样也存在着。听说，有个庙观做炼度施食科仪，从晚上七点敲钟鼓，一直敲到八点钟还做不起来，有的在殿里，有的在院里，有的在云房里。当家的叫了这个，走了那个；叫了那个，走了这个。我听到这种情况，真为那个庙观的管理和今后的发展感到担忧。

说到宫观管理要集中统一，就一定要说说当今的社会。当今的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而且是组织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过去，我们说到组织，常常举户口管理作例子，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标志之一。每一个人，作为消费者和劳动力都有一个户口，然后被组织到计划的庞大的体系之中。现在，我们的社会还处在转型时期中，户口管理似乎不太重要了。不过，我已经感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更加庞大，当然也更具有活动性。和以前比较，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只有一个定位点，而如今，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有许多个定位。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以前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只要面对“条”的管理就行了，而如今，不仅要面对“条”，还要面对“块”，还要面对社会的大网上的许许多多“点”管理。因此，当今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尽管是在转型期，但是，可以说社会组织更加严密、更加庞大、更加活跃。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处在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没有别的选择，要生存就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性，提高自己的活动能力，以应付当今的社会生活，不然就无法生存，无法发展，更无法壮大自己。

说到加强道教的组织，常常让我想起民国初年的南北两个道教会的事。人们常说，道教总是比佛教慢一步。其实，在成立全国性的组织这一点上，道教何止慢一步，可以说整整慢了五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呢！正因为道教的全国性组织直到1957年才成立，因此，道教作为

一支社会力量直到四十年前才为现代中国社会所承认和接纳。在这以前，道教只能作为一种传统信仰的内容。现在，道教协会作为道教界的代表出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信仰生活之中，当然还不能说很有力量，但却已不容忽视、不容漠视，更不容鄙视了。

我想，只有明白了这些大的背景，才能提高我们集中统一、加强宫观管理的自觉性。道教的宫观是道教徒的活动场所，也是我们道教组织的基本单元。宫观管理的好坏，牵涉到整个道教组织的活力。宫观管理的好坏，除了有道众的积极性和自觉参与以外，还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也就是集中统一的领导。

说到“集中统一”，有人可能会说宫观里原来的方丈、住持制度就是集中统一了。因为那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当然是又集中、又统一了。我想，这样来理解集中统一实在是过分简单了一点。就拿方丈或住持的产生而言，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集中过程。按惯例，新的方丈或住持的产生，要有老方丈或住持的提名，还要有诸山长老的推荐，再要经本庙观的道众拥护通过，因此，方丈或住持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发扬民主和集中统一的过程。其次，一个宫观涉及的事情有许许多多，样样都要由方丈或住持一个人说了算，实在是不可能的。前不久，我在《藏外道书》中翻阅清代高道闵小艮的《清规玄妙全真参访内集》，里面有一份《执事榜》，闵小艮开列的执事名称有：都监、都管、知观、副观、书记、知客、司

库、典座、买办、贴案、饭头、行堂、火头、茶头、值岁、巡山、田庄、园头等等，另外还有西序的静主、高功、都讲、监斋、智磬、表白、经师、堂主、香镡、殿主、巡照、待者、启闭、杂务、智随、童子等等。闵小艮的职事名称以及分工显然来自北京白云观。从当时清末的分工来看，宫观内部的职务明显地分为两条线：一条线是“西序”，即教务和法务的工作。另一条线是宫观事务工作。两条线上的工作职务多达三十五种以上。闵小艮说：“夫大厦非一木能支，必须众材资助；丛林岂孤身可立，还期分职共襄。”（《藏外道书》第10册，第613页）“众材资助”和“分职共襄”是闵小艮这位金盖山高道的肺腑之言，因为如果没有两条线上各位道众的襄助，闵小艮的大方丈是做不成的，更不用说再去研究道教义理，写成《古书隐楼藏书》了。清末尚且如此，更何况当今的道观。我们今天的道观规模比起当年的白云观和梅花观等等可能要小些，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宫观内的事务还是那么多，因此要由一名方丈或住持把宫观事务统统包揽下来，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从这些年来的宫观管理的实践来看，由一位方丈或住持统吃的“一言堂”，总是“吃力不讨好”的，问题百出，矛盾重重，意见纷纷。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将方丈或住持制度理解为“集中统一”的全部理由。

“集中”是相对于“分散”而言的。宫观里的工作是各种各样的，它们是分散在各个部分，由分散的道众或

职工去做的。“分散”的工作和“分散”的人，要有人去分配、管理和督促，这就是集中。“统一”是相对于“分散”而言的。对于宫观里的大小事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干起来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方法，要有人去综合、比较和统一，以求得最好的工作效果。一个庙观里的领导，方丈也罢，住持也罢，他不能包办全部事务，但是他能将不同的意见和方法统一起来，然后抓住管理和督促，这就是发挥自己的作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将方丈或住持的作用理解为“家长制”或“一言堂”，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根据这几年宫观恢复以来的管理工作的实践，在集中统一方面行之有效的做法，大概不外乎三种：

一是健全管理委员会活动。各宫观都有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不能形同虚设，要发挥它的议事、决定和分配事务的功能。管理委员会要定期开会，会议要有准备，要让各部门在会上汇报工作，在会上讨论和决定宫观内的事务。

二是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制度是宫观事务活动规律的反映。制订制度，执行制度，检查制度，这就是抓住了宫观管理的关键。

三是宫观事务的岗位责任制。有的宫观将事务分解成一个一个岗位，每个岗位有明确的工作、工作量和工作目标，确定岗位的责任人。抓管理就是抓岗位的分配、

检查和督促。有的宫观还给岗位打分，以分的多少来确定分配和奖惩，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懒惰马虎的处罚的原则。

这三种方法，在不同的宫观中都是有用的，值得大家重视，进一步实践、总结、研究和推广。

最后还要说几句，现在我们宫观的领导班子，大多有许多青年道友参与其中。他们有朝气，肯吃苦，富于创造精神，当然，他们也有弱点。对于这些青年道长，我们老道长要爱护、关心和体谅。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年轻，就不听他们传达的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工作决定和安排。另外，还有一些不在领导岗位的青年道友，也不能因为大家都是师兄弟或师姐妹就不买他的账。人在领导岗位上，他(她)的说话就不是他(她)的个人的喜好和意愿，而是关系我们道教的事业。你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布置的事情你必须去做，不能意气用事。

第七讲 奖惩监督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赏罚分明”。早在韩非子的战国时代，我们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韩非子·八经》)。对于有贤德的人要奖励，对于行为暴劣的人要处罚，这是提倡善良的最好办法。不过，在那个时代，人们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价贤与恶，因此，那时的赏罚也大多是精神性的。

道教从成立起就有约束道士言行的戒律，例如：“三皈”(皈依道、皈依经、皈依师)，“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等等。各个道观还制订有“清规”，用以惩罚违犯戒律的道士。处罚的方法有罚跪、杖责、逐出道观乃至火化处死等等。今天，我们道士仍然要遵守这些有用的戒律，执行这些清规戒律。不过，这些清规戒律主要是针对道士个人的道德、行为和信仰制定的，其中有关道观和道士的关系的内容也停留在制订清规那个时代的关系的水平上，因此，它们对于当今的道观管理无疑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增加新内容，补充新规戒。例如：隔上几年，我们就要搞“评比”，评比的名目有“爱国爱教先进集体”、“爱国爱教先进个人”、“爱国卫生先进集体”、“消防安全先进集体”等等，这些评比反映了

今天的社会和道教的关系，今天的道观管理和道士修养的内容。不过，它们还只是精神鼓励性质的，开上个会，宣读先进事迹，发一张奖状或者一块铜牌，往墙上一挂。

在今天的道教宫观管理中，在执行清规戒律时，仍然要采用赏罚、奖惩的办法。评比，这种办法是有用的，因为通过评比，奖励先进，批评落后，启发和调动宫观内的道士自觉管理宫观事务的积极性，对今后进一步提高道教宫观管理水平当然会有所推动。不过，评比工作如果停留在“举善”的目的上，它的推动作用就会受到限制。据说，有的道观学习社会上定岗位、定人员和定职责的做法，将值殿、法务清洁卫生等等岗位都明确落实到每个道士和职工身上。对每个岗位的职责都明确折合成“分”，经常检查岗位责任的执行情况，在落实三定时就明确规定奖励和惩罚的办法，无论道士和职工一律适用。这样一来，奖惩制度就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既成事实的结果，推动了道观管理工作的有序发展。当然，这里的奖惩除了精神鼓励的内容以外，还包含一些物质奖励，尽管就其数值而言并不大，但是，效果是显著的。参观过这个道观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殿堂有人值勤，事事有人负责，天天功课正常，厕所洁净无味，地无纸屑，窗如明镜，接待室随时随地可以使用，让人心情舒畅。有人说：上海是一流的城市，上海的道观也应该是一流的道观。这里的“一流”不是指道观的场地有多大、道士有多少，应该是指我们的道观的管理是一

流的，道士和职工的素质是一流的。我想，正确而充分地运用奖惩的办法是会有助于我们创建一流的道观的。

至于说到“监督”，我们道教是十分明白“监督”的重要性的。做道场，“三法师”中就有一名称为“监斋”。监斋者，就是对道场、行仪的道士和施主等方方面面实行监督的意思。《金集大斋补职说戒仪》说到监斋的职责，一是“总握宪章，典领科禁，纠正坛职，振肃朝纲”，二是“周密察非，从容授简，有严有翼，毋滥毋堕”（《道藏》第9册，第74页）。意思就是，依照宪章和科禁，监督整个坛场仪式的进行，对于有亏犯的人，严肃纠正，不让坛场科仪有错，这些都是对坛场科仪的监督职能。全真派道观由于住庙的出家道士的数量多，流动性也大，因此，在清代就已有了较完整的监督管理制度，据清代闵小艮《古书隐楼藏书》中的《清规玄妙全集》的《清规榜》，其中开列的职事名目就有都监和监斋等监事职务，监斋列在“西序”项下，似乎就是监督斋坛行仪之事，而都监者“总括玄纲，纠诸执事”，位在众执事之上，这就是说，都监就是全观事务总监的意思，相当于什么都管的不管部长之类的角色。尽管在“清规”中，列有“凡常住办事克众利己，目瞞大众者，罚打斋”，“凡常住食物私自待宾、不上客堂者，跪香”，等等。但是，清规的主要内容和道观的监督设置，其指导思想是上监督下，也就是由都监或者监斋、都管来监督和管理全观的事务。但是，谁来监督“上”也就是由谁来监督都监或都管呢？

可能是住持或方丈，那么，方丈或住持又由谁来监督呢？清规里没有交代。我想，在那个产生“清规”的时代，大概也不存在由下来监督上的问题。《清规榜》中说：“使其用必量其材，尊卑有序；食其禄而执其事，小大无亏。”尊卑有序的思想规定了“上”是尊，“下”是卑。尊能指挥卑，上能监督下，这就是“序”。倒过来，当然就是无序，就是“造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当然就不存在由下来监督上的问题。现代的道观管理。我想，“使其用必量其材”的量才录用的思想，“食其禄而执其事”的岗位责任的思想，这些都是有用的。但是，不论是“尊”，也不论是“卑”，也就是说，道观内无论上下，在学道、修道、弘道和道观管理上，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都有权监督别人，同时又接受别人的监督。这是符合我们道教的教义思想以及现代管理思想的“民主监督”的精神的。就道观管理的监督体制而言，除了过去的清规榜上的“都监”和“监斋”的职能以外，今天还必须参照现代企事业单位管理的经验和模式，增加财务监督、总务监督、人事监督，特别是道观管理领导层的活动的有效监督，防止道观的住持、都管和各部门领导执事的道心不坚、滥用职权、任人惟亲、损公肥私等现象的发生。这是因为，今天的道观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要比过去紧密得多，道观的经济力量一般来说也要比过去充实得多，经济活动也要比过去复杂得多。也就是说，道士特别是道观的领导层接触钱和经手钱的机会也比过去

要多得多。钱有两重性。有钱了，做些好事，这样的钱有正面效应。可是，想钱想疯了，不择手段搞钱，贪污受贿，损公肥私，这些就是钱的负面效应。而对于年轻的道士来说，特别是领导层，腐蚀道心最厉害的是：金钱、女色、名誉、地位等。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辛辛苦苦培养的骨干力量沉沦，因此就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及时发现，及时督促，防微杜渐，保证道教事业在将来有所发展。

至于在今天的形势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道观管理的监督制度，我希望我们能细心体验道教经典中的启示，并且依靠各道观在实际中的不断创造，及时总结推广。

第八讲 道法自然

有关道教宫观管理方面的知识，以上我已经讲了七讲了，也就是“重视管理”、“分清脉络”、“选拔人才”、“健全制度”、“发扬民主”、“集中统一”和“奖惩监督”等等。所有我讲的这些内容，无非就是想说明一点：道教的宫观内部要加强管理。我们做道士的，特别是各庙观的新上任的青年主持，不会管理的要学会管理，会管理的要管好。管理工作就是要管好，要理顺。今天我要讲最后一讲叫“道法自然”。那么，一方面要加强管理，一方面又要“道法自然”，其间有没有矛盾呢？我以为，那是没有矛盾的。

对于“道法自然”这句话的解释，现在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自然”就是自然界的意思，可是又有人不同意，认为在《道德经》的时代中国还没有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界”的自然的意思。我们这里不去纠缠不同的解释，我把“自然”理解为万物运行时的一种性质或者状态，也就是说，“道”是不加限制、自己发生、自己存在、自己演化、自己消灭的一种性质和状态。顺其自然，就是人要适应事物运动的法则。不法自然就是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道法自然，应该是教徒处理天地间一切事

务的基本原则。因此，道教宫观的管理也应该以道法自然来处理一切。

宫观管理工作中的“道法自然”，照我看来，至少包含有三层意思：

首先，管理工作中的“道法自然”决不能理解为冷漠地对待宫观中的道众和职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而是要使被管理的人心情舒畅，积极性调动得起来。我曾说过，选拔人才，就是要让每个在道观中的道士感到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发扬民主，就是要让每个道士对宫观里的事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有畅所欲言的地方；分清脉络和健全制度，就是要让每个在宫观里的道士和职工知道自己每天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奖励和惩罚就是对每个道士和职工在自己岗位上做得好的要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做得不好的要给予批评和惩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把被管理的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说到：“五湖四海，高人羽士，或挂搭安单，栖冬结夏，设知堂一员，广于接待，素食粗衣，随缘安驻。务令身口安闲，逍遥无念，庶进道有基，身心无虑。其刻苦修持者，犹当周给其入山檀施，喜舍随缘。”天师要求我们热情接待道门中每一个真心学道、修道和求道的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道法自然”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从事宫观管理工作的道士和职工。

其次，管理工作中的“道法自然”决不能理解为轻

率地对待宫观中的财产和物品，放任自流，大手大脚。而是要使被管理的财产和物品各得其所，充分发挥每件财和物的作用。老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就是说天地之间每件财物都是有用的，珍贵的，值得好好保管的。以前我说到的“分清脉络”就是要使每一笔收支的钱财清清楚楚，该用的只要有能力就要去用，不该用的哪怕家财万贯也不花一文钱；要使每一件耗费的物品耗用得明明白白，该耗用的要节约着用，不该用的就要堵塞漏洞，用剩下的要整理、收藏和保管妥当，不至于霉烂变质，或者再要用时遍寻不着，又去买新的。财物两清，是“道法自然”原则在管理工作中的最起码的要求。天师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说到：“凡一岁赋税科差、殿堂修造、房院修葺、春秋祭祀、时序荐诵、吉凶吊贺、关防火盗、必以瞻众为先，悠久为志，务要公同出纳，明白登载。不得指私为公，各蓄私财，互分各据，擅自支遣。务令老安幼怀，香灯不乏，报祀以时，修葺勤谨。赋税预备。则上下雍睦，香火悠久，公私无窘逼之忧，宫观无兴替之患。”天师指出道教信徒给予宫观的奉献都是为了支持我们传道、弘道，同时为他们的道教信仰服务。“瞻众为先，悠久为志”是我们每一个管理道观的住持们时时要考虑的事。让每一件财和物都为弘道服务，从长远打算，就要求我们以“道法自然”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件宫观里的财和物。

最后，管理工作中的“道法自然”决不能理解为对

管理工作的大小事件消极应付，得过且过，而是要使我们宫观的管理事务，明白公正，不偏不倚，任何事情都能放得上台面，任何决定都有利于宫观的生存和发展。天师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还说到：“疾病互相扶持，死亡务从俭约，荐送俱不得昧公营私，亏瞒人己”，“其常住田土，例不许卖，亦不得私立契约，破荡卖易”，“如众职互相容蔽，以掩己私，尊长姑息不言，暗相护持，邻眷亦宜举行公议，以明去就，惩一戒百”。天师要求在道观的管理中，“不得指私为公，各蓄私财，互分各据，擅自支遣”，这就是因为“道”是最公正、最无私的。“道”显现在世间一切事物之中，无论贵贱，无论贫富，无论慧拙。因此，学道的人也应该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没有瞒天下人耳目的事。明明白白、不偏不倚地处理管理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就可以做到公正。“公乃大”，只有凡事公正了，才能真正做好宫观管理工作。

在《道德经》中，“道法自然”句前还有几句话。全句应该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这句话的第一个字是“人”，最后一个词落在“自然”上，因此，我想它的主题是揭示人和自然的关系。在道的自然状态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以为，人是有所作为的，而不是无所作为；人是能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人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通过人的有为的努力，可以达到无为的自然的境界，只是

一切要按道行事。

在结束我的道教宫观管理讲座之前，我还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决不能小看宫观中的住持的作用。天师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就有“住持领袖”专门一规。天师说：“其居是者，务必慈仁俭约，德量含弘，规矩公正，先开接引之方，导遇畜众，次谨焚修之职，请福消愆。裕国祝厘，莫大于报本；尊经阐教，莫大于推诚。其畜众之方，先严戒行规矩为要，警以罪福因果之报。田粮委库职管，绍赋税任砧基，应充饮食，修造各谨，司存晨昏，以神明为谨，修葺为心。”天师在这里对住持领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是极其原则的，但是无疑又是极其重要的，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那就是“政策决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现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了，道观也恢复开放了，道观的管理大权也交给我们道教徒自己了，管得好管不好就要看我们自己争气不争气了。张宇初天师对住持领袖的要求是全面的，但是，当今社会里，住持领袖们面对的管理事务应该说比起张宇初天师的时代还要复杂得多。一个住持领袖所需的道教修养、社交手段和处事方法等等能力，当然也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看，今天的住持更难当。特别是由于道教人材的断层严重，一批青年道士近几年来陆续被推上了住持领袖的岗位。坦率地说，他们中间有些人道心还不够坚定，经验还不够丰富，办法也不够多，所以常常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道门十规》中，张宇初天师特别告

诫住持领袖们，“毋贪富贵，毋嗜喧嚣，因而争相仿效华衣美食，广厦细毡，昧公营私，出入骑乘，呵拥仆御，交接权势，以致教化不行。源污流浊，甚则耽迷声色；外饰内乖，不畏香火神明。灵坛古迹，私畜俗眷，秽褻神祇。所辖住持，宜闻于有司，处决下山，不得蒙昧阿私，有坏规法”。这一段话，在当今的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我想，还是有针对性的，也是语重心长的。如果一个宫观的住持沦落到被张宇初天师斥责的地步，那么，由这样的住持掌管的道教官观，人们还可能有什么指望呢？

道教与 当代 社会生活

机在天地，亦在人心

——从“机遇”说起

在当今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里，人们常常说到“机遇”两个字，说要珍惜千载难逢的“机遇”，牢牢抓住“机遇”，用好“机遇”。

机遇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国有国的机遇，省有省的机遇，沿海有沿海的机遇，内地有内地的机遇，行业有行业的机遇，个人有个人的机遇，等等。古人说到“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就是指对待机遇要有紧迫感、责任感。

说“机遇”也罢，说“机会”也罢，说“时机”也罢，关键是个“机”字。道教教义思想早就提出了“机”的概念。“机”原来的意义是弓上的发箭装置。《说文解字》称，“主发谓之机”，后来又衍生出关键、时机和素质等意思。在道教教义中，“机”的出现自有其天地万物的存在根据和变化原因，人们能否抓住机会取决于对它们的认识。

先秦道家著作《南华真经》有《至乐》篇，称列子走在路上见到百岁髑髅，指之曰“未尝生，未尝死也”，认为从最低等的生物变化至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

机”。晋代成书的《冲虚至德真经》有“天瑞”篇，也称“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历代注家解释“机”为“群有之始，动之所宗，散有反无，靡不由之”，意思是动静、有无、散聚、始末、正反等等都是由“机”决定的。汉代《淮南子》的《兵略训》以“机”指行为变化的时机，称“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

大约在南北朝时，我们道教的《阴符经》问世。《阴符经》云，“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变定基”，意思就是天道和地道的生杀，都有其“机宜”，阴阳改变，时代迁谢，去故就新，都是“至公”的，自有其客观的发展规律。一旦循乎天道，到了变化的时刻就会在龙蛇起陆，天地反复。

《阴符经》还说到，“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意思就是对于天道的认识，依靠的是人。认识天道，把握机缘，关键是人心。天地之机，平素是不能察觉的。不论是发展的规律或变化的契机，人们常常是认识不清的。只能通过对于天时、地利和人了的认真分析和研究，才能洞察它和把握它。

《阴符经》还提出了“盗机”的概念，“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不见，莫能知也”，意思是日月运行，物形大小，都蕴含着神机。有些人可以利用神机，把握神机，人们也都能看到神机，但是许多人并不能理解它们。盗机，实质上就是我们今

天所说的认识机遇、把握机遇的意思。因为，机在天地，人对机的认识，就是从天地盗来的。

道教《阴符经》是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对于华夏社会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以及我们的道教都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日。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一部二十五史，我们的国家有过隆盛，也有过磨难。就是这四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也是屡经曲折。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出现了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加上二次大战后的冷战结束，国际上出现了相对和平发展的形势。十年来，这块土地上基本上又是风调雨顺。所有这些，都是天地给予我们国家的“机遇”。在我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百年来，这样的时机实在太少太少了，我们要珍惜它，抓住它，利用它，发展国家，壮大自己。

我们的道教也有悠久的历史。两千年来，我们的道教有过显赫，也有过屈辱。近百年来，特别是这四十年来，我们的道教和道教徒也屡遭磨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道教宫观修复，青年道徒培养，道协活动恢复，道教文化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所有这些，也是天地给予我们道教的机遇。在道教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百年来，这样的时机可以说从没有出现过，我们要珍惜它，抓住它，利用它，恢复道教，壮大自己。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机遇”。这个“机遇”既是时代给予的恩惠，又是环境制造的机会，更是自身努力创造条件的结果。现在，国家需要人才，道教需要高道，只有自身努力，准备足够的条件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和道教的需要。这个条件就是要能够认识天道地道，日月有数，就是要学会善盗天机，善知杀机。有些人努力了一辈子，也没有碰到“机遇”，一生郁郁不得志，把一肚子的鸿才大略统统带走了。有些人很幸运，踏上社会就碰到“机遇”，有名有利，施展才华。但是，无论如何，从自身来说，努力创造条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自身的条件，那么，既不可能认识机遇，把握机遇，更不可能去盗机，去利用机遇了。

无为治道，有为治人

——从“干预”说起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大潮之中，在社会生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传播媒介常常说到要减少行政“干预”。在我们道教中间，特别是一些青年道教徒，往往也大谈其减少行政“干预”，并且拿太上《道德经》的话说，要“无为而治”，希望政府宗教部门不要“干预”道教，道教协会不要“干预”各道观，道观不要“干预”道士，说到底，希望别人不要来“干预”我，我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

因为，人家拿出《道德经》为根据，那么，我们当然也要对“无为”的含义说几句。首先，“无为”同“干预”并不是反义词。“干预”并不等于不“无为”，不“干预”也不等于“无为”。无为是指处理万物和治理天下都要顺乎万物和天下的“道”，用现在的话说，做事要合符规律，顺其道而行之。“无为”强调的是对于万物之道的态度。但是事情还是要做的，治理还是要治的，不能认为“无为”就什么也不干。元代道士王景阳说：“自然之道本无为，若执无为便有为”（《明道篇》），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干预”，指的是在处理万物和治理天下时主动者与

被动者间发生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有符合规律的，也可能有不合规律的，统而称之都是干预。举个例子，现在是暑天，天气很热，穿着白道袍，拿把折扇轻轻一摇，凉风扑鼻，这也是干预。房间里装个空调机，把室温控制在二十五度，这也是干预。对于这种“干预”大家都说好。可是，到了秋天，天气很凉快，你还摇着折扇，或者还开空调，这对于温度还是“干预”，但是，大家就会认为，你可能有“病”。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干预”是经常发生的事。问题不在于“干预”，而在于如何“干预”，“干预”的后果。我常常对小道士说，现代社会是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人际关系非常紧密。上海的道教和社会生活也是非常紧密的。拿上海白云观来说，点的是电灯，烧的是煤气，喝的是自来水，每逢抄表的日子，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都要来抄表，还要到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按单据付费。如果不付就断电、断气、断水，上海白云观就要一片漆黑，没吃没喝。你说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就不是“干预”，当然是干预。比起过去点油灯、烧柴灶和喝长流水的时代，上海白云观的道士的生活，完全是在“干预”下生活的，因为那个时候，到河里想挑几桶就几桶，到山上想砍几担就砍几担，油灯想点多久就多久，有谁管呢。如果那也叫“无为”，那才是对“无为”的浅薄的理解。现代的社会生活中，被“干预”的事，实在不胜枚举。在马路上走路要走人行道，遇到红灯要停车，超过停车线还要

罚款。坐火车必须准时到达，还要在指定的座位就坐，既不能迟到，又不能乱坐。否则误了车，丢了位置，自己倒霉。这样的“干预”如果没有了，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就无从组织起来，这是时代的要求，它已经同我们前辈的生活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不要套用社会上的“干预”的提法，何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行政“干预”有时还是免不了的，不该绝对否定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宗教徒只占少数的国家。在现存五种宗教中，道教又是一个小教，无论是教徒人数、道士人数、道观数量等等都是最少的。道教又是个土生土长的宗教，缺乏海外的声援，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不容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依靠政府依靠谁呢。有人可能会说，过去党和政府曾经压制过宗教，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天改了，不压了，我们就要依靠政府，争取政府的正确“干预”，帮助我们落实政策，发挥作用，维护我们道教界的合法权益。我们不要因为有了过去的错误“干预”，而失去争取正确“干预”的机会。当然，宗教干部的政策水平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今天有些人在处理和道教的关系中不能说没有缺点，但是，要相信政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耐心商讨。某时某地的政府干部和道教的关系会逐步得到调整和改善。

其次，说到道协和道观的关系。有人认为道协“干预”道观太多，这又是停留在过去的看法，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道教协会。作为一个宗教实体，一支社会力量，

同其他宗教比较，我以为从总体上说，道教协会的作用不是发挥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就拿财务来说，有些道观的住持还是过去的一套袋袋账，或者流水账，特别不愿意道教协会来干预道观的财务。不干预不行啊，有的道观的账目就是一袋袋报销的发票，这样的财务怎么能适应今天社会的经济生活秩序呢？现在的财务管理是一套专门的学问，有收支入账、借贷分登、资金周转、外汇存储、财税政策等等，我们道观的住持不好好学习，又不接受“干预”，仍然沿用过去道观一套的收支方法，还说道协是“干预”道观，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何况，道协不是来问道观要钱的。当然，道观支持道教协会也是应该的，因为道协是道教实体的代表。

至于，说到道观和道士的关系。除了正一派有部分散居道士以外，绝大多数道士都归属于各道观管理。现在散居道士也由道协管理。作为一个道士，他的行为要符合政府的法律、社会的道德、道教的戒律以及宫观的清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道士所受的约束比起普通人来说就多了二层，因此，他的行为当然会多受“干预”。以为在方内受“干预”，想到方外不受“干预”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在各道观都缺人，好不容易培养出了一些青年道士，目的就是为了让在管理、法务、协会等工作中加强力量，顶上岗位。如果因为有游方的传统，就可以随意离职，不辞而行，那么宫观和协会的活动如何才能正常化。因此，游方的传统也不得不受到一定的

“干预”。

道教不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因此，道教不存在减少行政“干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道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个社会组织。为了加强组织的力量，组织内有形和无形的“干预”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当然，这些“干预”都应顺其“道”而行之，借用一句世俗的话，要符合“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道教的领袖队伍水平不高，各级干部数量严重不足，水平参差不齐，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提高，努力培养，其间“干预”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道德经》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我们学道是要“无为”，特别是修炼更要注意“无为”，要循乎天道，不勉强，不过分。然而，在管理道教事务和处理同世俗社会的关系时，我们更要注意太上的后半句“无不为”。“无不为”者当然是“有为”的意思。当然“有为”也要循乎天道，不勉强，不过分。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方法区别对待，所以，我认为无为治道，有为治人。以“无为”来批评“干预”，是片面的，对道教事业不负责任的。

生活日趋富裕 精神保持清虚

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繁荣，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提高，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从来道观烧香的香客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道观刚恢复时，在香金柜子里，奉献的大多是角票，可是现在大多是上元、上十元的钞票了。从我们道士在道观里领取的生活费用，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恢复时，值殿斋醮一个月领几十元钱，大家都已经心情愉快，十分满足了，可是现在计算一下一个月的总收入都是百元以上的了，成倍地增加。不论是上海的道观，或是外地的道观，这十多年来的恢复装修，大多是粉漆彩绘，贴金挂银，沙发地毯，电视空调，显示出一副十分气派的风度。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生活切切实实改善了，生活水平扎扎实实提高了，我们的口袋实实在在鼓起来了。这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我举双手拥护。因为，这是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根，《清静经》说“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既然“长养万物”，那么现在万物得以长了，得以养了，当然符合“道”的，是天时地利，遵“道”行事的結果。反之，如

果让我们生活继续贫困，继续每月拿三十六元生活费，万物得不到“长养”，那才是逆“道”行事，不符合自然和社会的规律。

在我们的一些道教信徒中，乃至在一些青年道士之中，有些人希望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合理合法地增加自己的收入，这都是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的。只要本派本宗戒律允许，一些青年道士在休息上街时着一双皮鞋，穿一条毛料裤子，喝一罐可口可乐，戴一副金丝眼镜，或者看一场有益身心的电影，这些也都是无可非议的。可以预料，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来总会有这样一天，我们的道观也会用上对讲机和自动扶梯，我们中一些道士也会有自己的住宅、电话和汽车等等，虽然这一天的到来还要等很久，但是生活会富裕，会改善，会提高，这个总趋势是合符“道”的，因此，它也应该得到肯定。不要认为，我们在庙里穿的是道褂、蓝海青，我们的生活也永远只有白和蓝这个水平、这个色彩。

但是，我们在肯定生活富裕这个目标的同时，也要强调一个有道之士如何去追求以及在追求中具有怎样一种精神境界的问题，也就是我要说的另一个方面，在精神上要保持“清虚”。

所谓“清”，就是“静胜热，躁胜寒。清静为天下正”（《道德经》四十五章）。凡是一个人所追求了，就都会产生一个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追求的问题，概括起来，一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静和寒；另一种是不正确的态



陈莲笙道长在上海市政协、统战部举行的祝寿座谈会上致谢词（1996年）。

度，就是躁和热。因为道的发展是自然的，“道法自然”；因为是自然的，所以它只能是缓慢的，逐渐的，从数量到质量，从点到面的循序渐进，也就是有些哲人说到的螺旋式的缓慢地上升。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是跳跃式的。历史上无数事实以及人们的无数经历都说明，跳跃式的发展，必然带来的是跳一级，退二级的结果，而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攀登，才可能达到发展的顶峰。而这种追求跳跃式的富裕的态度必然就是躁和热的态度。社会上有些人说，想发财就要冒险，就要搏，他们认为最快的致富方法就是摇奖中彩，赛马中彩以及赌博。有的人还到道观里来求神灵保佑他冒险成功。我想，因为他们追求致富的方式和态度是不符合“天道”的，所以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天道无亲，唯善

是与”(《太平经》),神灵不会保佑一个人发财致富,而让无数人破产贫穷。其次,富裕也有个尺寸,这个尺寸受到时间和地点的条件限制。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抄出一万元钱的存款,那就是巨富了。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一些地方将“万元户”作为富裕的标准,最近又从南方传过来的顺口溜说“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元刚起步,百万元才马马虎虎”,我们这些人听了既高兴又摇头,高兴的是富裕的标准提高了,社会又有了发展,总有一天,这样的顺口溜又可能变成“万元户是贫困户,十万元不算富,百万元刚起步,千万元才马马虎虎”;摇头的是我国的地区差别很大,有许多地区刚刚解决温饱,有的地方还需要扶贫,这样的顺口溜把人们的胃口吊得越来越大,富裕标准提得越来越高,让那些即使已经是万元户的人都感到“压力”,其结果只能是心情急躁和头脑发热,以为沿海地区遍地是金,盲目地往沿海跑,到了那里以后又感到失望,于是偷、抢、骗、拐,甚至绝望。所以追求富裕的目标的确定又有个“清静为天下正”的问题,不正了就必然反其道而行之,由热和躁而最终走向“富裕”的反面,有的人还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所谓“虚”,就是“虚怀若谷”,我再加一句,要“虚怀若海”。这几年来,我参访了许多名山宫观,到过不少江河湖海。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道教界的前贤要在山上和海边筑观修道,只是因为它们远离尘世吗?不是。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处身于山间和海上

更能理解“道”和修习“道”。因为，你站在山上极目远望，那山峦起伏，层林密布，云雾飘渺，你会感到天“道”的伟大而个人之渺小；你环顾海上，不论船体多大，随浪摇晃，任风摆布，你也感到沧“海”之伟大而个人之渺小；你看到山石上雕刻的前贤名句和手迹，你都会感到天地之悠悠而个人生命之短暂。归结起来，“天道”是永恒的、不息的，而个人是暂时的、短促的。天道是创造的、无私的，而人享受着、占有着天道的恩惠。我们学道的人，就是要学习天道的创造和无私，把自己暂时而短促的生命融化到永恒和不息之中，使自己的胸怀宽广得如同山谷，如同大海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如果生活的目标只是去追求物质、追求财富，那么眼光就如同苍蝇和蚊子的眼光一样，真是“蝇头小利”了。一个人的生命十分短促，八十岁的人，前二十年是享受父母和社会的培养，是个消费者；后二十年是领取社会和子女的供养，是个受供养者；中间四十年的前二十年要生儿育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收入不多，支出不少，苦苦节约，入不敷出，十分艰辛；可以稍微有点积蓄而改善生活的是中间四十年中的后二十年，但是二十年里又能做出些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来呢。退一步讲。你就是达到了某种富裕的程度，“天道无亲”，最为公平，你是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你也别想带走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对于这一点，我们学道之人是看得最为透彻的。据说香港有个人赛马中了彩得到几亿港币的彩金，这个

人没有拿这些钱去花天酒地、买车置房，而是全部捐献给了斯坦福大学的华人青年的奖学金，帮助我们华人的海外学子继续深造。我听了很感动，香港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有的人尚且不为金钱所动，何况是我们这里，我们学道之人呢？我们享受着“天道”的如此恩惠，还是让我们敞开胸襟，像山谷和大海一样对待这个飞速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循道而行，为这个世界多做点善事、好事吧。

炫耀和养晦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群众在生活上真正得到了实惠,收入增加,于是经常听到一些人的议论,说某地某时,有人大摆筵席,每桌八千八百八十八元。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称某些精品名牌,专供大款,一个手表售价高达几十万元,一个钻戒售价高达几百万元云云,照样有人光顾,一销而空,等等,等等。

这些议论和消息,对于我这样的道门中的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听了只是淡然一笑而已。但是,对于民众却有相当影响,因为它提倡一种炫耀财富,鼓励贪欲,刺激不择手段攫取财富、挥霍财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具有一定副作用。

这里,我想从“炫耀”和“养晦”关系的角度谈点想法。

所谓“炫耀”是就人际关系而言的,也就是对别人的炫耀,生怕人家不知道。当然,炫耀就要有“本钱”,这个本钱,人和人并不一样,有人炫耀权势,有人炫耀地位,有人炫耀才学,有人炫耀金钱,现在社会上较为普遍的则是炫耀财富。就炫耀的人来说,其目的无非是想得到人家的赞扬、歌颂、羡慕,以求得心理自我满足。

当然，具有这类心理的人，大多是贫穷够了，压抑久了，一旦口袋里鼓起来，就要求发泄一下长期在贫穷和压抑下受到的煎熬，这是可以理解、可以同情的，而且一旦渲泄满足以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会继续像穷人那样省吃俭用，并且收敛起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以追求财富为生活目的，并且以炫耀财富为享乐手段的时候，那就不是为了心理上的自我满足，而是为了在心理上榨取别人和欺压别人了。这种人在行为上当然也会不择手段地榨取别人和欺压别人。

《道德经》五十三章说，“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意思是说，穿戴华贵，饮食奢侈，使用最贵重的器具，口袋里财富鼓鼓的，都不符合道，也不是有道的人应该做的事。学道的人不是不要财富，生活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口袋里没钱是不能吃饭、穿衣和坐船乘车的。但是学道的人应该明白的是财富是天下人共同创造的，因此，应该为天下人共同占有、共同享用。这就是《太平经》里所阐述的“太平”社会的理想，《太平经》把那些掠夺财富、占为己有的人比喻作米仓里的老鼠，就是说天下的米是天下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批评老鼠不劳动而占有天下人的劳动。在当今的社会里，有没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劳动致富，只是劳动的类型不同，有的脑力，有的体力，有的生产，有的销售，有的贩运，这些都是劳动，都应该得到尊重。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值得安慰自己的，值得让别人知道的是我们诚实的劳动，有智慧的劳动，而不是这个劳动的一种成果——财富。《道德经》三十四章说“功成而不名有”，这就是说，我们学道的人追求的应该是“功成”，而不应该是“名有”，事业的成功，目标的达到是主要的，而至于功成以后会“有”些什么，这不是目的，而且不应该放在首位，“少则得，多则惑”。得到的“有”多了，人的本性就会迷惑，方向就会迷惑，道德就会迷惑。至于说，有人拿“有钱、有车、有房”来炫耀，那就更不屑一顾了。《道德经》五十八章说到，“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圣人有光辉，那是他的德行和功力自然发出来的，然而圣人却不向人炫耀自己的光辉，这就是“光而不耀”，也就是“养晦”、“韬光”，不仅不向人炫耀，而且要主动地、自觉地收敛自己的光辉，不使耀人眼目。

我以为，首先，之所以有了光辉而要“韬光养晦”，是因为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道德经》五十九章称“治人事天，莫若啬”。啬，不是吝啬，而是收敛的意思，收敛自己的精力、财富和一切耀人眼目的东西，不做天下先的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奔成功之路，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以其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就是这个意思。喜欢炫耀的人，总喜欢把自己的“小”说成“大”，其结果不仅不能成“大”，连“小”也会葬送。有的人还有一种心理障碍，说过几次谎话便觉得它是真实的。因

此，炫耀的人，便会误以为自己是真的百万富翁，天下巨人一样，这种人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一旦牛皮戳穿，剩下的就什么也没有了。而不炫耀的人、韬光养晦的人，就可以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做出成绩，取得成果，最终“成其大”。所以，“养晦”有它的思想基础，就是道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次，之所以有光辉而要“韬光养晦”，是为了防止旁人的妒意和谋害。不论是权势、地位、才学，或者是财富，人间社会中人与人都不一样，这种差距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会越来越大。把有能力和有财富的人剥夺了，使其同无能力和无财富的人一样，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合法合理的。但是，人与人对此的态度并不一样，有人承认，有人发奋，有人拼搏，也有人嫉妒，有人眼馋，有的人就铤而走险，企图把别人的能力和财富据为己有。在这种社会环境里炫耀自己就只能把自己暴露在明处，使自己丧失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能力。有时听到有人遭到暴力抢劫，其原因之一就是戴着贵重的首饰，被人砍了手指，拉坏耳垂，撕破衣服，或者在公共场合露出钱包，被人盯住，到人烟稀少处，遭到暗算。其结果都是被害，而其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炫耀。

其三，之所以有光辉而要“韬光养晦”，也是因为为了培养有独立能力的下一代。现在的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因此孩子受到宠爱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多，受到家庭生

活的影响也深刻而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在孩子面前炫耀，孩子就既是第一个接受炫耀的对象，又会回头以父母的炫耀作为资本去向别的孩子炫耀。过去孩子中间有比谁家父母干部级别高的，如今又有比谁家钱多，房子大，条件好的。于是，就必然在下一代中养成一种依靠父母、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的坏习惯，最后成为没有出息的一代。这种结果，无疑都不是做家长的所希望的，而究其根源，也是在做父母爱炫耀这一点上。

有的人认为致富而不炫耀是一种两面派，因此“韬光养晦”是一种两面派的哲学。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实在离“圣人”太远了。《道德经》说过“光而不耀”这明明是一面派，怎么能理解为两面派。在人间社会里，有权有势，有地位，有方向，乃至有钱，既然“有”，那必然自身就会有“光”，《道德经》并没有要我们掩饰这个“光”，不使其有“光”，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个“光”，处理这个“光”，也就是说“光”照人间是个客观事实，焦点在于不使光“耀”人眼目，误人误己，坏了最高的学道的目标。因此，这是一面派的哲学、至人的崇高哲学。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只有那些明明没有“光”却要拼命炫耀，或者只有小“光”而要炫耀为大“光”的人，那才是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因为那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对人对己是两面的。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光而不耀”呢？我以为除了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权势地位、才学、财富以外，最重要的

一点是要为社会、为他人多做好事、善事，更不要去榨取、剥夺和残害别人。有权的人多想着为国为民使用权力，有势的人不利用手中之势为自己家庭谋取私利，有才学的人一心为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做出贡献，有钱的人在个人致富的同时，多为还处于贫穷阶段的地区和人民谋利益，多为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增加基金，多为鳏寡孤独、残疾人谋取福利，多在庙里烧香祈愿做些功德，这些都能使自己更加充实。“光而不耀”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品格的高尚、家庭的平安、子女的成长和晚年的充实幸福。

《道德经》七十章里说得好，“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我希望天下有玉的人越来越多，“被褐怀玉”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满和知足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人应该不满，对于现实的不满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说法很容易受到涉世不深的青年人的响应，因为青年人大都有追求，不满足于自己的境遇和现状；有追求，希望自己的境遇和生活更好。于是，他们也就相信不满就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不过，稍有涉世经验的人都清楚，世界上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不满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也往往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人的不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问题的焦点是不满什么，为什么不满，也就是说，不满取决于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例如：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个人品质，等等，等等。

有的道徒由于在世俗社会中追逐名利或者追求情爱受到挫折，因而进入道门。这些人中，不能说没有有才华和能力的人，然而因为他们追逐的欲望并未得到遏制，所以到了道门之中仍然自命不凡，不满师长，不满规戒，不满收入，不满晨钟暮鼓的道门生活，悲天尤人，牢骚满腹。这样一种不满，只是他世俗欲望在道门中的反映。道门中，除了此人自己以外，恐怕没有人会赞成这种不满，更没有人会认为这种不满会推动道门事业的兴旺发达。

有的道徒虽然没有明显的欲望追求，但是对自己的估价过高，自以为是，怀才不遇，总认为师长亏待了他，道观亏待了他，道门亏待了他。他们不满周围，不满道门，怪话连篇，搬弄是非，于是或者放荡不羁，不守规戒；或者颠三倒四，制造混乱；或者无事生非，作梗捣乱。这样一种不满，也是世俗欲望在道门中的反映。道门中，除了此人自己孤芳自赏以外，恐怕也没有人会欣赏它，或者赞成这种不满，更没有人会认为这种不满会推动道门事业的兴旺发达。

那么，这是不是说我反对一切的不满。不是。从不满到满，从满到新的不满，又从新的不满到新的满，生生不息，无穷无尽，那是天道的表现。月亮从缺到圆，又从圆到缺；太阳东升西落，由黑至明，又由明变黑；云彩由疏而密，又由密而疏，都是这样一种天道的满与不满的表现。社会由低级到高级，财富由匮乏到富足，也是这样一种从不满到满的天道的表现。不满是天道，满也是天道，从不满到满以及从满到新的不满都是天道。问题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天道运行之中，怎样认识和怎样动作。只有符合天道的不满和满才可能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社会和有益于道门。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害己害人。

现在的天时、地利和人和给了我们炎黄子孙一个机会，要迅速使我们国家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这就是天道。在这个天道循环之中，我们如果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这样的认识和动作就是

替天行道。如果我们心怀不满，反对改革，妨碍开放，动荡社会，破坏经济，那么这种人的不满就不符合天道之运行，最终只能被天道所唾弃。

天道也给了我们道教一个机会，要恢复道教教化民众的功能，重修宫观，培训道徒，再开宗教活动，弘扬道教文化，这也是天道。在这个天道循环之中，我们不满现状，积极参与道教活动，弘扬道教，这样的不满也是替天行道。如果我们心怀不满，在教内沽名钓誉，争权夺利，制造混乱，贻误教化，那么这种不满也是不符合天道运行的，结果也只能被道教唾弃。

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合天道的不满，是与人与己有用的，可以成为一个人奋发向上、替天行道的动力。而不符合天道的不满，则是害人害己的东西，最终葬送自己，毁灭自己，并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符合天道的不满是有欲的，但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欲，而是为国为民为教的欲。

不符合天道的不满归根到底是个人的欲。尽管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欲的表现有所不同，有的人是权欲，有的人是利欲，有的人则是食欲、酒欲、色欲等等，归根到底也只是为自己谋取一点蝇头小利。《道德经》早就教导我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这些千古名言，都是我们所熟悉，也是告诫我们要克服乃至消除不符天道之“欲”的座右铭。

人们经常批评《道德经》这句话，说它会把人“引导到消极退缩的道路上去”，似乎人们无不满、无欲就是一个“木头人”。其实这是缺乏分析的误解。生活在社会的人必然会有名利之遇，这是不可避免的。替天行道的人会有，逆天行道的人也会有。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人的追求，体现在一个分寸之上。《道德经》就说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由此可见，太上肯定了“名”，只是不能“甚爱”；肯定了“货”，只是不能“多藏”。能够替天行道的人，不满现状，做出成绩，但是他们不会甚爱和多藏，因为他们并不以“名货”为追求目标，当然他们不会受辱，也不会惹祸。一些追逐名利之欲的人，他们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卑劣丑恶，越多越好，其结果只能被“名货”烧身。这些无耻之徒如果都能成为“木头人”，天下或许会更太平点。

无为和管理

“无为”是道教教义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道德经》说：“圣人处无为之事”（二章），因此，我们道教中人待人处事都要无为，也就是要顺应天道、顺应自然，而不作违逆天道、违逆自然的事。

对于无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常常以为是消极的，说道教的无为，就是什么也不干。其实，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因为，《道德经》三十七章里还说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既然是“无不为”，那就是样样都要为，无事不为。这里有没有矛盾呢？并不矛盾。道教处身于千变万化的社会之中，要生存就要为。就拿道门的事来说，恢复宫观，清洁宫观，管理宫观，经忏法务，接待香客，招待来宾，恢复道协，开展协会工作，处理好道协的人事、财务、宣传和教务，等等，事情千件百桩。现在，一些道友常说整日忙碌，不得休闲，这是真话，也是实话。我年已耄耋，力不从心，虽然上海道教已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接班人，但是仍然事务繁多，不得不支撑着干。这些道门中的事，能够不为吗？显然不能。至于道门和社会有关的事更是多得无法枚举。所以，这些年来，各派各山各宫观的道士，特别是一些道门领袖，都

是忙得不亦乐乎。那种以为进入道门，就可以悠哉悠哉，晒晒太阳，念念清经，吃斋打坐的想法，成了不符合实际的了。当然，处理道门中的事情以及处理同社会有关的事情，我们都要顺乎天道，顺乎道门的规矩，同时适应社会的变化。这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真实的内涵。

在我们明白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以后，就能够正确对待道教中当前十分迫切的一件事：加强管理。现在社会上谈管理谈得很多，依我看，道教中的管理一是管，二是理。

所谓管，古时原指一种细长的圆而中空的乐器。管上有一个个洞眼，吹而有声。横着吹的是笛，竖着吹的是箫、是管子、是唢呐。每根管上的不同洞眼有不同的音，手指按错了就会走音跑调。因此学吹笛、吹管子和唢呐的既要学会气法，又要记住手法。一个洞眼一个音，这就叫做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管的首要意义，依我看，就是各个部门都明确自己的职责的权限，发挥自己的作用。殿堂管理不做本殿的清洁管理，经忏法务不念经做法事，财务不理账目和收支，房产管理不明自己家底，办公室不处理大小杂务，自己不管理还不允许人家批评，那么还谈得上什么管理？当然，各部门的各司其职和各尽其责，主要依靠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发挥作用，克尽职守，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那就是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以小权谋私，不以小职谋利。这

些负责的道长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们就是高道，而不论他们的年龄几何。《道德经》上说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十一章)。从生活中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一个车轮要有几十根车条来支撑，车条崩断，轮子就会变形。车轮变了形，那车子就动弹不得。我们道教的事业也一样，加强管理就像维护车轮一样，使每根车条都发挥作用，使宫观和协会的各个部门都能发挥作用。

所谓理，古时原是指治理、处理和办理的意思。处理大小事情都要有个法度。社会上有一套法律、法规和道德。在我们道教中，过去有些清规戒律，但拿来应付当今生活是明显不够了，因此也要建立一些章程制度，例如：协会的章程，宫观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制度和规章，经忏法务管理制度，财务制度，门卫制度和接待制度，等等。有了这些制度，按照这些制度办，我们处理大小事情就有章可循，有则可依，使宫观和协会内部的活动循序渐进。当然，在道门同社会有关的活动，中，我们更要熟悉社会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各种章程规定。道教协会是个社会团体，团体就要有法人代表，因此作为会长的我也就成了法人代表。这对我本人来说，完全是个新事。道教有许多房地产，历史上那些房子和土地都是宫观的，它们属于公产，也不办什么土地证，如今明确归属就要登记，要办证，委托出租的还要签合同，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按社会上的法律和制度办理。要

管理好道门，不了解或者不熟悉这些都是不行的。另外，我们要处理好大小事情还要发挥办事人的作用，掌握尽可能多的社会信息。最近上海城隍庙在修复工程中，屋顶的脊顶大字“国泰民安”等十几个大字要贴金箔。一家施工单位开价每个字一百二十元，金箔自理。我们修复组的道友多询问几家，找到一家每个字只要十六元，金箔自理。贴金后的效果，同样满意。因为，现在的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在这一体制下办事，没有人际关系，没有信息，没有办事人的灵活的头脑也是不行的。

以上我所说的管理，说明道教的管理是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教中的人只有做到顺乎天道，顺应自然和社会，才能真正的“无为而无不为”；而顺乎天道，顺应自然和社会的管理，“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才是真正的管理。

血脉贯通 百事兴旺

道教的“道”是什么意思？对此，人们议论得很多。有说是规律的，有说是法则的，也有说是自然和社会之外的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有道理。从仓颉造字的本意来说，道，只是路的意思，而且那个路还是水路，船在水上行就是道。如果拿人的身体来打比方，那么人的血管就是一条水路，血管畅通，人的营养和吸收的氧气能够到达人体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那么，这个人就是健康的人。反之，在心脏里不通了，那就是心肌梗塞，心不跳，抢救不过来，就会死掉。如果拿社会上的事情来打比方，那么十年改革，百姓致富，主要靠什么，一靠政策，二靠修路。老百姓说“若要富，先修路”。大概这十年里修的路，恐怕比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任何朝代的任何十年修的路都要修得好，修得多。我们的一些改革举措常常说是“理顺关系”，这个理顺关系，说穿了也是修无形的路。原来不通的现在要开通；原来通而不畅的现在要通畅；原来这样走的路，现在要改成那样走，无形的路和有形的路都畅通了，经济就腾飞，政治就稳定，社会就发展。老百姓要说话那是“言路”；老百姓要发财，那是“财路”；老百姓中

有人才，那就给“才路”；老百姓要做买卖，那就修“马路”。路路通畅，社会就充满活力，国家就有无限生机。从“道”的本意来讲，社会得“道”了，国家也得“道”了。当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和国家里的人也就得“道”了。

社会要发展，社会的血脉就要贯通。道教要发展，道教的血脉也要贯通。按我的理解，道教的血脉贯通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道教内部的自身血脉要贯通，另一层意思是道教和国家、社会之间的血脉要贯通。

道教从它创立开始就是一种信仰者的社会组织，有它自身的组织系统，开始称方、称治，后来又有道观组织，后来又建立了十方丛林制度和子孙庙制度，现在又有宫观管理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另外，还建立了各级道教协会，协会也订立了各种章程。这些制度和章程都是为了保证我们道教稳定而有序的管理，以维持它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制度和章程不是要把我们道教管死，管僵化，就其出发点而言，恰恰是为了使我们自身的血脉贯通，保持健康。最近，随着全真和正一道派的青年教徒逐渐培养增多，传戒和授箓制度也已恢复，这些也是为了使道教人才培养和提高的血脉贯通。当今中国社会有了各种各样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这种制度使大家有了提高的目标、事业的奔头。传戒和授箓也有点类似于此。它恢复的意义应该是十分深远的。道教作为一种组织，自然会有它的领导人物、代表人物，也有它的一

般道士，另外还需要有一批负责而活跃的各级住持，套用一句社会的俗语就是中层干部。这样一种层次结构的有秩序的运作，自然道教就会全面恢复和发展。当然，天时有春夏秋冬，人也有生老病死，保持各级都后继有人，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道教的千百年历史说明，在道教的内部，保持通畅的人才选拔之路、生财自给之路、民主管理之路和规戒监督之路，是我们道教能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经验。

另外，道教要向社会敞开自己的大门，使自己和国家、社会之间的血脉流通，畅而无阻。道教在历史上曾经受到多次朝廷的恩宠，这些恩宠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封赐了多少高道，多少钱粮，主要的是在朝廷的扶助



陈莲笙道长（前左二）与前来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讲学的澳大利亚著名教授柳存江先生（前右二）等合影于上海白云观老君堂（1998年5月）。

下，使道教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密切连接，使道士和朝野人士密切沟通。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教不可能再有以前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自己封闭自己，不向社会敞开大门，就等于一个人塞住自己的鼻孔，不吸取外界的新鲜空气，久而久之，必然窒息而死。道教在同社会的联络中，必须注意联络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联络社会有影响的人士，联络各界知识分子，联络普通的道教信徒，在对外敞开中输入新鲜成份，活跃自身机体。这种联络在我们道教恢复初期需要，因为我们当时无论在社会支持、舆论响应和财力物力等方面都感到力不从心，联络各界朋友的支持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现在协会活动渐趋正常，宫观活动开展频繁，青年道士已经培养到一定数量，我们中的一部分道徒对于外部的联络就不是那么重视了，又有了一种封闭自己的倾向，这是完全不应该的。首先，我们道教要能够生存，就要依靠社会上的广大道教徒的奉献、供养和布施。人们常说和尚道士是“十方”，因为他们要靠“十方”供养，要“十方”来供养，就要加强联络。许多名山宫观已经注意与经常来烧香祈愿的信徒建立稳定的联系，在信徒中开展经常性的宣讲教义等工作，这都是十分必要的。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以及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弘扬道教文化、培养道教人才以及整理道教遗产等方面，都有许多真知灼见，不断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也是十分必要的。至于政府部门，特别是同宗教管理部门的联络

更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必须始终紧密依靠政府各部门的支持。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也如此。在加强联络中，会花去我们的精力和时间，这些都是值得的。就目前各地道教宫观开放情况而言，青年道士的培养工作还要加强，还要加快，同时在条件成熟时，还要努力培养道心坚定、品学兼优的高层次的青年道士。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和国家社会的外部环境充分沟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道德经》六十六章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只要我们道教如同江海，上下内外，血脉畅通，机体充满活力，那么我们道教一定会生存和发展得更好，并且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继承传统和适应社会

道教，如果从张陵创教算起，是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宗教。如果从黄老之学的渊源算起，我们的道教，至少已有五千年了。一种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道教那就是丰富的文化积淀。道教的传统文化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历史上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辛勤服务，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据说，元世祖曾经要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入朝，并指定要看祖天师张陵所传的玉印宝剑。元世祖感慨地说“朝代改变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代了，但是天师的印和剑传子传孙，一直到今天，其中果真有神明的帮助吗？”（原文：朝代更易不知凡几，天师印剑传子若孙，尚至今日，果有神明之相乎？）如果将天师的印和剑以及天师的子孙理解为道教的传统，那么这就是说不论时境有多大变迁，依靠神明的帮助，道教的传统是世代代传承不息的。

所谓道教的传统，一般总是指浩如烟海的道教经籍，指修建于名山洞府的宫观名胜，指记载于经籍中的思想哲理，以及作为道教文化种类的道画、道乐和养生方术等等。这些“传统”都是见诸于物的，用普通人的话来

说，是“死”的。在道教传统中还有一样最重要的，“活”的传统，那就是“道士”。借用元世祖的话、那就是天师的“传子若孙”，如果没有子孙，天师的传统也就夭折了，道教的传统也就没有了，天师府也就成空房子，失去了活力。所以，在我们道教中人来说，继承道教的传统最首要的一条，就是培养好道教的“子孙”。这里的子孙就是“道士”。所谓继承道教优良传统，按我的理解，就是培养出优秀的“道士”。

历史上，把对道教有建树有贡献的道士称为“高道”。历代涌现的高道，都为我们道教的传承和弘扬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这里，我不想讨论高道的标准，只是想说，不同时代的高道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他们身上既继承了道教的一些不可变更的内容和形式，又对道教如何同身处的时代相适应作出贡献。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继承和革新、原则和灵活、承袭和创新的结合。而要培养出这样的高道来，培养他们的人也要有这种“结合”的观念。这一点，在今天似乎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突出。因为我们道教传统继承正面临着一个“断层”，不要说高道，就是一般念经、拜忏、值殿、看庙的道士也是远远不够。

道士的培养历来是用拜师的办法，这是传统。可是，当今的北京、四川、上海以及台湾和港澳地区都开办了道学院，用课堂教学的方法，这就是革新。给小道士授业的历来是老道士，这是传统。可是当今的道学院里讲

课的，除了有老道士，还有从社会上请来的对道教有研究的人士，这也是革新。

我们道教中历来讲“道不言道，道不外传”，这是传统。可是当今的北京、四川、上海以及台湾和港澳地区刊印道教书籍，出版道教刊物，在教内外弘扬道教文化，这就是创新。当然，对于道教中一些符咒、丹诀，我们采用拜师传授的方法，这就是承袭。

在培养道士的过程中历来是用先值殿、念经，“吃三年萝卜干饭”，做小道士的办法，这是传统。可是，当今的北京、四川、江苏、江西和我们上海都是不足三年就把一些表现较好的小道士重用为协会和宫观的骨干，这就是灵活。

人大概有种惯性，习惯于用固定的眼光看待事物。所以，太上在《道德经》的二十二章里就告诫我们：“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就是，我们要用“道”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不要固步自封，自以为是，更不要自高自大。

就拿道士的培养来说，现在有一种说法，“道学院的教师应该都是道士，课应该由道士自己来上”。但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就上海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老道士中实在无力胜任这些文化和专业的课程。这是客观条件，不是我们想如何就可以如何的。何况，教徒弟是个苦差使，站在课堂上讲二个小时，如果没有内容，没有足够的体力，那是上不下来的。再说，当今的社会是个

信息社会，课堂上有来自各方面的老师讲课，可以让小道士开阔视野，消息灵通，成长得更快。让我们的小道士放在“近亲”抚养的成长环境中，我看，这也是不利于教学的。

再拿刊印道教书籍、出版道教刊物来说，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花那么多钱搞这些东西，看又看不懂，白糟蹋钱”。这种说法是固步自封的。但是，我们道教包含的内容太丰富，历史又如此悠久，我们自己能说已经懂得多少呢。最近出版的一本《中华道教大词典》，分门别类的参加执笔的道门中人和国内外专家学者达到一百一十二人之多。由此可见，道教学问之深，研究之难。因此，有些经籍和文章，我们做道士也不懂。这里，还牵涉到我们自身的文化底子。更何况，道教文化是个积淀，我们的祖师和前辈，传给我们那么多经籍，我们就应该去弘扬、研究和继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对于后代来说，也是一种积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钱是不会糟蹋的，不过，如果我们花了钱，印了书刊，因为看不懂就不看，或者束之高阁，那才是真正的糟蹋钱，而且更是有负于二千年的道教传承，数典忘宗了。

再拿培养青年道士让他们承担一些工作职务来说，现在有人对这些青年道士也有议论，说他们：“嘴上无毛，做事不牢”，“看他们能干上几年”等等。这种说法是看不起小道士的，自高自大的。这些小道士的选拔不是凭空乱点的，而是经过几年的宗教教务、宫观管理等

工作的实践基础上考察的。这些小道士的工作能力在工作中获得了一定的提高。对于他们的优点和成绩，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和表扬。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可以也应该给予批评和帮助。如果有了错误而不愿改正的，我们也可以给予处分，有严重的错误，也可以撤职乃至开除出道门。这里需要的是老一辈人的道教事业的责任心，而不应牵涉任何私人感情。长江后浪推前浪，道教事业的继承和发扬靠谁呢？只能靠这些既有坚定的道心又有处世能力的小道士。

综上所述，道教传统的继承和适应社会，关键是要培养出一批既有深厚的道教传统修养，又能主动去适应社会需要的“道士”。我们这些人都老之已至了，手脚不便，行动迟缓，未来道教的重担，我们是挑不起来的。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既能继承传统又能适应社会的年轻道士身上，希望他们争气，做出一番上对得起祖师，下对得起后辈的事业来。

社会需要和自身价值

最近读到一位外国的已故汉学家关于道教的文章，文章说到“西方人对于道教的兴趣增加并非仅仅在于道教在政府和地方官员眼中的地位，而在于他们自身的价值，在那个受羞辱的年代里被打碎的价值”。据我所知，这位汉学家热爱中国文化，也热爱道教，但是西方的汉学家有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西方人的评判标准。西方人对道教的兴趣并不一定就是我们中国道教界中人的兴趣所在。

就说“在那个受羞辱的年代里被打碎的价值”这句话吧，在那个年代里，被打碎的何止是道教的价值，或者是其他宗教，被打碎的还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人民贫困，社会动荡。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被打碎的东西都有其价值，那么这些也是西方人感兴趣的吗？我看未必。

再说“道教在政府和地方官员眼中的地位”这句话，也是一句含义不清的话。道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究竟是一种“眼中的地位”还是一种思想文化、一种社会实体的实际地位？这也不是遣词造句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作

者对历史和现实的鲜明评价。要说“眼中的地位”，历史上又有几个朝代和几个皇帝把道教放在眼里？我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道士，耳闻目睹清末的“庙产兴学”，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等等，使道教丧失庙产，道士流离失所等等。道教在当时的政府和地方官员中哪有一席之地。在社会上，道士社会地位并不高，称为“三教九流”。就今天道教而言，我们道士和道观的数量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多，但是，今天我们道教的社会地位是实实在在的地位，决不是“眼中的地位”。因为，今天的道教协会是人民团体，具有法人的地位；今天的道观受到法律保护，被占用的土地、房产和产业正在陆续归还；今天的青年道士正在受到正规培训，并且已经担任各种神职岗位；道教文化正在得到弘扬，并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得到整理。当或老或少的道士身穿道装出入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政协的议事厅堂时，我们这些道士都感到实实在在的地位变化。可能西方人并不介意这些变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将这些变化称作“政府和地方官员眼中”的地位变化，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道教“自身的价值”，也是一句可以商榷的话。现在“价值”这两个字用得很普遍，什么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什么自我价值、自身价值等等。穿西服、戴领带、坐奔驰、拿手机，都说是大款的价值，似乎吃好、穿好、用好、住好等都成了时髦的“价值”。照此推论，陶

弘景做道士前是有价值的，上了茅山以后就失去价值了。人和人对价值的看法很不相同，东方人有东方人的价值观念，西方人有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其中的差距实在很大。对于道教的价值，教外人说得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作为道教中人，对此要有自己的清醒认识，不能也不必跟着瞎起哄。道教的价值，是历史的，更重要是现实的。如果没有现实的价值，道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道教是宗教。天师创教时，就是因为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加上淫雨洪水，瘟疫流行，民不聊生，于是，天师以《道德经》教化民众，以二十四治管理巴蜀，以符水赈济灾民，以符法镇魔压邪。天师之教遂风行天下。天师创教不为什么，只为“济世度人”。今天的社会状况和东汉时已大不相同，然而不能说当今社会已经没有围绕社会和群众心理的问题，这些就是社会对道教的需要。社会对道教的需要就是道教的价值。道教的自身价值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在“济世度人”的宗教价值中。一切所谓文化价值、传统价值、实体价值都是从这一宗教价值中派生出来的。

在近十年的恢复宫观和培养道士的过程中，我们常说“庙要像庙，道士要像道士”。这个“像”字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宗教价值的标准。我们的道观要塑神像，要布置殿堂，要有人值殿。我们的道士身穿道服，念经拜忏，会步罡踏斗。我们是通过宫观和仪式活动来弘扬道教教

义，教化民众，济世度人的。这就是“庙要像庙，道士要像道士”的核心。虽然今天的宫观里可以有电灯、电话、电脑、复印机，但是这些都是为道教的存在价值服务的。道教为了要体现自身的价值，理应关心各种层次信徒的要求，满足他们的信仰需要和宗教感情需要，也只有在回报社会对道教的需要之中，道教才能证明存在的自身价值。

当然，海外常有人把“道教”扩大到整个中国民间信仰，并且把所有民间信仰习俗都看作道教的内容和价值。这种看法是强加于我们“道教”的。特别是由此指责我们道教中人不重视“自身的价值”，或者指责我们屈服于官员的眼色而放弃“自身的价值”，这就有一点无中生有而无法让我们道教接受的。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反问一句：究竟是你是道士，还是我们是在中国土地上有发言权的道士！

我对这位已故汉学家始终抱有尊敬的心情。不过“爱国爱教”的路却要我们自己选择，自己会坚定地走下去。

索取和奉献

前些日子，报纸上登载过一篇报道说，北方有个林业战线的劳动模范，他在退休以前砍伐过几万株树木。这位劳模在退休以后，自己动手还带领子女在过去砍过树的山岭上又种上了几万株树木，其数量还超过了被砍伐的数量，还它青山一个本来面目。我看到这段故事，十分感动。因为，在山上种树不比在家里养花，在山坡上一走就是一天，几十里路，高山陡坡，荆棘丛生，还要在无路中踩出一条路来，挖坑搬土，扛着树苗，挑着水桶，风吹日晒，渴了喝点水壶里的水，饿了啃点随身带的干粮，真是千辛万苦。这样艰苦的劳动，就是为了让被砍伐过的秃山重新长满绿树。这样的劳动，对于一个年已花甲的老人而言，实在是要有多么崇高的精神支撑才能做到啊！

这位老模范，并不是道士。然而，我以为他实在是一位“有道之士”，一个“得道”的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这位老模范明白天地自然和人是相互依赖的，浑然一体的。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自然界和人组成为一种生命的“链”，天下万物相关相联，环环紧扣。在这个链

中，物种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在我们道教中，太上《道德经》二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天下万物相依相存，那是恒古不变的真理。万物相生相克，组成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可是，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十分迅速，人们向自然索取能源，索取原料、材料。我们今天吃的、穿的和用的哪一样不是向自然界索取来的。有些人太想“征服”自然了，结果导致物种消灭，生命之链中断。原来的依存关系破坏了，其结果只能是依存双方的共同消失，自然环境变异，天道循环破坏，落得个既无有、又无无的下场。我们道教的《元气论》说到，天地万物是由元气贯穿起来的，“气之与水，循环天地，流注人身，轮转无穷，运行无极”，人可以掌握元气运行的规律，“人能治之，与天地齐”（《云笈七籤》卷五十六），但是，人不能去阻止和中断元气的运行，如果一旦中断贯穿于天地万物中的元气运行，那么天道循环就会破坏，人就会有灾难，受惩罚。在今天的社会里，发展林产，砍树伐林，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类生活的需要，也是林木更新，物种健康发展的需要。因此，砍树伐林在天道循环中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人类无节制地乱砍乱伐，或者砍伐以后又不及时栽种新林，这就必然会给天地间元气的流转带来灾难。我们城里的人只知道种树为了绿化环境、遮阳挡风、新鲜空气、调节温度。其实，在天地之间，树木的作用大得很。土地依靠

树根固系，不致冲刷沙化；草地依靠树木遮蔽，不致枯萎；鸟虫依靠树木栖息，生养繁殖；浊气依靠树木吐纳更新，不会淤积；至于树叶和果实，更是虫鸟的食品乃至供人食用。因此，树木是宝，有灵。在不少地方，中国人还有给古树大树叩头求拜的习俗。这位老模范尽管没有读过道经，但是他明白天地间元气贯穿，万物相依之“道”，他不就是有道之士吗？

这位老模范还明白人需要奉献而不只是索取。随着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向自然索取的东西，数量越来越大，品种越来越多。山上山下，山外山里，地上地下，水上水下，大概可以挖掘利用的都已找遍了。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在动五千米深海的脑筋，动月球和金星的资源的脑筋了。就像人的欲望没有止境的一样，看来人的索取也是没有止境的。听说联合国有个口号：地球只有一个。我觉得很对。地球只有一个，宇宙也只有一个，天道循环也只有一个，因此，可以被索取的东西就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以无止境的索取去对付有限的天地资源，总有一天人类要尝到咎由自取的苦果。太上《道德经》四十六章就曾告诫我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克制欲望，减少索取，这是个办法。但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又不能使人不索取，这位劳模的作为就给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要向大自然奉献对索取的补偿。砍伐了几万棵树，又种上几万棵树，就是奉献补偿，



陈莲笙会长（中）与来访的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著名道教学者丁煌（左一）等合影（1996年）。

使天道循环运行正常。这还让我想起，这些年来有些农民毁田挖土，烧砖卖钱的事，毁田的结果只能是耕田减少，直接威胁十多亿人口的吃粮和吃菜吃肉。政府一方面限制毁田，一方面大力造田和复耕，这也是为了应付人的无限索取和资源的有限供给的矛盾的问题，向自然界奉献补偿。天道运行中的元气亏损是经常发生的，问题是对于亏损的态度。罗公远有歌称，“树衰培土，阳衰气补，含育元气，慎莫失度”（《道德经》四十六章）。这位老模范在退休之后，仍不辞辛劳，奉献自己，默默无闻地干着“含育元气”的事，不就是有道之士吗？

这位老模范还明白人活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俗话

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俗话还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年砍伐的树，早已生长有几十年，那是祖先们留给我们的产业，由我们享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赞成这样一种说法，今天我们享受的一切，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又是我们向后代借来的。借来的当然还要偿还。如果我们不偿还，多少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无树可砍、无木可用了。现在我们都在说传统道德，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孝”。就是要孝顺父母和长辈，尊敬老人，爱护老人。不过，谈“孝”也不能忘记另一方面，就是父母和老人也要“慈”，要处处为子孙后代着想。这位老模范将他的余热奉献给了子孙后代，因此，也是我们老年人的楷模。他不仅在当代为社会作出奉献，晚年还对大自然、对后辈作出奉献，为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和谐的生活环境作出了贡献。太上《道德经》五十四章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我想，可以这样说，这位老模范不仅是努力生产、品德高尚的人，而且于家于乡于国于后代都是作出了贡献的人，是一个修真“得道”的人。尽管，他并不是一个道士，可是，他的思想和行为，值得我们每一个学道之人敬佩、学习。

讲 话

道教徒同样也能为 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道教徒也是一支建设祖国的力量，是爱国统一战线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何充分认识和调动道教界(包括道教徒)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使道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协调，对于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深远意义。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和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上海道教界与全市人民一样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主要表现在：

首先，搜集、抢救道教音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保存了有益的资料。

众所周知，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积累了大量的经典和文献资料，这些是先辈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上海市道教协会于1984年首先与上海音乐学院联合摄制了《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第一集“净坛科仪”，第二集“进

表科仪”录像片。同年9月召开鉴定会，在国内外道教界和学术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本市《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明报》都先后发表消息和图像。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认为“道教音乐很好听，出乎意料”。昆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认为“道教音乐与昆曲有许多相通之处，录像片中的音乐我感到很满意。”吕子都、陆春龄教授都认为“这部录像片把道教方面的宝贵的音乐、舞蹈、文学资料记录下来，非常有价值。”还用杜甫的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加以赞美。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认为录像片“音乐好听极了，道教的录像片还是第一次看到。从仪范、经文中见到了汉代、宋代的时景。希望你们还要继续抢救道教文化，未悉谁来帮助你们！现在国际上不少人都在研究中国的道教文化，因为它对科学确实很有价值”。法国劳格文、日本福永光司和香港《文汇报》特别评价道教音乐及斋醮仪式“既是中国古代宗教哲学思想的体现，又反映了中国古朴，服饰绚丽，经文典雅，仪礼有序，音乐更是丰富多彩，优雅悦耳”。1985年在香港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讨论会上，放映了《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录像片，受到了一致好评，无论音乐和仪式方面都大大超过当时台湾的录像片，许多外国友人建议我们，将录像片制作剪辑，向国外发行，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提出订货意向。一位外国著名人士还激动地说：“想不到中国道教斋醮科仪还保

存得这么完整，从这一点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中国政府对此是重视的。”他还说：“我们可以合理地吸收和利用道教中的宝贵文化资料，为社会服务。”

1986年，上海市道教协会又与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录制了《中国道教音乐》（上海地区部分道教乐曲）录音磁带，在社会上又引起了强烈反响，到目前为止已发行了三版，尚供不应求，为此又将第四次再版。与此同时，全国部分地区也掀起了道教音乐热，并于1990年汇集于北京进行了交流，北京、东北、湖北、山西、江苏、上海等地演奏了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道教音乐。为有助于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还应继续抢救祖国的这一至今仍保留的最古老的音乐体系——道教音乐。

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道教海外联谊交往工作日益增多，尤其是台湾道教界来沪参访、观光、了愿、旅游日趋频繁。台湾“中华道教会”副秘书长张桢、台湾天师府秘书长龚群在沪台道教界座谈会上说：“我们同为华夏民族的炎黄子孙，祖国统一迟早要实现，不管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制度怎样，我们认为道教的信仰是一致的，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不会改变，现在台湾还保持着传统习惯。对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我们完全有信心。”他又说：“大陆培养了一大批年轻道教徒，今天又亲眼看到听到进行传统的按照严格

仪规的‘祝愿’仪式以及伴奏的道教音乐，非常高兴，要比台湾的道教仪式隆重得多，这证明大陆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有可能的话，邀请你们到台湾去与当地道教徒交流。”

由于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确贯彻，越来越得到海外宗教界人士的理解，使他们消除了原先的误解和偏见，进一步沟通了联络和了解，为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长期以来，有些人认为道教徒是不可能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和实行，切实保障了宗教组织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各宗教组织遵纪守法，独立自主，自强自养，办好教务，摒弃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陈规陋习，发扬行善积德、惟道是从的优良传统，同时要求信教群众爱国爱教，积极鼓励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因此道教徒完全能够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1991年10月7日在“上海市宗教界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正在顺应时代变化的道教

中共中央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十九号文件发布至今已十年了。回顾这十年，我们道教与其他宗教一样，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我简单地谈谈道教的情况。

一、十年改革开放前的道教

建国前的道教(指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止)，不论北方全真道，还是南方的正一道都已衰落了，仅在大中城市和名山还保留着著名的大道观，像北京白云观、东岳庙，江西天师府上清宫，南京朝天宫，江苏茅山道院，苏州玄妙观，上海城隍庙等等，但都不很完整，有些甚至消失或被侵占或被剥夺，如苏州玄妙观的玉皇殿又称弥陀阁于1927年被国民党改建为中山堂，再如上海老城隍庙于1929年由大流氓黄金荣为首组成“邑庙董事会”，剥夺了住持道士的一切管理权，并把各殿堂分别招商承包(即包殿老板)变成利用宗教骗取钱财的场所。此外，战争及内乱等人为破坏也是道教衰落的主要因素。同时，缺乏德高望重的道士主持维护道教，也使道教渐趋衰落。但是，在另一方面却畸形的发展，尤其在上海，据1948年上海市道教会登记情况：市区的大小道观有四十多座

(不包括郊区和浦东),其中创建的知名的有:桐柏宫、紫阳宫坤道院、三官堂等,道院、道房有七十多处,有十二个帮派近二千个道士,这仅仅是登记的,实际不止此数。这么多的道观、道院、道房,以及这么多的道士,照理说对弘扬道教文化,发扬道教优良传统,于社会、于人类可大有作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并没有对社会作出多大贡献。相反,有部分道士与开设星卜课台的盲人(瞎子)以及仙人巫婆互相勾结,利用道教与封建迷信混淆在一起,骗取钱财等。这是因为绝大部分道士没有真正信仰道教,谈不上献身于道教事业,只是为了生计,为了糊口而被迫地选择了一个所谓“道士”职业。当然,不可否认地也有部分道士有抱负,有信心,想为道教事业作出一些贡献,但限于社会、生活、环境和经济等各方面条件而无能为力。

建国后的道教,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以后,大批来自农村的道士绝大部分回乡分到土地从事农业生产。1956年在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鼓舞下,在各地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北京、上海等先后成立了道教组织,经过一系列的社教运动教育,在提高一定的政治觉悟基础上,较年轻或中年的职业道士积极地参加劳动生产,年老的道士也积极地边劳动边承担一些经忏活动;对无保留价值的道观加以改造,对保留下的道观加以整理、维修和保护,特别是关于上海老城隍庙管理问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于1958年接管了“邑庙董事会”,

由道教成立了城隍庙庙务管理委员会，从而老城隍庙重新归由道教徒自己管理，使全市道教界衷心欢呼“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建国后的道观和道士的数量是少了，但道观、道士和宗教活动比以往纯洁多了，道观像道观，道士像道士，改变过去“道俗不分、家庙不分”的现象，正如周恩来总理一句名言：“宗教应还其本来面目”，来整理道教中部分不适应社会的東西。

二、改革十年中的道教

“文化大革命”中，道教同其他宗教一样，经历浩劫，濒临绝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2年中央十九号文件关于宗教政策发表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贯彻和落实，道教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十年改革中的道教，进入了它发展史上的新时期。

1982年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委会恢复活动，道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平反，被赶出宫观、还俗的道士重归道门。同年底，收回了浦东钦赐仰殿道观，并进行了重新修葺，宗教活动逐渐恢复、开展。1984年，又收回了上海白云观，请回了道教神像，恢复了宗教活动。1985年，正式成立上海市道教协会，会址设在上海白云观。此后又相继恢复了崇福道院（座落于今浦东新区三林镇境内）、东岳观（位于南汇区新场镇）、龙王庙（座落在今浦东新区王港镇）和三元宫坤道院（座落在今浦东新区花木镇）等道教宫观。如今，各宫观殿堂都已整修一新，开展

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它们既成了道教的活动场所，又成为旅游的胜地。

宗教自养是我国宗教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十年的改革开放，为道教自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各宫观都设有小卖部，出售经书、旅游纪念品和香烛等，既满足了道教文化爱好者的需要，又满足了广大信众过好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增加了道观的经济收入。道观内正常的宗教活动，也是道观自养的一个经济来源。如今，各道观香火都很旺盛，除能解决自养外，还有部分积余。另外，道教有“济世利人”的教义，有众多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上海道教界参加与配合四个现代化建设，在社会服务、公益事业以及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从而使道教的活动、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上海各道观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白云观的上元法会，是群众春游、祝福的重要节日。崇福道院的庙会，宗教与民俗交融，购物与烧香并行，内容丰富多彩。钦赐仰殿的东岳圣诞，更是历史悠久，香期中，香客、游人如潮。这些传统的宗教、民俗活动逐渐恢复，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精神生活。

道教在港澳台同胞中，在海外华侨、华人中，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随着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上海道教界积极开展与港、澳、台道教界的友好往来，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上海道教恢复活动后，由于历史原因，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后继乏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道教界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经过积极筹备和努力，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1986年3月创办了首届道学班，培养年轻的道教徒，这是上海道教史无前例的，也是历史的创举。上海道协自编讲稿，向学员讲授文化宗教专业近十个课题，经过三年培训的年轻道士，都分到各个宫观，在宫观管理、主持教务、接待香客和开展道教研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更好地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上海道协今年9月又招收了第二届道学生，以言传身教的传统方法和现代教学方法相结合，培养道教后继人材。

道教有丰富的经籍和文献资料，是我国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道协重视道教学术研究，并于1987年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室，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道教经书，编写上海道教史，创刊《上海道教》杂志，在道教经典、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道教音乐是道教修道、颂神、斋醮等仪式活动中的法事音乐，有“仙乐”之誉。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由道士代代相传承，融汇了大量的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体系，是祖国古典音乐宝库中的珍品之一，有重要的发掘整理价值。目前，上海各宫观有较高音乐造诣的老道长为数已不多，大量的道教音乐正面临着失传和被湮没的危险。为了抢救这批珍贵

遗产，从1984年开始，上海道协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协助下，陆续制作了《上海道教斋醮》录像片和《上海道教音乐》磁带等，受到社会好评。上海道教在十九号文件发布至今十年的恢复发展中，已取得可喜的成绩，我们认为，现在是道教发展的较好时期。因此，我们一定要“削除那些不适应新时代的陈规陋习，改变过去保守自好的习惯”，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1992年11月19日在上海市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发布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恢复和健全道教正一派 教戒规范制度

各位领导、各位道长、各位来宾：

道教正一派授箓，是道教正一派的重要教务活动，是加强对正一派道士管理的重要措施，当然也是正一派道士所关注的一件大事。今天，我们道教正一派一些主要宫观和道协组织的负责人聚会在这里，座谈研究正一派的授箓事宜，并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有关省市政府宗教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指导。在此，我谨代表中国道教协会和上海市道教协会，对诸位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地感谢对道教工作的支持和重视。

下面，我想就正一派的情况和授箓问题讲点意见。

一、道教正一派的历史和现状

正一派是道教两大道派中的一大道派，历史悠久，自天师张道陵立教以来，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天师在立教之初，就以太上所授“正一盟威之道”行化于世，教人信行真道，积善修身，诚信不欺，反对巫鬼

淫祀。突出正一之宗旨，此宗旨在千百年来，一直为正一诸派的宗师高道所遵奉。以此宗旨来检束和清整正一诸派道士，使道教得到正常发展，教义、教戒也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规范。但在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革，加上道教正一派管理体制滞后不前，已无法对所有的正一派道士进行有效的检束，因而正一派基本上处于涣散混乱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地处名山和大城市的正一派道士成立和加入爱国道教组织，及时对教仪规范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十年动乱的冲击，道教一切活动又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宫观得到了恢复，正常的道教活动和道教徒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道教正一派的诸多名山宫观，如江西龙虎山、江苏茅山、苏州玄妙观、上海钦赐仰殿、安徽齐云山等亦得到恢复开放，管理组织也同时得到恢复和健全，正一派教务、科仪和管理等各项活动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随着中国道教协会教务工作的不断开展，1986年，即中国道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以来，又积极开展对散居正一派道士的工作(所谓散居正一道士，指广大散居在城镇乡村的居家而不住庙的正一派道士)。中国道协针对这一传统而又现实的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1990年在杭州召开了关于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的座谈会，在广泛听取意见和取得共识的基础

上，制订了《中国道协关于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试行办法》，以维护广大散居正一派道士的合法权益，促进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这一教务工作，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使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工作正在向积极和正常的方向发展，广大散居正一派道士积极参加道教管理组织，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道教传统教戒规仪和《试行办法》，爱国爱教。但不可忽视的是，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一是散居正一派道士必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得不到落实；二是一些地方对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工作尚未开展，对散居正一派道士采取既不承认，又不管理的态度，对其活动有的采取惩罚的方式，有的又放任自流，使真正有信仰、遵守教规仪范的正一派道士的信仰权益未能得到维护，非法的活动亦未得到制止；三是一些散居正一派道士自己信仰不坚定，缺乏应有的道教专业知识，道教素质低，分不清正常的道教活动和封建迷信的界限；四是一批新入道的散居道士信仰淡薄，只是以从事斋醮活动为职业，惟利是图，有的还与神汉巫婆同流合污；五是假冒散居正一派道士进行违法、非法活动。上述问题的存在，相互之间都有关连，都有影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一方面是积极加强管理，分清真伪，正面引导，保障合法，打击非法，一方面是恢复健全道教正一派教戒规范制度，促进道教正一派的健康发展。

二、正一派授箓的意义和目的

恢复和健全道教正一派的教戒规范制度，就必须通过恢复正一派授箓教制来逐步规范。正一派的授箓制度，是正一派传度道士的传统制度，在道教史上，江西龙虎山、閤皂山和江苏茅山是道教正一派传度法箓的三大宗坛，史称三山符箓。作为正一派道士，必须先拜师入道，随师诵习经戒，师父在此期间，一方面教道徒经典规戒，讲解道教知识，一方面观察其言谈举止行为，然后举荐为其求受法箓。《正一法文》中说“凡为道民，必受护身符及三戒，进受五戒、八戒，然后受箓。”指出受箓者必受三戒、五戒、八戒，通过受戒来规范自己。正一道士只有经过授箓传度，方有资格主持斋醮仪典。《三洞修道仪》说：授正一法箓，方可以为人章醮。因为只有得受法箓，才能名登天曹，才有道位神职。道教称“名箓天曹；乃有道位”。有了道位的道士，其斋醮中的章词才能奉达到天庭，才能得神灵的护佑，相反，斋醮章词则无效。所以，凡主持斋醮仪典的道士必先求受法箓，以正道位。

授箓作为务道之士由凡入圣的阶梯，同时也是勉励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云笈七籤》卷四十五说：受箓的意义在于通过受箓，“戒录情性，止塞愆非，制断恶根。”勉励得受道箓者勤进修行，不可褻渎师教。即通过受箓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和情操，清正心身，拔除是非邪恶之念，修造一个完美崇高的精神境界，以不辱师教。

道教法箓又有初授、升授和加授诸阶之分，即初授太上三五都功经箓，再升授太上正一盟威经箓，升授上清三洞五雷经箓，加授上清三洞经箓和上清大洞经箓。各阶法箓品位有别，凡道士初授法箓后，必须严格依德行道功进阶升授，不得越阶超授。若无德行道功，而单纯地追求升迁，超前多受，反害无益。也就是说没有德行和道功作根基，超前多受只能是反害自己，就一般务道之士的德行来说，得受一、二阶，已是功德非浅、受人敬重者。《正一法文外箓仪》说：“三倍无功，不知建德，直置而已，都不合迁。”

由于授箓传度在正一派中的深远影响，加之目前正一派尚存在的问题，诸多正一派高道都期望恢复正一派授箓传度仪典，完善正一派教制管理制度，加强自身建设，肃穆道仪，端正道风，促进正一派健康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故重申道教正一派授箓之事宜，旨在通过恢复正一派授箓传度之仪典，使真正的修道之士明正道位神职，广宣真道之教化，度己度人，使之道德素质和宗教素质得到不断提高。通过对这一仪典的恢复，引导广大的正一派道士，特别是散居正一派道士，信行真道，磨练自己，遵奉正一派教戒规范。抵制那些神汉巫婆装神弄鬼的不法行为，抵制那些假借道教之名，行诈骗之实的行为，纠正那些以务道为名，取财贪利的行为，使广大信行真道、勤进修行的正一派道士(散居正一派道士)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促进道教健康发展。这

既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道教徒的责任，也是道教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我们道教徒责无旁贷，一心为道，发扬我教的优良传统。

三、开展授箓工作应注意几个问题

道教正一派授箓科仪，是庄严隆重的仪典，不但有一套完整的传度科仪，而且要求严格。但近代数十年来，尚未举行过这种科仪，虽然在1991年江西龙虎山天师府曾为台湾和新加坡的正一派道士举行过授箓仪典，但仍有很多事宜需进一步完善，需要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具体的情况，从有利于道教健康发展和促进正一派散居道士纳入正轨着眼，审慎对待。

(一)正一派授箓，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任务繁重，不是一个宫观能够承受的，必须加强领导，统一布置，互相配合。因此，正一派授箓工作，统一由中国道协组织领导，或由中国道协指定符合条件的宫观承办。凡要求举办授箓的宗坛，首先必须从人力和物力做好充分的准备，聘定好三师，演练好传度科范仪典，对箓生的考核登记也必须认真仔细，并相应地制作必要经戒、科书、法器，使箓生通过授箓受到教育，学到知识，坚定信仰，提高素质。

(二)授箓宗坛要从道教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个大局来考虑，不能简单从事，更不能变相地随便设坛授箓或买卖授箓职牒，否则无助于道教的发展，将更加使目前管

理涣散状况愈演愈烈，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总之，务必要以提高广大正一道士的道德素质、宗教素质和爱国爱教的觉悟，促进道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为目的。

(三)开展受箓要有利于促进和加强对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散居正一派道士人数众多，但良莠不齐，要通过授箓甄别真伪，维护真正信仰者的权益。要围绕全国寺观教堂登记的工作的中心，进一步落实以我会制定《关于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试行办法》的精神，加强对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使散居正一派的管理状况得到改善，散居正一派道士的行为得到规范，改变过去管理涣散，不遵教戒的状况。

(四)对散居正一派道士在审查、考核、认可的基础上，做好发放散居正一派道士证的工作。散居正一派道士发证，是散居正一派道士授箓的基础，今年发证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要根据力量，分期、分批进行。

(五)进一步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对正一派道士管理。学习好李鹏总理签发的两个宗教法规，全面、正确地领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精神，不断提高爱国爱教觉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道教的合法权益，抵制违法活动。对信教群众集中的地区，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有计划地建立道教组织，恢复道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场所因种种原因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建立道教活动点，分片管理，统一领导，以满足广大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把分

散的宗教活动，逐步引导到宫观中来，实现宗教活动正常化。

总之，我们道教界要在全国人八届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发扬道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1994年4月26日在中国道协于上海召开的“正一派授箓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成立的 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各位顾问、各位贵宾：

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成立新闻发布会今天在这里举行，标志着城隍庙修复工程即将开展，同时亦预告着城隍庙将在明年边修复边开放为道教活动场所。现在，我首先衷心感谢领导和各位委员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委以修复委员会主任，限于能力和年龄，权领重任，但我竭尽全力以“全面规划，分期实施，恢复原貌，适当调整”将城隍庙修复成较完整的一座庙观，为道教事业发展不断努力。

上海城隍庙是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一座知名庙观，是本市人文景点之一。海内外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来上海，都要去城隍庙参观访问朝拜。

1966年“文革”起，城隍庙被迫关闭，移作他用。今天在这里正式宣布上海城隍庙经政府批准同意，恢复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这是党和政府落实政策，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真正体现。这是本市道教界和广大信众十多年来所盼望实现的一件大事，也是海内外宗教界和国际友好人士所非常关心的一件大事。现在恢复城隍庙的愿

望得到实现,谨此,我代表城隍庙修复委员会向市委、市政府和南市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向市宗教事务局的正确领导和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豫园商城和工艺品商店的关照和协助表示万分感谢!也向关心城隍庙修复工作的各位来宾、各位新闻界朋友表示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我们认为修复城隍庙为宗教活动场所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满足道教徒和广大信众过好正常

的宗教生活,而且也适应海内外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的参观朝访和文化交流。当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得到贯彻。同时更有利于体现商城、旅游、文化、娱乐、饮食、购物与宗教融为



1994年7月7日,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成立时,陈莲笙道长(前左一)等合影于城隍庙大殿门口。

一体的繁荣发展、兴旺。

城隍庙今后如何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庙观是弘扬宗教教义、与人为善的场所；是崇尚忠孝慈爱、感化人心的场所；是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的场所；是履行和满足道教徒和广大信众过好正常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活动的场所。它完全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有利于安定团结、社会稳定。当然，我们道教徒也必须不断地为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带领广大信众树立爱国爱教思想，为国家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但修复工作问题也不少，如经费问题、房产问题和今后的管理问题等，尤其是要达到“庙像庙”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今年年底前收回三十余间，即大殿、中殿和楼厅。最后请求各位领导各界人士今后多多关心和支持，并请求各委员多多帮助，给予关怀。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各位顾问、各位贵宾：

今天天气这么热，承蒙大驾光临，非常感激，我再一次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上发言不妥之处，请指正。

最后，祝愿大家健康长寿，万事顺利。

1994年7月7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五十周年了，回顾往事，抗战的胜利也有我们道教人士的心血。当侵略者的铁蹄肆虐时，我们道教徒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践踏，在众志成城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我们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道教徒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支持抗日军队，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扬了道教的爱国主义精神。

地处江苏的茅山，是我们道教的圣地之一，也是全国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1938年6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从皖南移师茅山，司令部和政治部就设在茅山乾元观的“松风阁”和“宰相堂”。当时年逾花甲的老当家惠心白和陈毅结为朋友，他经常派小道士下山帮助新四军购买油盐、豆制品，打听日本鬼子的军情。陈毅常和惠心白道长下棋、闲谈，分析敌我形势。在新四军干部的带动下，茅山各宫观道众纷纷行动起来，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新四军转移后，日军出动二百多人对茅山进行扫荡，把历代创积的文物毁坏殆尽。白云观五名道士，元符宫十九名道士，乾元观十三位道士惨遭杀害，惠心白道长正气凛然，为国捐躯；九霄宫一位小道士因给新四军送情报，被一位姓潘的汉奸翻译查

出，日本人用狼狗将小道士活活咬死，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颂歌。

贺龙率领的部队撤离洪湖地区进驻武当山，武当山道众主动让出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为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徐道总和王教化等道友精心治愈伤病员，教贺军长及战士拳法，帮助康复的战士化装成香客、道士，使他们顺利归队。战士们归队时送给王教化的三十五块银元，建国后王教化献给国家三十三块，留下两块作纪念，临终时又转交道教协会，以铭记军民鱼水之情。

1937年秋天，日军侵入杭州，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钱塘江边南星桥一带的老百姓无衣无食无家，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时玉皇山福星观紫东道人李理山发起了救济难民的义举，并毅然决定停止当时山上的一切宗教活动，为解救难民开放紫来洞，收容了一千七百多名难民上山避难，组织道众伐竹建棚几十间安排难民。为解决两千多人的吃饭问题，李道长冒险下山通过日军封锁线，向慈善团体国际红十字会求援，运粮上山。又派道士吕宗安(现任上海白云观代当家)到上海武定路创建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集蓄香资送回杭州供山上开支，这样一直维持了一年多时间，直至战争逐渐平静，难民下山谋生为止。李理山的义举是我们道教界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孤岛时期的上海道教与兄弟省市的道教稍有不同，上海绝大多数是正一派道士，平时散居在家，困难当头

各自为政，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上海道教也为抗日战争做了些应该做的事。

杨浦区萧王庙当家道士叫张湘荣。当时庙里有个保卫团团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张道长得知真情后，心照不宣。只要团长提出什么要求，他都尽力满足，提供安全的殿堂幽室给中共地下党聚会，联络议事，为民族抗日救亡活动服务。

在道教救国论的影响下，松江道教会引导道众学习陈撷宁先生的理论，认为大难来临之际应将源于黄老之教的道教“特作今日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使临危转安，凶化吉祥。岳庙的道士为弘扬道教文化，表现爱国精神，他们组成担架队，及时抢救、护理伤员，军民团结合作，活跃在抗日救国第一线，成为真正的深明大义的有道士。

上海城隍庙在抗战期间一度也辟为难民收容所，道教界人士在城隍庙开展施粥、施医活动，帮助难民解决困难。

抗战期间白云观的道士对道教传统文化典籍——明版《正统道藏》的保护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为道教、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日本宪兵蛮横闯进白云观，强逼道士打开存放明版《道藏》的柜子。《道藏》是我国道教文化的结晶，是国家的重要文物，价值连城。《道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道士懂得，日本宪兵也清楚。他们要抢走完整无损

的《道藏》，所以胁迫道士交出钥匙。白云观道士灵机一动，告知管理钥匙的已跑到租界去了，要取的话等他来后再说。三推二推之际，日本宪兵毫无办法，最后贴上封条，勒令不准启动。白云观地处租界近邻，日军不敢轰炸，加之战事频繁多变，明版《道藏》被白云观的道士完好地保存下来。

孤岛时期的上海道教和广大爱国民众一样，在民族危难存亡之秋，根据当时抗日救亡的特点，道教实现了自身爱国爱教的价值。

半个世纪过去了，全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不稳定政治因素依然存在。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日本右翼分子还在将“侵略”改写成“进入”，日本朝野一撮人还在参拜靖国神社，我们要不忘历史的苦难，提高警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增强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抗战胜利，说明中国人民不可侮，不管敌人怎样疯狂，不管遭受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后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玩火者必自焚。我们上海道教界一如既往与党和人民风雨同舟，肝胆相照。

1995 年

不断进取的十年

——庆祝市道协成立十周年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代表：

我们上海市道教协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我们在党的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紧紧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团结广大教徒，密切联系信众，在不断克服困难中，认认真真地为继承道教优良传统，弘扬道教文化努力工作着，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今天，我们在这里简朴而隆重地庆祝上海市道教协会成立十周年，我代表上海市道协向十年来一直关心我们、支持帮助我们工作的各级领导、各方面朋友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向十年来一直配合我们开展工作的道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为了更好地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现在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回顾十年来我们的主要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思想建设，常抓不懈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始终自觉地接受党和政府的

领导，坚持把爱国爱教的思想教育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市道协筹委会恢复工作后，我们协助党和政府对道教界的冤、假、错案进行纠正、平反、落政。这项工作的政策性很强，我们把做好这项工作，当作对大家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大家感觉到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道教的关心，从而激发大家的爱国爱教热情，献身道教事业。道教协会成立以后，不少教徒认为道教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欢欣鼓舞，热情高涨。至于做一个怎样的道士，认识还是非常模糊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不可能引导教徒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们多次组织道众学习中共中央十九号文件、六号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学习时事政治，明确社会形势对教徒的要求；联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通过不断的学习，大家认识到：我们道教有着优良的传统，道教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需要消化吸收，古为今用；道教还有广泛的群众性，宗教活动还需要具有一定信仰素质、政治觉悟和科仪能力的道士去引导，不断剔除糟粕，积极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做一个真正的爱国爱教的教徒。

有些道长认为在道观里进行的活动都受法律保护，于是为了迎合少数信众要求，竟然将消极的民俗习惯，把那些不该带进道观的东西带进了道观，把那些本不属于道教的陈规陋习的东西带进了道观，如各种名目的冥器。更有甚者竟然在道观里制作冥器，托言是信众要求

这样做，把迷信活动和正常的宗教活动混淆起来。出现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的信仰素质亟待提高，思想工作不能放松，要常抓不懈。针对有些反复出现的不正常情况，道协十分重视，强调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在宗教活动场所里进行的活动也必须是正常的，否则也应阻止。由于道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道教徒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大家觉得：恢复开放宗教活动场所是为了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为了满足信众宗教活动的需要。道教徒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爱国爱教，为净化社会环境，引导信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教徒始终如一地按照教理教义的要求，格致自己的思想行为，举手投足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有道之士，负有行道之责。

《邓小平文选》出版后，道协及时组织大家学习。通过学习大家觉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可望可即的共同愿望。近几年来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我们道教在这大好形势下，日益兴旺，生机百倍，市委、市府十分关心我们道教，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开展工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道教。所以我们非常拥护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他为我们指明方向。我们要珍惜大好形势，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发挥道教传统道德的优势，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提高我们的整体

素质，以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

1994年，我们还重点学习了李鹏总理签署的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号两个宗教法规。这两个法规是指导我们工作的重要依据。我们采用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法，先自学、后讨论，加深理解。在发言中几乎都提到制定两个法规是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开展宗教活动是我们必须做到的。两个法规是保护我们宗教团体合法权益的，我们要反复学习，用好法规，维护法规，在政治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样有助于我们提高爱国爱教的觉悟，为道教的自身发展服务，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十年来我们市道协是能坚持学习，是能联系实际学习的；而且是得益于学习的。然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能力不足，学习形式、学习效果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提高。

二、组织建设，稳中有进

千百年来，道教文化一直丰富和影响着我们炎黄子孙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道教作为一种中华民族文化，已经深深扎根在民间，不少内容已和习俗融化在一起。“文革”十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道教活动全部停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信众的宗教感情得到理解和尊重，道观得到恢复开放，信众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形势，道教深感教职人员后继无人，长此以往

将不利于我们更好地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为使道教适应新的情况，市道协统一认识，克服困难，于1986年开办道学班，招收了一批学生。经过老道长们的言传身教和学生的自身努力，第一届学生已于1989年正式毕业，分配到道观工作，缓解了青黄不接的矛盾。因发展需要，经过重点培养和实践考察，部分青年道士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道教组织里的新生力量。在市宗教事务局的关心下，1993年上海道学班更名为上海道学院。第二届学生将于1995年8月毕业，第三届学生招收工作已经开始。

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接班人，壮大自己的组织，改变组织内的文化结构，是新形势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实践证明，道教必须办学，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办学，自己的事情要有信心去办，要化大力去办，抓紧培养接班人是振兴道教的先决条件。十年来，我们培养了一批道士，有些擅长道教科仪演示，有些擅长道教音乐，有些擅长文化研究。青年道士的文化基础扎实了，挖掘和研究道教文化的重担才能由道士担当起来。当然，道学院的工作刚刚开始，办学条件较差，还有很多困难亟待解决，但不管怎样，道教后继乏人的现象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大胆培养青年教职人员，放手使用年青人，给年青人以继续提高的机会，是上海道协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今后工作的重点，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去做好这项工作，为道教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组织上创造必不

可少的条件。

三、教务活动，依法进行

依法开展教务活动是我们道教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教务活动是道观联系信众的重要途径，积极引导和组织广大信众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活动必须在政府批准开放的道观中进行，这是对整个宗教界也包括上海道教界的最基本要求，法规上也有明确的规定。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工作也是取得一定成绩的。

十年来，我们恢复开放了九所宫观。在宫观进行的宗教活动越来越兴旺，朔、望之日到宫观来参加集福迎祥、消灾延生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多。仅1995年春节，钦赐仰殿进香人数超过二万，连交通不太方便的三元宫坤道院，春节那天也有七千多香客，上海白云观进香人数逐年上升。边修复、边开放的上海城隍庙，春节期间香客达十一万人，这仅仅是从售出香花券上反映的人数，实际人数还要多些。十年来由于政策落实得好，道观的法务活动和进香人数都在逐年递增，道教的经济也略有发展，道众生活略有改善，有些道观在增加积累的前提下，逐年增加庙观基本建设投资，白云观几经修缮，钦赐仰殿扩建三清大殿、钟鼓楼，龙王庙修建灵霄宝殿等。除此以外，道协还抽出一定的资金，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尽了我们道教的一点心意，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

十年来，我们依靠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在他们的具体帮助下，除了恢复开放的九所宫观外，还落实了一批道教房产，如上海清虚观租赁，黄浦区、虹口区、卢湾区等地区的庙产，有的已经领到产权证，有的已经批租还产，有些零星小地块经协商后已经合并在一起。

要维护道教权益，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困难重重，被占用单位与占用单位各执一词，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的明明是庙产，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料散佚；有些包经租的房产，一旦收回来就要准备贴本，但为了依法保护道教权益，为了道教的长远利益，我们坚持收回了产权。工作难度很大，情况又十分复杂，由于我们坚信党的领导，坚信政策、法律，十年来我们在房地产的落实政策和开发利用方面，还是取得长足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能取得这些成绩，与有关方面的领导和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

我们道教房地产方面的落实政策工作还有不少事情要做，在此，吁请大家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在我们教务工作中，接待工作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十年来，我们的接待工作一年比一年繁忙。在来访者中有外国首脑，驻沪领事官员，海内外学者教授；有台湾、香港地区道教界人士；有国内党政领导、文化团体、民主党派以及外省市道教团体道友。以1994年为例，我们接待了海内外二十七个访问团约六百人次。

我们也应邀组织教徒出访香港、台湾地区，还组织

教徒参访北京、茅山、龙虎山等地的道教场所或名山宫观。通过交往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1. 增进了解，有利于改革开放。海外朋友来访，除了到道观外还要看看上海这些年来的变化。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上海，有利于招商引资。

2. 增进友谊，有利于道教事业的发展。台港澳同胞的来访，使他们进一步看到道教文化的根在中国大陆，激发他们繁荣民族文化的热情，以利我们事业的兴盛。

3. 沟通感情，增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使命感。同根同祖同文化，神缘、业缘都召唤我们尽快走到一起。

4. 自立自强是我们立身安命之根本。通过出访我们也看到对方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我们只有自立自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事业。

5. 兄弟省市道协在自身管理、自养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身居闹市也应提倡实干、苦干，否则振兴道教只能是口号而不是事实。

四、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道教是一种文化，但道教自身也需要文化。以前，上海道教一直没有自己较为永久的宣传阵地。《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因抗日战争的缘故停刊后，道教文化的宣传出现了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道协开始抢救道教文化遗产，先后组织道众录制“道教音乐”

磁带和“进表科仪”，为道教留下了珍贵的声像档案资料。

在《玄门早课日诵》的基础上整理出适合正一派早课需要的内容，为上海道学院提供了启蒙教材。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我们正式创刊《上海道教》杂志，至今已经出版了二十二期。刊物旨在宣传爱国爱教思想，挖掘道教文化精华，开展道教学术研究，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绵薄之力。创刊七年来，由于坚持办刊方向，质量在不断提高。研读过《上海道教》的读者认为刊物有一定的品位，有自己的特色。

当然要办好刊物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人力、财力、组稿、发行诸方面，都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盛世修志是件大事。1989年开始，市道协就组织人力，为《上海宗教志·道教篇》撰稿，现在已进入第二阶段，尽管人员调动较多，人手紧缺，但今年完稿已成定局。

十年来，我们道协文化研究室藏书和道学院藏书正在不断增多，在文化建设上的投入正在加大，这将对我们培养人才，丰富知识，开展研究带来极大的裨益。

上海市道教协会成立十年来是有成绩的，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1. 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有一个正确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市道协坚定不移地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2. 在爱国爱教的旗帜下，市道协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联系信众，共同努力，兢兢业业地为弘扬道教文化不断工作。

3. 社会各界对我们道教的帮助和支持，是我们做好教会工作的保证。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我们上海道教的十年是不断进取的十年。十年来，我们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广大信众的期望，为此我们感到十分高兴。但当我们面对“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大好形势，面对新三年的宏伟目标，我们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还不轻，我们有些工作还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前进、前进、再前进！

上海道教的十年已成为历史，未来的十年才刚刚起步，为使道教工作更上一层楼，我们要认清形势抓住机遇，齐心协力，把我们的精力、能力、智慧都纳入到如何使道教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轨道上来。

希望每一位道友加强学习，戒骄戒躁，继往开来，精进奋发，为我们的事业锦上添花而多作奉献。

1995年6月14日

度人先度己

各位道友：

关于《度人经》的成经历史和主要内容，贫道我就不再重复了。这里我只想谈一点学习《度人经》的心得。

此经名为“度人”。这里的“人”，指的是学道的人和不学道的人，行善的人和无善心的人，甚至道德丑陋、行为卑劣、犯有错误的人。因此，学道的人，我们要度；尚未学道或者不学道的人，我们也要度。学道的人已经努力在走进道门了，需要我们拉一把，需要度。尚未学道的人更需要我们帮助，有的还需要我们当头棒喝，加以挽救，使其醒悟，脱离错误和罪恶的火坑。这就是我们道教的济世胸怀，也就是我们道教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之一。

此经名为“度人”。在汉字中，度原来就有渡河的意思，从河水的此岸渡到彼岸去。人生就像一条大河：一边是善，一边是恶；一边光明，一边黑暗；光明的一边光辉灿烂，黑暗的一边泥潭火坑。我们说的度人，就是要帮助不学道的人学道，帮助学道的人成道，使人从恶变成善，从差变好，从假变真，从丑变美。度人就好像

坐船，船在水中行，需要动力。被度的人要划桨，我们度人的也要划桨。不用力，河是度不过去的。这就是说，度人有一个过程。一个人要从恶变成善，就要艰苦的脱胎换骨。把旧的东西彻底抛弃，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们道教中有黄石公三试张良的故事，有祖天师张道陵七试赵升的典故，有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度马丹阳、孙不二夫妇的故事，这些故事说明一个学道的人在学道过程中会有反复，要经过种种考验。另外，这些故事也说明度人需要时间，需要决心，还需要有办法，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因人、因时和因地而有不同，需要我们度人的人多动脑子，多多用心。

度人的人和被度的人是平等的。他们的不同只是知有先后，觉有深浅。用社会上的话说，就是都在一条船上。《度人经》是对所有学道的人而言的，因此包括我们每个道门中的人在内，而且我们自己首先要悟道、得道。用一句社会上的话，那就是“教育者应该先受教育”，我们道门中的人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如果我们道门中的人本身不能成为奉道的榜样，那么我们怎么能去“度人”，怎么能去要求别人学道，又怎么能帮助别人得道呢？

度人者，必先度己。那么，怎么才能度己呢？《度人经》说到，“不杀，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盗，不贪，不欲，不憎，不妒”，唐代高道成玄英称它为“十恶”，薛幽栖又加上“言无华绮，口无恶声”称为“十二

恶”。所有这些恶事都是学道的人决不能做的事。

所谓“不杀不害”，就是要爱惜生命，不伤害生命。全真派道士吃素就是不害生灵的意思。我们正一派道士可以吃荤，但是同时要爱惜生命，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界的一草一木，更不能因为私利去伤害无辜百姓。

所谓“不嫉不妒”，就是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对于别人的成就要由衷的高兴，并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学水平，也为道教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道门中只有分工的不同，觉悟的先后，没有高低荣辱的区分，因此不应该对于别人有嫉妒之心。

所谓“不淫不盗”，就是要在人际关系中遵守社会公德。我们正一派道士可以娶妻，但是不允许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们可以赚钱养家活口，但是不允许用不正当的手段把别人的钱财占为己有，更不允许侵吞公产公款。

所谓“不贪不欲”，就是要淡泊人生，不生贪欲。《道德经》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人之所以不知足，之所以贪得无厌，就是因为欲望，包括权欲、名欲、利欲、食欲、色欲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自身的一点蝇头小利。人有了贪欲，就会做出偷盗、嫉妒、奸淫、阴谋乃至于伤害他人的坏事，有的甚至还会犯罪。我们学道的人一定要追求清静淡泊的人生理想，抛弃不正当的私欲。

所谓“不憎不妒”(音自)，就是不要厌恶和猜疑别人。

这里的厌恶和猜疑，是嫉妒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人有了私欲，心胸就会狭窄，眼光就会变小，对待同道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变得虚伪和猜疑，对与己有用的人奉承拍马，对与己无用的人冷若冰霜。一旦实现欲望有阻时，或者丧气灰心，或者不满现实，或者讨厌憎恶和无端猜疑周围的一切。

所谓“言无华绮，口无恶声”，就是不要说粗话和脏话，特别是说话办事要实事求是，注意分寸，不能遇到有钱有势的人就阿谀奉承，吹牛拍马，遇到无钱无势的人就盛势凌人，傲慢无理。

以上十恶，或者说十二恶，如果我们都能没有，那么从个人来说，就是修道得道了。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天下人都没有这十恶或十二恶，那么天下人就“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了。退一步讲，如果我们道门中的人都能灭除十恶或十二恶，那么道门中的人就能够“齐同慈爱，异骨成亲”了。套用一句社会上的话，那就会使我们道教内的“小环境”和谐舒畅。进了道门的，不想出去；没进道门的，还想进来。

“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这是我们道教的理想世界。我们道教并不只是叩叩头，念念经，我们有自己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太平”世界的理想。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亲兄弟、亲姐妹，彼此之间没有压迫、没有欺骗、没有妒嫉、没有仇恨、没有偷盗、没有邪淫、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国

家平安、人民富裕，生活幸福。这样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不过我们道教称它为“太平”世界。当然，我们道教之所以有这样的社会理想是由我们对“道”的信仰决定的。《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太平经》里还多次说到“天道无亲，唯善是与”，我们学道的人就是要实践成仙之道，多行善行。《度人经》中说：“仙道贵生，无量度人”。这就是说，我们学道修道的人，眼睛不能只看着自己的修持和修养，也就是说我们的修道学道不能只是为自己，我们的目光要看着众生，也就是说我们的修道学道不能只是为自己，我们的目光要看着众生，要看着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自己处处以道来规范行为，并且以自己的修养、道德行为来感化众生，普度众生。只有这样一种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别人为社会的修道，才是真正的仙道。真正的仙道修持，其善功是不可限量的。

以上就是我读《度人经》的一点心得，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道友批评指正。

谢谢各位！

（1995年12月6日在江西龙虎山道教正一派授箓仪式上的发言）

上海道教正在努力适应当今社会

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我们道教徒的自身素质，积极引导广大道教徒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努力使上海道教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

一、进一步提高道教徒的自身素质

上海道教从提高道教徒的素质入手，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政治素质。在政治上，要求我们广大道教徒，要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方面，上海道教一直都很重视。如上海道协坚持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学习，使大家了解到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激发了我们广大教徒的爱国热情。也使我们认识到，道教的命运与国家盛衰有着亲缘联系。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国运昌盛时期，道教也随之昌盛。每当国运衰弱时期，道教也随之而衰弱。道教徒深知，道

教的坚强靠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祖国民族亲情。国家不强盛，人民不富裕，道教就不能振兴。上海道学院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从学生阶段，就开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全市各道观也坚持组织学习时事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学习和教育激励广大道教徒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是文化素养和道德教育。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更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道教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道协在有关会议报告中曾多次提出，要把提高广大道教徒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作为各级道教组织的重要工作来抓，要有紧迫感，要把它放到整个道教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上海道学院更应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方面做好基础工作。我们在招收学员时，就严格把关，通过文化考试和道德审核，择优录取。入学后，又加强文化课的教学，使他们广泛认识到学好文化课的重要性。因此，文化课的学习和道德素养的提高，也成了道学院培养青年道教徒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今后上海道教队伍的面貌。同时上海道协还定期举办道教知识讲座和各类学习班，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励广大道教徒重视学习文化知识。道协负责人，不但自己努力提高文化素养，而且还有甘

当阶梯的精神，扶植和造就可学之才。通过几年的努力，上海道教徒的素质总体上得到了提高。

第三，是道教学识方面的提高，道教知识的学习主要来源于道学院的教学和道教徒们的自学，以及师带徒的学习方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道教知识和传统的仪规又重新得到传承，上海道协还采用现代化手段，对传统的科仪进行录音、录像，对一些不适应时代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和删除，弘扬那些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目前，上海各宫观的青年道教徒，都毕业于道学院，是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实践，因此，都具有一定的道教知识和科仪水平，在各宫观中，担负起弘扬道教的历史重任，在对外交往和团结广大信徒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积极引导广大道教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首先，积极宣传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严格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非正常的宗教活动区分开来。如上海道协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做好信徒的宗教活动工作，使一批道教信徒重新回到正式开放的道观内敬香，消除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其次，帮助广大教徒过好正常的宗教生活，在政策和条件许可范围内，市道协在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恢复了必要的活动场所，以满足广大信徒过好正常宗教生活。在道观内，我们广大教徒都能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同时，还积极引导周围一大批信徒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自觉地接受共

产党的领导。上海道协定期去各道观召开会议，讨论工作，对一些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找出良好的解决办法。上海道协还就散居道士的管理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经过多次调查，反复试点，初步摸索了一套管理的具体方案。日前，此项工作继续在深入探索之中。通过加强管理和积极引导，使上海的道教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从而使广大信徒成为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发扬优良传统积极适应社会

道教在立教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规范，包括在戒律条文中，对道教徒有相当强烈的约束力，成为道教徒必须遵守的规则。道教的这种道德规戒，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们当代道教徒要以此为目标，发扬道教优秀的道德规戒。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过无数代人的阐释和实践，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体力行，传承发扬，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美德中的热爱祖国、崇尚气节、勤劳节俭、尊老爱幼、惩恶扬善、诚实守信、孝亲尊师、廉洁奉公、团结友爱、谦虚礼貌、乐善好施等具体品质，仍然包含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内容之中。这些传统美德在我们道教界也得到充分体现。

今天的道教，处在历史最好的时期。我们更应该继续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积极适应当今社会。

第一，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理解当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发挥道教的积极因素，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

第二，要培养有爱国爱教、具有开拓精神的新一代道教徒。在政治上要坚持爱国爱教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社会，有益民众。

第三，要在教理教义上丰富和发展对于“道”的认识。“道”是我们道教的基本信仰，信道崇道那是不能变化的，但是，“道”的内容是应该随着时代进步而向前发展的。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它同五十年前的世界已有很大差别，前辈道长对于道的理解和认识，也应该由我们当代道教徒作出补充、修改和发展，以丰富道教的教理教义。

第四，在道术和道教仪规方面，某些为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内容，应该加以发扬光大，对于道教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加以弘扬；对于某些不适应社会的内容，我们应加以适当的调整。著名的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早在五十年代时曾说过，一是道教的形式，二是道教的精神，道教的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而道教的精神，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继续得到流传的，其中一些有利于社会的内容，应该加以弘扬，使之更加适应社会，造福人民。

第五，现代道教要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只有参与才能适应。道教旅游、道教文学、道教文化用品、食品、药品、饮料、道教医学、养生学都可以作为开发对象，让它们走进市场，走出国门，上海是具备这方面条件的。因此，我们要积极开拓，勇于进取。

总之，我们的道教要主动去适应社会、适应时代的发展，我们更要珍惜道教今天在政治上、社会上获得的地位，在信仰上获得的尊重，在文化上获得的弘扬。因此，我们道教要紧密联合，加强团结，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自己的信仰和修养水平，做到弘扬道教，服务社会，善导众生，造福人类。

1996 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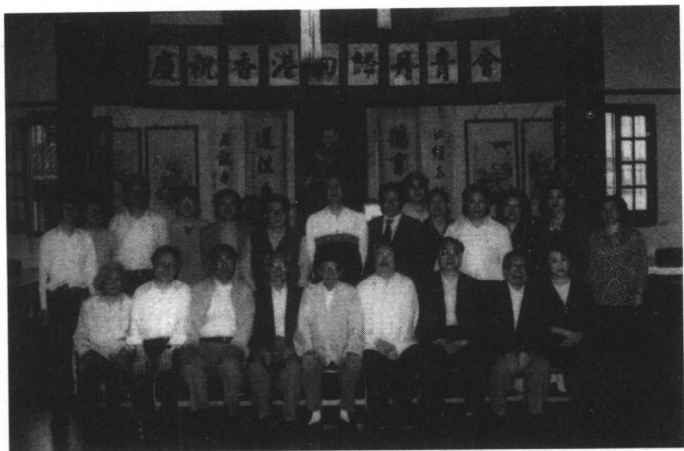
百年国耻，一朝洗雪

——庆祝香港回归有感

在香港回归之际，我兴奋不已，感慨万千。我首先想到的是，香港回归，从此洗了中国近代史的耻辱。百年历史，不堪回首，而香港的百年历史，正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巨额的白银外流，加上清政府的腐败妥协投降，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洋枪洋炮的胁迫下，1842年8月29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随后又是《北京条约》。从此，祖国的领土香港被英帝国主义所强占，此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接踵而来：1844年，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随后，日本、德国、沙俄、葡萄牙等帝国主义相继迫使清廷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还享有一切特权。中国领土的完整遭到了彻底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于是，中国这个世界文明古国，不再是昔日的天朝大国，而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从鸦片战争到南京大屠杀，无不强烈地刺激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冬去春来，我们终于迎来了香港回归首战告捷的



1997年5月5日，上海市道教协会在白云观庆祝香港回归丹青会。图为市宗教局吴孟庆副局长和市道协陈莲笙会长等与丹青会全体成员合影。

1982年，邓小平同志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阐明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明确提出1997年7月1日要收回香港。至此中国人民蒙受一百余年的耻辱，得到了彻底洗雪，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欢欣与自豪。

香港的顺利回归，标志着新中国的繁荣强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国家的强盛，才有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洒尽了热血，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了起来，成为当今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如今，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下,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国富民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改革开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香港的回归正是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如果没有国家的繁荣和兴盛,就不可能有香港回归的今天。祖国今日的强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们道教的今天。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同样是广大道教徒的共同愿望。

香港的回归,是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香港回归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的成功,同时也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树立了榜样。

香港回归,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炎黄子孙多年的梦想。我相信,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繁荣更美好。

1997年7月

在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同道、各位同学：

首先向市宗教局吴孟庆副局长光临指导，向北京中国道教学院教务长陈兆康同志专程来沪参加中国道教学院上海道教进修班开学典礼表示万分感谢。

上海开办像这样层次高的道教进修班，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我作为一个老道，看到有这么一所学校，看到有二十多位具有中等文化的同道就学，内心是无限欣慰的。回想一下，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忘本。

以下我简单地讲三点：

第一要有紧迫感。我们国家在飞跃的发展，各项事业亦积极地发展—改革—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道教也应该紧紧地随着发展而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此我们一定要迫切地紧跟着社会的发展！

第二要有责任感。21世纪即将到来，我们道教在21世纪如何发展，全赖年轻的教职人员，特别是在座的学员的努力，你们的机遇很好，我们老一辈的道长根本没

有这样的机遇，旧社会也不可能有此良好的机遇，所以说当前的机遇也只有你们年轻的教职人员在新社会才遇到的，当然责任也不小，相信在努力地学习之下完全能挑起进入 21 世纪的发展重任。

第三要有使命感。弘扬和发展道教文化的优良传统，不仅是对道教发扬问题，而主要是对人类道德伦理，人人为善的使命，也就是道教教职人员都要有弘道扬善、济世度人的使命，尤其是在座的学员更要有这样的使命感。

以上是我所讲的三个“感”，相信在你们这批年轻的学员身上会体现出来的，也是我这个老道所希望的。总之，21 世纪道教发展，希望在你们身上，要不辜负领导的关怀、支持和期望，不辜负我们老一辈的道长的愿望。最后再一次谢谢局长，谢谢陈教务长。

祝大家健康。谢谢！

1998 年 6 月 12 日

珍惜大好形势，弘扬道教文化

——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二十周年

二十年前的12月18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改革开放的喜讯迅速传遍了祖国神州大地，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建国以来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进了我们宗教界，吹来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落实。道教也由此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开始进入它发展史上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道教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开创了弘扬上海道教文化工作的新局面。

众所周知，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我国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哲学思想、民风习俗、科学技术、医药卫生、音乐艺术乃至政治经济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同时，还传播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

典籍更是远播欧美。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根柢全在于道教”。要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哲学思想、科学文化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规律，全面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道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20世纪以来，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当重视对中国道教的研究，他们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主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成立了道教学会，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中国道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整理，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绩。不仅如此，他们还频频地主办国际道教学术会议，共商道教研究之大计。特别是日本对我国道教的研究，诚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道教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一项热门课题。与此相反，作为道教故乡的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道教研究不仅没有广泛开展，同时还在一个时期被视为“禁区”，不仅没有专门的科研机构和学会等组织，而且从事道教研究的专业人员也寥若晨星，科研成果更是屈指可数。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道教界和学术界才逐步重视和加强对道教文化的研究。上海市道教协会自1985年正式成立之后，就将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提到议事日程。

首先成立了专门的道教文化研究机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道教对外关系的日益扩大，以及与世界宗教界的来往也益行频繁。我们上海道教界的思想水平，也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上海市道协领导

经过认真考虑后认为，上海道教要有自己的研究机构，这样才能适应社会、适应时代、适应上海道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于是，上海市道教协会文化研究室于1987年正式成立。聘请了教内外一些著名的学者和道长担任研究工作，研究室还举办“道教知识讲座”，配合《上海宗教志》的编写工作，撰写《上海道教志》，同时研究室还多次派人出去参加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并拿出具有一定质量的论文。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宣传上海道教、弘扬道教文化打下了基础，也让全国乃至世界了解上海道教做了一定工作。

其次是创办了《上海道教》杂志，开创了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的新局面。《上海道教》杂志的创刊，在上海道教史上是一个创举。纵观上海道教历史，还没有出现过自己的刊物，虽然早在三十年代，道教学者陈樱宁先生在上海创办过《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但皆不是纯粹研究道教的刊物，更不是我们道教自己创办的。虽然如此，维持的时间也很短暂，而《上海道教》杂志则系上海道教协会的会刊，它由上海市道教协会主办，由道教文化研究室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和出版工作。其宗旨是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以研究和探索中国道教文化、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为中心，致力于沟通道教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增进道谊，交流教务，办成具有学术性、文献性、艺术性、健身性和导游性的综合性刊物。《上海道教》自1988年正式创刊以来，至今已经整



1997年9月28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中）接见市宗教界代表人士时合影（前排左二为陈莲笙道长）。

整十年了，十年来，紧紧围绕其办刊宗旨，在积极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道教文化，指导道教工作，交流经验，提供信息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得到上海市宗教局领导和市道教协会领导的好评，也得到海外专家学者和兄弟省市道教界的好评。十年之中《上海道教》发表的文字，已经有三百万字之多，这个数目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十年的《上海道教》既记录了上海道教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足迹，也反映了上海道教界总体水平的提高。正如有的学者在《上海道教》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所说的：《上海道教》杂志是上海道教的一面旗帜，更是上海道教的历史丰碑。

第三是摄制了《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录像片和录音磁带。为了抢救和保护道教仪范和道教音乐,由上海市道教协会和上海音乐学院联合录制了《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录像片和录音磁带,记录了上海地区道士举行“净坛科仪”、“进表科仪”的过程和音乐演奏,其演奏和录音、录像制作均具有较高的水平。该录像片所记录的宗教仪式,既是中国古代宗教哲学思想的体现,又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仪仗古朴,服饰绚丽,经文典雅,仪礼有序,音乐更是丰富多彩,既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继承,又同民间音乐保持着血肉联系,具有中国宗教音乐的特点。《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的摄制,开创了《中国道教斋醮》录像的先河。此后,上海道协和上海音乐学院又摄制完成了第五集全真坤道“关灯散花科仪”、第七集茅山卷“进表”(三茅表)科仪、第八集常熟卷“早朝行道科仪”等,各集都真实、客观、系统、完整而高质量地抢救和记录了各地各宗派道士的道教仪式的全过程,对我国的音乐、宗教、历史、民族、民俗以及文化等各学科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除此之外,上海道教在道观的修复、道教接班人的培养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上海城隍庙的落政和上海道学院的创办,都是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具体体现,更是我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一个反映。

以上这些成绩都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取

得的，在此之前，上海道教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改革开放以后，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工作才开始为人们所重视。无论是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室的成立，《上海道教》杂志的创刊，斋醮录像片的摄制，道教音乐磁带的录制，还是上海道学院的创办，都是上海道教史上的创举，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产物。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们道教界的今天，更不可能有上海道教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上海道教所做的工作，颂赞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就是要我们广大道教徒更好地珍惜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珍惜当前道教在政治上获得的地位，在信仰上获得的尊重和在社会上获得的弘扬。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邓小平老人家，同时也更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宗教的论述，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8年12月14日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市政协民族委、市政协宗教委、市民委、市宗教局联合举办的“宗教界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坚决拥护党中央取缔 “法轮大法研究会”的英明决策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民政部发布了《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研究室发布了《李洪志其人其事》，以及公安部对李洪志的《通缉令》。我们上海道教界全体教职人员认真学习了以上四个文件，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这一英明而果断的决策，一致认为：非常正确，非常及时。

我本人在学习了上述中央文件之后，初步体会有三点：

（一）“法轮大法研究会”没有向民政部门登记，是一个非法组织。其头目李洪志自称“救世主”，散发大量的歪理邪说，蛊惑群众，屡次围攻新闻单位，以及党政机关；尤其严重的是，今年4月25日，煽动其“信众”万人以上围聚中南海，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干扰社会公共秩序，破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的政治集团。

（二）“法轮功”的头目李洪志窃取了佛教与道教的许多名词，以练功、健身为幌子，行其祸国殃民的反动实质；大量印制反动的宣传物品，坑害群众，欺诈敛财，其



1999年8月12日，上海道教界举行深入揭批“法轮功”歪理邪说座谈会。图为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陈莲笙在座谈会上发言。

影响面之深广、行为之恶劣，令人发指！实是十恶不赦的、有政治野心的邪教！

（三）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通缉李洪志，对以爱国爱教为中心的五大宗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李洪志及其所控制的“法轮大法研究会”与我们五大宗教是相对立的。李洪志是具有政治野心的败类，是与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政权的历史小丑！我们坚决拥护党和政府对李洪志的一切惩处！使我们在正常的宗教活动道路上，清除垃圾，扫清障碍！

事实证明：“法轮功”对于社会秩序的扰乱和破坏是一种有组织的扰乱和破坏。我们决不能听之任之！

1999年7月

光辉的五十年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

1999年的10月1日，是万民齐欢、举国同庆的日子。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她的五十岁生日。五十年的历史，虽不能算长，但它却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五十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成就。

五十年来，上海道教，也伴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同样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近十几年来，上海道教出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无论是组织建设、人才培养，还是道教文化弘扬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变化。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都发生了急剧变化。道教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宗教文化和社会实体，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全中国解放的一百

余年间，道教一直处于衰微之中，许多名山宫观由于战火频仍、民不聊生而缺乏经济来源，道士离散，殿堂倾圮，因此大多名存实亡。而作为大城市中的上海道教也出现了畸形现象，一方面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同时，也企图影响道教和控制道教，另一方面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各地道士也纷纷来沪谋生，众多帮派云集上海。1912年6月，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和梅殿华等倡议在沪成立世界宗教会，持大同主义联合各教为一大团，并提出“各教精义大致相同，明达之士颇拟联合各教融而为一”。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李提摩太“融而为一”的建议，只能是企图控制道教，最后吃掉道教，为其控制中国人民的宗教生活的目的服务。1928年、192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又连续颁布了“神祀存废标准”和《寺庙管理条例》，各地进行的打倒“迷信”运动，破坏了相当数量的庙观和神像，使本已在衰落中的道教更是雪上加霜！

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及价值规律也渗进了道教的机体，道教的宫观也逐渐沦为“商店”。如上海城隍庙是由道士自管的道观，1926年黄金荣等见有利可图，就插手组织“邑庙董事会”，控制城隍庙的经济。以后，又以各种方式把各殿分包经营，使城隍庙成了庙不像庙、商店不像商店的状况。1927年国民政府驱逐天后宫道士、捣毁神像；1930年国民党第五区党部数十人捣毁重新修复准备

开放的钦赐仰殿道观；1932年钦赐仰殿各殿被招人投标。其他一些幸存的道观也由于经济影响，被迫改变了原有的宗教面貌。

建国后，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感召下，广大道教徒自觉地走上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道路。1957年3月，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委会成立，是为上海道教界联合的爱国组织。1961年中国道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之后，上海道协筹委会根据会议精神，加强对上海道教教务工作的管理，使道教的宗教活动逐渐正常化，基本改变了过去上海道教的散乱状态。同时，对广大道教徒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我们的道教是在祖国这片土地上创立起来的宗教，有着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祖国，也就不会有我们这样的道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道观内部也开始改变了过去的封建制度，提倡民主管理，改变了道教队伍内部不平等现象，去除了一些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活动内容，恢复了道教作为信仰的纯洁面目，宫观管理也逐步走向正常化。

“文革”期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虽曾一度受到错误扼制，道教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2年中央十九号文件有关宗教政策发布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道教得到恢复和发展。1981年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委会恢复活动，道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平反，被赶

出宫观、还俗的道士重归道门。同年底收回了浦东钦赐仰殿道观，1984年又收回了上海白云观，请回了道教神像，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1985年上海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团结全市道教徒，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教祖“道法自然”的教诲；爱国爱教，继承发扬道教优良传统，整理研究道教文化遗产，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全市道教徒的合法权益，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此后，上海道教又相继收回一部分道观，皆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各道观都建立了民主管理机构，部分区县还成立了道教协会组织。我们道教界人士在政治上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上海道教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组织建设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迈开了新的一步。

其次，上海道教在弘扬道教文化方面的变化。上海市道教协会自1985年正式成立之后，就将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

1987年，上海市道教协会文化研究室正式成立，聘请了教内外一些著名的学者和道长担任研究工作，研究室还恢复举办“道教知识讲座”，配合《上海宗教志》的编写工作，撰写了《道教志》。同时，研究室还多次派人出去参加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并拿出具有一定质量的论文。

1988年，创办了《上海道教》杂志，开创了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的新局面。《上海道教》的创刊，在上海道教史上是一个突破。它是由上海市道教协会主办，由道协文化研究室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和出版工作。其宗旨是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以研究和探索中国道教文化、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为中心，致力于沟通道教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增进道谊，交流教务，办成具有学术性、文献性、艺术性、健身性和导游性的综合性刊物。《上海道教》自1988年正式创刊以来，至今已经十多年了，十多年来紧紧围绕其办刊宗旨，在积极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道教文化、指导工作、交流经验、提供信息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十余年来，《上海道教》发表的文字已经有三百万字，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十余年的《上海道教》，既记录了上海道教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足迹，也反映了上海道教界总体水平的提高。因此，有人说，《上海道教》杂志是上海道教的一面旗帜、一个丰碑。

同时，上海市道教协会和上海音乐学院还联合录制了《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录像片和录音磁带，记录了上海地区道士举行“净坛科仪”、“进表科仪”的过程和音乐演奏，其演奏的录音、录像制品均具有较高的水平。该录像片所记录的宗教仪式，既是中国古代宗教哲学思想的体现，又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仪仗古朴，服饰绚丽，经文典雅，仪礼有序，音乐更是

丰富多彩，既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继承，又同民间音乐保持着血肉联系，具有中国宗教音乐的特点。《中国道教斋醮·上海卷》的摄制，开创了《中国道教斋醮》录像的先河。

第三，在加强上海道教自身建设和培养道教接班人方面的变化。上海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之后，就把加强自身建设和培养接班人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制定了一整套的管理办法及有关制度和规定，去除了一些不适应现代社会内容的宗教活动，对道观内的宗教活动进行了重新规范。还协助各道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帮助道观成立民主管理机构。并根据上海道观的实际情况，积极倡导“文明敬香”。在《上海宗教事务条例》颁布之后，市道协又根据《条例》规定，对上海各道观道士进行了身份认定，制止了社会上的乱收徒、乱传度现象。在教制建设方面，逐步健全和完善传统的规戒制度，这种规戒制度，既要符合道教的传统，又有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上海道教也正在探索一条既符合上海道教传统，又适应社会发展的规戒制度，以使上海道教与社会相适应方面迈开新的一步。另外，在道教人才培养方面，创办了上海道学院，以培养和造就道教教务、宫观管理和道教研究等专门人才为宗旨，采取公开教学与师徒传授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文化课与专业课并重，道心和德行兼修的教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上海道学院创办至今，已有三届学员毕业，初

步解决了上海道教接班人断层的问题。目前，上海道学院又在中国道学院的关心和支持下，举办了第一期进修班，为上海道教进一步培养高层次的接班人而努力。

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体现在上海道教的今昔变化之中，这不仅是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具体体现，而且也是建国以来大好形势的一个反映。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没有我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宗教政策的英明，就不可能有我们上海道教的今天。

我们在隆重纪念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回顾上海道教的根本变化，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祖国的繁荣昌盛，才有我们道教的兴盛，道教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要倍加珍惜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要为国家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多作贡献，使道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999年9月

在上海市道教协会 第四届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全国人民欢庆建国五十周年之际，上海市道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和中国道教协会及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今天隆重召开了。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上海市道教协会，向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各位领导、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这次会议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也是本世纪的最后一次盛会。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本次会议肩负着把上海道教事业承前启后、推向新世纪的历史重任。全体代表将以主人翁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共商新世纪上海道教工作大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届道代会以来，至今已四年了。回顾过去的四年，我会积极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遵纪守法，并注重抓好全体道众的政治学习，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加强培养青年教职人员的管理能力；建立完善的管理制



上海市宗教局马定华副局长与当选上海市道教协会第四届名誉会长的陈莲笙道长握手祝贺。

度；进一步探索研究道教文化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体理事和广大道教徒通力合作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上海市道教协会，向为道教工作作出辛勤努力、热忱奉献的广大道教徒，向所有关心支持道教工作的党政领导和各方面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各位代表，这次会议我们将听取并审议《上海市道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讨论修改《上海市道教协会章程》；选举第四届理事。同时我们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找出差距，集思广益，把这次会议开好。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肩负起历史的重任，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团结一心，实事求是，共商道教大事，共同努力，完成

这次会议的各项议程和任务。

各位代表，让我们携起手来，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旗帜，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带领全市道教徒，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祝：各位代表长生久视、道气长存！

祝：各位领导和来宾身体健康！

预祝第四届代表会议圆满成功。

1999年10月13日

坚持信仰，适应时代

道衲有幸，以耄耋之年与众位共同迎来了新的 21 世纪。新世纪中，道教将会怎样？这是放置于众道教徒以及关心道教命运之人士眼前的问题。

新世纪并非凭空而来，乃是 20 世纪之延续。20 世纪中，人类社会曾经蒙受了战争的巨大创痛。道衲之前半生就一直颠簸于战乱之中。20 世纪中，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飞速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年里发展更是惊人。新世纪中，人类社会仍然需要面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新世纪中，社会仍将高速发展，科学昌明，生活提高，文明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环境和保护自然生态问题将日趋严重，人口数量增加，生存环境恶化，耗用资源过度，生存危机迫在眉睫。加上社会财富集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将要扩大，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发展水平的差距也会扩大。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又会突现，以及社会的老龄化问题，老年人的监护问题，社会经济负担问题，医疗保险费用问题等等。还有社会的民主化和人权问题，妇女和儿童问题，等等。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问题层出不穷。

令道衲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新世纪中，中国将要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然后，向发达国家的目标前进。中国又将出现汉唐盛世。中华民族将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尽管这一宏伟前景，道衲不能亲眼目睹，但是，每思及此，总使人兴奋不已。当然，要实现此宏伟目标，中国还存在很多问题，另外还会出现难以估计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面对新世纪，中国的道教应如何应对？

首先，道教仍将长期存在，并在坚持传统和革新变化中发展。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历史积淀下来的儒、释、道传统浸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这个思想传统不会终止，也不可能终止。道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道教的生命力也就包含在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之中。进入21世纪，中华文化传统也面临挑战，终将发生某些变化。但是，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会轻易丢失。离开传统的革新是不会持久的，离开创新的复古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新世纪中，道教文化也将在改革和复古的不断矛盾变化中前进。道教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善于在革新和复古的矛盾中寻找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第二，道教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中，要充分关心民众的精神生活。新世纪的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而人的精神世界变化明显滞后，加上社会矛盾、生活困扰和天灾人祸交织一起，人就需要在精神上得到抚慰、帮

助和解脱。因此，道教应该积极地面对社会，关心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给人以精神、信仰和伦理的帮助。新世纪又是崇尚个性、自由的时代，因此，新世纪中人的精神世界又是多元的，对于信仰的选择也更加自由。处在这样的时代，道教如果不发展、不变化，就会无法适应、无法满足民众的信仰要求，就会失去发挥自己功能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中国道教应该发展自己的教义思想和规戒伦理，革新自己的科仪和法术，发扬传统的养生修炼方法，提高道教信仰的层次，为一切需要关怀和帮助的民众服务。在新世纪中，道教如果既不能为信徒



2001年11月在上海白云观举行“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毕业典礼”。图居中为国家宗教事务局政法司院校处吕晋光处长，左二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右二为上海市民宗委曹斌副主任，右一为陈莲笙名誉会长。

的“生”的需要服务，又不能满足信徒对“死”后世界的愿望，就会失去信徒和丧失未来。

第三，道教在充满竞争的新世纪要勇敢地面对挑战。这些挑战，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成分，也有来自新的文化成分，当然，也有来自社会的经济和生活。对于各种挑战，最紧要的应对，是道教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必须加强内部的团结，不论是什么宗派，是怎样的法脉，在社会上应该以一个声音说话，应该捏成一个拳头。在教义思想上，改变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内容，以教义思想和宗教规戒为民众服务；在道教组织内，积极培养新的领袖，全心全意为信徒服务。在信仰市场里，将信徒看作是自己的“上帝”，使民众感到道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有了社会承认的存在价值，道教自然就可以在21世纪里立于不败之地。

前贤说过：“道由人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道衲年迈体衰，人微言轻，只能寄希望于各位青年道友和信众。只要在世纪之初就自觉适应新世纪的变化，那么，道教在21世纪中仍将会有较大的发展。

2000 年秋

在上海城隍庙住持升座典礼上的 开示词

为师在此作传度弘法之开示。

今天说的开示的内容，是“三皈、五戒、道门十规”。

道是道教的根本，道是无所不在的。以道立教，以教弘道，但是，道由人弘，教由人传，法由人显。

经是道教教义、典籍之经文，是历代祖师所著作的经文。所谓无文不立，无文不度，无文不光，无文不成，无文不明，无文不生，因此，学经、尊经，至关重要。

师乃是学道、学经之导师，所谓学道修真，无师不度。

所谓“五戒”即“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言、不荤酒”。

至于所谓不杀，为师以为，应少杀生，尽可能不杀生，尤其是对于人类，有益于人类的动物和珍稀的动物，包括有益于人类的飞潜和植被，这些都应该加以保护。

至于“不盗、不淫、不妄言”，这里就不多说了。为师以为“不荤酒”，在这里要改成“不烟酒”，烟指毒品，酒指酗酒。

所谓“道门十规”，就是四十二代天师张宇初真人所



在上海城隍庙住持升座典礼上,陈莲笙住持在三清前拈香。

写的著作。道门十规所说的,主要是对于正一派道观的道士,尤其是对于可以接纳道士云游的大庙,有关作息、出入、礼仪、斋醮、斋食等规则和制度,也是道教徒修持、出行、访道以及衣食住行的规范,不仅遵守本庙观的规则制度,同时,也要遵守和尊重其他派系道观的清规,例如,到全真道观挂单,应按照规定挂单,即挂号。不过为师以为原来的“无偿挂单”,今后要改变为“有偿付费挂单”,收取部分费用,以减轻常住的负担。当然,“挂单”是个比较好的办法,可以促进道门内部相互交流,沟通情况,增进友谊,提高文化以及自身素质等等,利多弊少,应该提倡。但是,必须把原来自由散漫的、无节制的“挂单云游”行为,改变为有规范的学道行为,逐

步形成良好的、自然的、有组织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好风气。

老衲限于精力，不能多说，希望众弟子：

一、多多阅读《道门十规》，即四十二代天师张宇初的著作。

二、在道教事业上多作努力，提高文化修养，提高道学素质，同时，还要学习英文、日文、法文，在2010年前，还要有组织的办学，使得中国的道教有条件能够向外输出，使得道教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宗教。

三、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中华民族的子孙。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道教一定能够道炁长存，正教兴行。

最后，借此机会，对于今天出席的各位领导、嘉宾、专家、道长对这次弘法传度活动的支持和协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谢谢。

2000年11月14日

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八十华诞

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道衲衷心祝贺华诞，并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振兴，国富民强。

道衲之所以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是因为道衲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熟悉旧社会民不聊生，百业凋敝，华人受欺，国家不国的事实。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的道理。

道衲之所以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是因为道衲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实事求是”就是我们道门中常说的“道法自然”。有了“实事求是”才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才有今天的百业兴旺，民心舒畅。

道衲之所以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是因为道衲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三个代表”就是我们道门中人追求的“太平社会”。有了“三个代表”就有众生的平等，社会的太平，就有国家的清正廉洁，长治久安。

正如两千年的道教的历史上，有过曲曲弯弯一样，中国共产党在八十年中也有缺点和教训，道衲在此期间也蒙受过冤屈。但是，道衲始终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也有力量自己改正。乌云只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的

路线决定了她始终和最大多数的人民站在一起，因此她总是一支有活力有未来的力量。

正如道门之中的人未必都是得道之士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也会有党性不强的人存在。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但是，道衲始终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也有力量自己来整顿清理。问题总是局部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决定了她容不得一切为自己谋私利的人混杂其中，因此她总是一支得民心得天下的力量。

道衲耄耋年迈，愿以微弱之心声，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新世纪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更大胜利。祝愿祖国在她的领导下年年风调雨顺，兴旺强盛。祝愿中国人民在她的领导下人人生活富裕，精神健康，称心如意。祝愿我们道教徒在她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引导下，信仰自由，道业兴旺。

2001年6月

在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 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学员：

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今天举行毕业典礼，全体学员经过三年的艰苦学习，终于完成了全部学业，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要向关心这个进修班的上海市宗教局的各级领导、向在三年中为教学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老师、向一直支持这个进修班的中国道教学院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年以前，在进修班开学的时候，我曾经以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三个方面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完成这个上海道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习任务。现在，时间过得很快，三年过去了，学员的道教知识水平、文字写作技能以及分析和处理事务的能力，都有了提高，上了一个台阶。

今后怎么办？

中国有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我希望，在座各位学员今后能继续自觉地学习，努力在工作中学习。因为：

第一，道教的历史和文化是博大精深的。现在你们

学到的一些还只是入门的知识。社会对于道教的研究尽管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和深入。

第二，道教的现实发展出现了许多历史上未曾遇见过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坚定信仰，维护信仰和纯洁道风的问题。这些需要我们借鉴历史的经验，不断创新，不断开拓，逐步将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妥善地解决。

第三，道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课题。这个课题的解决需要几代道士甚至几十代道士的共同努力。道教要存在下去，也必然要存在下去。这里需要学员们不断贡献智慧，贡献力量。

贫道已经年暮力衰，但是贫道看到学员们不断成长，就看到了道教的未来和希望。

祝愿各位学员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祝愿上海道教健康发展，道业兴旺。

我就说这些。

谢谢各位。

2001年11月23日

中国道教也会走向世界

——从意大利客人来上海做道场想到的

二〇〇二年的七月底，上海城隍庙接待了专程从意大利来的几位客人，并为他们的亡故亲人做了一场黄箓超度的道场。

这场道场规模不大，三名法师，十六名道士，道场只有一天，其科仪安排完全同普通中国人的超度科仪一样。

外国信众在科仪中，全部按照中国传统的上香跪拜烧纸，同中国普通信众没有什么两样。

上海城隍庙也像对于中国一般信众那样收取外国信众的行仪费用，其费用水平也同中国普通信众一样。

但是，这场道场的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可能是中国近代道教历史上第一次为普通的外国信众举行的超度道场。

近百年来，上海一直像中国的大门和窗口，外国人在上海生活的很多。道衲自幼混迹于十里洋场的道门之中。青年时代在殡仪馆里做道场，每逢看到别的厅里有外国人殡葬，常常有这样的愿望，希望也有可能为外国亡人开路、引灵、做道场。但是，那个时候，中国还处

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社会处在四分五裂之中，中国人在那些冒险家们的眼里，还是留辫子、裹小脚的愚昧大众，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也都应该拜倒在他们的文明棍底下，中国道教自然也是应该被唾弃的巫术迷信。所以，道衲在青年时代的想法，现在看来是幼稚的，只是一厢情愿。

这次为意大利客人超度的亡故亲人，他生前二十年中曾多次来中国访问，在北京学习过中医，在浙江学习过武术，踏访过武当山。他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因此，遗愿要在中国由道教做一场道场。于是，意大利客人坐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住好几天饭店，不远千里而来东土，问经求法，实现亡故人的遗愿。从这样一个背景，人们自然可以想到：

首先，近二十年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人已经平等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已经受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尊重和敬佩。

其次，近二十年来，中国道教全面复兴，通过道教自身努力弘扬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国学术界的研究和介绍，正逐渐为中国大多数民众和世界各国各民族所认识，得到世界各宗教的承认和尊重。道教作为一种中国宗教也平等地跻身于世界各宗教之林。中国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受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尊重和敬佩。

正是因为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得到普遍的尊重，于是意大利朋友才会专程来上海城隍庙，才会有外国人到中国来做道场这样的事情。

道衲无意夸大这场普通道场的意义，更无意夸大其辞说今后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来信仰我们的道教，到中国做道场，等等。但是，这件在近代中国道教史上罕见的事情，至少也向我们道教在新世纪中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力可能会逐渐增强。那种麦当劳加流行歌曲的快餐文化的模式终将会受到丰富的世界传统文化的内容所限制。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的道教，也会像中国传统文化其他内容一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向海外的传播，长期以来，都是由移居海外的华人携带出去的，并且主要在海外华人聚居区里传播。随着中华文化的丰富而有价值的内容逐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民众所了解和认识，外国民众学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人可能会逐渐增加，并吸收部分内容融入他们的生活之中。因此，道教的信众中间逐渐出现外国人，这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第三，信息时代给弘扬道教创造了新的手段。香港

蓬瀛仙馆的“道教文化资料库”网站和上海城隍庙等道教网站，给世界各国各民族民众了解和认识道教，提供了快速而方便的工具。特别是“道教文化资料库”网站有英文版面，就更加便于其他各国民众认识道教的真正内涵。看来，道教要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也确实要做好经典文献的外国语翻译工作、弘道材料的外国语翻译和发行等工作。

道衲已经老了，可能看不到道教阔步走向世界的那一天。但是，道衲希望，道门后继之人能看到历史赋予的机遇和挑战，未雨绸缪，及早准备，将邱处机祖师和张宇初天师所言的“立观度人”的宗旨推向世界，发挥道教对于人类的更大的贡献。

2002年8月

其 他

海上白云观

一、创建

上海道教的全真道派主要道观，是白云观。在今老西门西林后路一百弄八号，现在是上海市道教协会的所在地。

白云观创建于光绪八年(1882年)。全真道士徐至成在仁济善堂绅董们的资助下，在白云观今址，修建了雷祖殿。光绪十二年又扩建了斗姆殿、客堂和斋堂等。光绪十九年又在上海商会会长陈润夫等资助下，扩建了三清殿、吕祖殿、丘祖殿，使雷祖殿成为前门在方斜路，后门在肇周路，占地十四余亩的全真道观。同时，又在日晖港潘家木桥近大木桥南首购得土地十余亩作为十方道众羽化的坟地，于是使雷祖殿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光绪十四年住持徐至成进京，在清廷德驹、京官徐松阁(徐氏宗族)以及北京白云观方丈高仁峒的协助下，以改“雷祖殿”为“海上白云观”，即北京白云观下院的条件，请得明版《正统道藏》八千余卷。《道藏》由海路运来，抵沪之日，上海地方官吏和绅董均聚集东门外码头，披以黄缎马车送至白云观藏经阁供奉，以“留镇山门”徐至成嗣法京师白云观后，担任了海上白云观第一任监院，

并且采用了较健全的白云观规戒，确立了海上白云观的十方丛林的地位。

光绪二十年，上海海关查获并没收了准备盗卖出国的七尊明代铸造的镏金铜像，经当时上海商会会长、白云观护法陈润夫提议，以既系道教神像当由道观保管为理由，无条件移于白云观三清殿供奉。其中五尊天将为站相，高一百七十七公分，云带飘逸，法相威严，铸工精细，堪为上品。两尊张天师、许天师铜像亦为站相高一百七十五公分，仪态端庄，面容慈祥，铸造亦极为精致。

经一代监院徐至成十余年惨淡经营和苦志修行，海上白云观遂成为东南地区颇具威望的全真道观。

其布局为前殿、后殿两部分，前殿的中殿为雷祖殿、藏经阁，东殿为客堂、邱祖殿，西殿为斋堂、斗母殿等，后殿为三进，中殿为三清大殿，南为甲子殿，北为四御殿，东为救苦殿，西为吕祖殿，以及玉皇阁、钟鼓亭等。

二、由来

较早传入上海的道教是正一派。全真派传入上海，大约是稍晚一点的元代。据《松江府志》，娄县有“长春道院”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道院名为“长春”，当是纪念全真龙门教祖、长春演道主教真人邱处机(1148—1227)之意。至治元年(1321年)杨载撰《长春道院记》称长春道院前殿祠事老子，其外两庑，其后为堂，高下

降杀，与殿相承。院之东北隅，曲径深窗，有池水眼竹之胜。道院由郑君主持。郑君，钱塘人，父为将军，戎守广陵。郑君原袭文职，但自幼学道，向往长春邱真人之炼气养真之道，于是，遁隐永嘉，师受道要。累年居于密室。父母双亡之后，远游至松江，见松江无为全真教者，遂有志结庵，买地二亩，筑室四间，度弟子朱道本等。后扩充为七亩，创建为道院。但是，长春道院其后的兴废即无查考。目前，还很少能看到从1321年至1874年的五百年中有关全真派在上海的活动材料。

这代上海全真派道观的创建人是杭州显真观的全真道士王明真，他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北门外新桥朝阳楼(今浙江路北海路附近)募创了全真道观“雷祖殿”。光绪八年(1882年)雷祖殿因马路拓修，需要拆迁，当时的住持徐至成遂在今白云观址重建了雷祖殿。

三、沿革和重要节日

光绪十六年，白云观第一任监院徐至成羽化。北京白云观在光绪二十一年委派赵秋水(至中)来沪。赵秋水在沪期间，正是清末初乱的年代，据1913年7月25日《申报》七版报道：“昨日午前十一时复起谣言，谓北军将与驻在西门外白云观及南市陆家浜之军队发难，因之地方人民又起恐慌，纷纷逃避。”白云观屡遭军阀驻军之劫，全赖赵秋水周旋才得免难。1915年赵秋水羽化以后，白云观日趋萧条，管理制度亦日渐混乱。1924年至1928年

的四年中，白云观连续四次更换监院。第十五任监院刘永祥，还曾盗买土地，化用巨款吸毒、赌博，无所不为。直到1949年建国以前，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白云观一直处于道俗混杂、十分困难的境地之中。

建国以后，白云观又恢复了道教丛林的纯洁面貌，第二十一任监院杨祥富还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观藏的明版《正统道藏》为了得到科学的保存，也改由上海图书馆贮藏管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遭到破坏，白云观所藏经籍、书画等均被毁灭。1978年后，经过市政府和各方面持久努力，白云观方始恢复道观面貌。白云观的宗教活动也正在恢复之中。

白云观的主要宗教节目有：玉皇诞(农历正月初九)，清明节(农历三月初)，雷祖诞(农历六月二十四)，九皇诞(农历九月初九)，冬至节(农历十一月中)，其他如每月朔望(初一、十五)，老君诞(农历二月十五)。

附表：上海白云观历任监院名单

年份	任次	姓名	又名
1882—1890	1	徐至成	海卿
1890—1892	2	黄至纯	
1892—1893	3	杨本立	
1893—1898	4	王明玉	

1898 — 1903	5	王理传	
1903 — 1905	6	高仁峒	
1905 — 1906	7	郭永和	
1906 — 1915	8	赵至中	秋水
1915 — 1920	9	阎仁爱	
1920 — 1924	10	刘台龄	
1924 — 1925	11	汤永贞	
1925 — 1927	12	孟圆宾	
1927 年春、夏	13	史至徵	
1927 — 1928	14	吴明皓	
1928 — 1944	15	刘永祥	
1944 — 1947	16	王信德	
1947 — 1948	17	萧教纯	
1948 — 1951	18	李理山	
1951 — 1952	19	李净尘	
1952 — 1953	20	陈铁海	
1953 — 1966	21	杨祥富	

追念宋祖德道长

宋祖德道长，是上海城中世传的正一道士，也是城内、城外世传正一道士大族之一。按上海世传的正一道士在近一二个世纪中，以城内康姓、宋姓和城外法华朱姓为大族。

宋祖德道长早从父入道，以知名道士康荣根为师，勤学仪范，于斋醮法务都有造诣。

建国初，在邑庙区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与李光前、徐梅生、李三新道长组成丹凤楼庙务管理组，清理庙产、管理教务。1958年，在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委会的领导下，负责玉清宫道教加工场的工作，1960年起，先后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二届、三届、四届理事，1985年被选为上海市道教协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1986年被选为南市区政协委员。

宋祖德道长，于1989年5月11日归真。但他的为人，尤其在晚年热诚地为发展道教事业，弘扬道教文化，继承道教优良传统，以及培养道教接班人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在道协组织中给大家有明辨是非，识大体，顾大局的良好形象，不失为一个有道之士，不失为一位真正的爱国爱教的道教徒。

缅怀傅元天大师

1997年7月3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全真派第二十三代传戒大律师傅元天道长，在四川青城山羽化。他怀着振兴道教而未酬的宏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玄门震惊，教徒同悲，都为中国道教界失去一位重要领袖人物而感到痛心。今回忆大师的往事，不禁勾起我心中深切的怀念。

我与傅大师同为太上玄门之黄冠，共同的道教信仰，使我们成了多年的挚友，在与大师的交往过程中，深为大师的勤奋朴质、公正无私的精神所感动，更为他那坚贞的爱国爱教精神和高尚的道德风范所钦佩。

傅大师一生笃守玄门，信奉道教。我多次赴四川青城山参访，悉知大师弱冠时即皈依玄门，刻苦学习道教文化，对道教圣典《道德经》有较深研究，不仅能背诵，而且能用道教义理详解全文。每次与他讨论《道德经》，皆有收益，其博学宏论为道门所称赞。在庙观的管理工作上，大师总是任劳任怨，带头苦干，以身作则。青城山所属十余所道观的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中年时的傅大师，就开始把眼光投向全国，

关注着整个中国道教事业的发展。于是，他在青城山起了一个率先垂范作用，把工作重点转向培养年轻道徒身上，经过他的多年培育，青城山年轻一代道教徒脱颖而出，为道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多方探索，寻求解决自养的新途径。他将道家秘传之弥猴桃素酒配方，反复研制，多方实验，成功地掌握制作“道家洞天乳酒”的方法和技能。并设厂制作，相继创办了洞天乳酒厂和茶厂，为解决道教自养问题开了先河。

大师自出家以来，严守规戒，被道门奉为楷模。1980年以后，尽管他在道教界的声望高了，宫观的经济宽裕了，但他依然生活俭朴，终日操劳于教务。同时，他还积极倡导多行善事，常向道众说：“修桥补路，多行善事，是出家人的本分。”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还积极带头去做。1985年夏，青城山丈人峰顶岩石崩塌，为考虑香客与游人的安全，他主动提出另修新道，自己节衣缩食带头捐修，受到大家一致称赞。

傅大师为道教事业的振兴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在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还积极促进成立地方道协组织，提倡加强宫观管理，支持恢复正常宗教活动，维护道教界合法权益。对此，他总是尽心尽力，任劳任怨。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以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道教事业中去，时刻关心着全国道教的落政等工作，对有难度的落实政策工作，还

亲自过问。1995年4月，傅大师率全国政协宗教调查组来沪开展调研工作，听说上海城隍庙的落政工作和烧香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傅大师来沪后，不顾旅途劳累，立即来到城隍庙，并向我提出要求住宿城隍庙，因当时庙内条件较差，我有些为难，但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我只好勉强答应。大师住进城隍庙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有关情况，然后及时向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反映，就城隍庙的烧香问题和进一步落政问题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得到上海市委有关领导的重视。在沪期间，傅大师不顾年迈体弱，走访有关道观，为维护道教的合法权益，多方呼吁，对上海道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我与傅大师合作共事多年，深为他那宽广的胸怀和一心奉道的精神所感动。他虽为全真教徒，但从无派别之见，在处理正一、全真两派的关系上，平和妥贴。他常说，正一、全真同为道教的两大派，没有彼此的分别，我们应该广泛地加强团结，共同来弘扬道教。在他的积极倡导和中国道协领导集体身体力行下，全国道教界出现了空前的大团结。此外，傅大师对正一派的教务工作也非常关心。1995年，在茅山召开的正一授箓工作会议，傅大师亲自前往参加，并发表了讲话，认为正一派的授箓活动是道教重要的教务活动，它与全真派传戒一样重要。中国道协应积极帮助和支持做好这一工作。由于傅大师的亲自关心和过问，确保了江西龙虎山国内首次授箓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傅大师爱国爱教，道德高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有道之士，在全国道教界中享有很高威望。1986年在中国道协四届代表会上被一致推选为中国道协副会长。1989年11月，全真派在北京白云观举行传戒活动，傅大师为主持者之一，并被授予“大师”称号。他在传戒法坛上以《传戒之目的和我们受戒后的努力方向》为题作了讲话，鼓励道士持戒后应更好地爱国爱教。1995年11月全真派在四川青城山又举行了第二次传戒活动，傅大师被推举为方丈大律师，全面负责整个传戒活动。即使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仍然是尽心尽力，为传戒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事实上自1992年，傅大师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后，就做好了把自己一生奉献给道教事业的准备。他首先倡导全国道教界要重视和抓紧培养道教接班人。在他的多方努力下，中国道学院终于正式挂牌，为培养接班人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他又积极号召全国道教界要爱国爱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使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可以说傅大师是当代道教徒爱国爱教的楷模。

傅大师的仙逝，是我道门的一大损失，可惜天妒英才，不借遐龄。大师是带着深深的遗憾而离开我们的，他给我们留下了弘道未尽的遗愿。但是，对于弘道所做的诸多工作，大师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要继承大师的遗愿，沿着道教事业的康庄大道奋勇前进。

怀念龚群先生

惊悉龚群先生仙逝，我不胜哀痛。遥望南天，心潮难平。

龚群先生将毕生精力均献之于中国道教。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赴台湾后，龚群先生即护法于天师左右。天师羽化后，龚群先生又坚持创办《道教文化》杂志，继续弘扬道教文化，传承正一道法。近二十年来，龚群先生置自身年迈体弱于不顾，奔走于海峡两岸，参访大陆道教宫观，关心青年道士之培养，全力支持正一派恢复授箓制度，出钱出力，维护正一派优良传统，不遗余力。凡此种种，均历历在目，铭记于心。

记得贫道与龚群先生初次见面是在十年以前。1989年8月17日，龚群先生与张桧先先生等同来访问上海。在此之前，我已读过龚群先生创办之《道教文化》杂志，慕名已久。那一天，在白云观大殿中，上海培养的首批青年道士专为台湾来的同道做了祝愿法事，以示欢迎，以表敬意。龚群先生读过法事奏章，上香拜礼，于殿堂中徘徊良久，事后感慨说，“祝愿仪式、斋醮录像，我都看了，的确不错，很亲切。江南音乐优雅动听，科范气派庄严肃穆。这是我们正一派的好传统、好风格。上

海道教科仪水平很好、很高。”龚群先生一番话给予青年道士极大鼓励。在此次短时间会晤中，龚群先生简单地向我介绍了已故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生前于台湾的情况。我也向龚群先生说到三四十年代向张恩溥学习道法的经历。共同的经历使我们一下子就非常亲近，如同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在此次谈话中，龚群先生还说到他对重振龙虎山正一派道教的希望，并且，期望有朝一日，将天师遗物带回龙虎山来，“物归原主”。

1990年12月1日，龙虎山天师府之祖天师殿开光，贫道率上海道教协会法务团参加祖庭盛会，龚群先生亦率领九十余名台湾道教界人士到龙虎山天师府参加盛典。由于上海道教协会在盛典上有法务活动，我与龚群先生却少有时间深谈，至今仍以为憾！

1992年7月3日，龚群先生又以天师府秘书长身份，率领三十余人来上海访问。我年已耄耋，听力不佳，承蒙龚群先生关心，携带一架“助听器”见赠。“助听器”至今仍置于贫道案边，每逢使用它时，见物生情，总使我为先生撒手西归而怅然。在这次会晤中，龚群先生言谈中，深为海峡两岸有些青年道士醉心物质、追求名利的现状感到担忧。先生之忧虑，提醒了复兴中之中国道教必须具有清纯之玄门道风。

1994年12月，贫道作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和代表团团长，带领大陆道教界人士和法务代表团，赴高雄道德院参加法会。后在访问台北时，龚群先生又于15日晚

专程来下榻处叙谈。老友相逢，促膝谈心，言及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至台湾后之生活境遇，穷困孤独，子病早逝。龚群先生对天师的关心和尊敬，溢于言表。对当今在台湾继承天师事业的人不学道术、只知敛财、威信日降等等亦表示了不满和担忧。同时，也对江西龙虎山的天师后代传承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并希望我转达给有关部门。自台湾回沪后，我即将龚群先生的看法转给有关部门。龚群先生的看法，对有关部门了解台湾道教界代表人士的看法，无疑十分有益。

1995年5月间，我儿耀庭才从日本回国，即应龚群先生邀请赴台湾访问，并蒙全程陪同拜访学界朋友，参访著名道观。在访问中，耀庭向龚群先生介绍了此间正准备恢复正一派授箓制度的情况，据说，龚群先生听后非常高兴，表示欣慰。并要耀庭带回“天将符”两轴，赠送于刚恢复开放之上海城隍庙。现今这两幅“天将符”仍珍藏于上海城隍庙内。展示墨宝，以贫道之道术功力读来，可以说，龚群先生在符轴上所书“嗣汉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大真人传人”这十六字，恰是当之无愧的。龚群先生之“符”得天师符法之真谛。其符书之完整，用墨之精当，笔法之苍劲，润枯之均配，如无修炼之功力，多年之润练，并在书符时严守规戒，焚香行礼，有赖神助，实难得成。我常以龚群先生之符书作为教育此地青年道士学“符”教材。我想，这也是龚群先生自耗精力、自费巨资，将他画之天师符广送于此地之真愿。如今，龚

群先生虽然羽化身登瑶台，但是他之作为传人的符书，将成为一代又一代正一派青年道士学习楷模。

1995年12月14日，龚群先生又率领十余名台湾道教徒从苏州来上海，参访了白云观和城隍庙等道观。在城隍庙里，他对此地以高标准、高要求修复上海城隍庙非常赞赏，并且对边修复、边开放之做法也很赞同。他还流露了对台湾正一派道士在科仪中不能精益求精，十分不满。龚群先生要贫道提供上海道教举行五至七天的大型斋醮的法事名称与内容，希望有朝一日，能联系安排上海的正一派科仪到台湾去做示范，帮助改变那里的正一派道士的某些风气。

1996年11月19日，龚群先生和夫人又率领一个十八人参访团，经西安、北京，途经上海。龚群先生和夫人在白云观小息后，又到上海城隍庙参访。晚上，贫道于绿波廊设宴招待参访团。龚群先生对城隍庙经几年修复，神像齐全，金碧辉煌，游人和香客众多，重现昔日风貌，非常高兴。同时，龚群先生对江西龙虎山天师府重开授箓，寄予厚望。他认为，授箓和职帖是正一派道士的凭证，它显示一个道士道行之高下、道法之精拙和道位之尊卑。因此，道教正一派的授箓必须严肃郑重，不能草率马虎。要显示龙虎山天师府的权威性，而决不能像有的地方，只要付钱就可拿到箓帖。过去，于恢复之初，略微马虎一点，情有可原。开放多年，逐渐正规化起来，就要照章办事。他相信龙虎山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他还说到，他原来想将六十三代天师的灵柩运回龙虎山，现在看来条件还不成熟，目前还难以有所作为。贫道知道，此乃龚群先生作为天师护法的心愿之一，或许亦是天师临行时之交代。但是，机缘未到，无可奈何。《阴符经》称，我们只能等待天“机”，捕捉天“机”，而难以逆天而行。

自1997年以来，贫道与龚群先生仍有书函往来，但一直未曾再叙。听说龚群先生曾多次到过江西，也曾接待过一些去台湾开会之上海与大陆其他地区道教学者。1998年5月7日，我还复函于龚群先生，对他提出之建议，即由具有大学专科水平之上海道学院代为培训台湾正一道士科仪法事一事，作出明确答复，可以接受，只须具有正式公函，以便申报。1998年10月间，丁常云和张继禹、任法融道长赴台讲学，也曾得到龚群先生照拂。龚群先生对上海之答复和建议表示满意，还说正在联系洽谈之中。后来就从海峡彼岸传来龚群先生不幸得病的消息，令此间同道十分担忧。现在，龚群先生离我们而去，实在使贫道与同道们悲伤不已。

贫道知道，龚群先生尚有许多事情，仍未完成。贫道了解，龚群先生尚有诸多愿望，有待实现。贫道懂得，龚群先生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中国道教的事业。而正是这一点，在今日之社会中，乃至在今日道门之中，着实可贵，着实令人倍加尊敬。

我相信，龚群先生所作之努力，决不会劳而无功，白

费力气。海峡两岸的道教界和学术界，将永远记得这位清风两袖，道心坚定，坚韧不拔，疾恶如仇，为中国道教之振兴鞠躬尽瘁的前辈。

太上说过，道是“天长地久”的。因此，为道的事业奋斗，也与天地同在。龚群先生虽然西行，但是先生之事业会继续，先生之愿望要实现，先生之道行将一代代传承下去，永不止息。

1999年10月3日

怀念侯宝垣同道

道经上说：“道无形相，要籍人弘”。

侯宝垣道长的一生全心全意贡献给了弘道事业。他是一位上对得起祖师，下对得起后辈的高道。

侯宝垣道长生前的近二十年中，为了促进大陆道教的恢复和振兴鞠躬尽瘁地作了大量工作，为了推动海内外社会各界对道教的关心和研究卓有成效地作了大量工作。受惠于侯宝垣道长的宫观和道士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中国道教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中国文化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中国华侨史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我为当代中国道教曾经拥有像侯宝垣道长这样杰出的高道，感到欣慰，感到骄傲，感到荣耀。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同道侯宝垣道长。

2002 年夏

《中国龙虎山天师道》序言

自太上《道德经》五千言传世以来，道家之说佐国佑民，利泽华夏。天师张陵创教，更使道家之说普传神州，深入人心。几千余载，世道更迭，然道家与道教绵延悠长，维系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感情，护国惠民，功莫大焉。

山以龙虎为名，当指水似龙游，山如虎踞。天师据山川形胜，筑以府第，传有六十余代，既是中国文化遗产之象征，亦为道教传播不绝之明证。天师道徒向以龙虎山为天师道祖庭，授经传箓，演习不衰。历千余载，龙虎山始终保持着其对于天师道徒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余自幼追随家父陈荣庆先生(法号宏明)习天师道科，深感天师道法、科仪博大精深，恢弘壮观，并与民众之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曾在荣庆先生主持过的火神庙召开中华民国道教总会的有关会议。余弱岁之时，曾目睹张元旭天师在沪羽化后举行之盛大葬礼和醮仪，弱冠初登道坛又曾得受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正乙之法。因此，余作为一名正一道徒对龙虎山天师府一直怀有深厚感情。近代中国，风雨飘摇，龙虎山天师府屡遭灾厄，天师道徒无不痛心。改革开放，国

运昌盛，龙虎山天师府重振雄风，天师道徒无不高兴。1990年秋，余率领上海道教代表团参访祖庭。南国第一府第的巍巍雄姿，悬挂嗣汉天师府巨匾的门楼，万法宗坛内肃穆的殿堂和精巧雅致的八卦门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使我最感欣慰的是继禹和金涛等一代天师府后裔正兢兢业业为继承和发扬龙虎山天师道的传统尽心尽力。

继禹在公务繁忙之中写作了《天师道史略》，获得海内外的好评。现在金涛苦心钻研，写作了《中国龙虎山天师道》，总论天师道的历史、教义、道术与养生、宫观府院与天师世录等等，实在令人高兴。

1999年秋，余坐在竹筏上沿江而下，遥望远山上天师丹炉和升仙台景，就想到，欣逢盛世，龙又在游，虎又在跃。我们的道教随着中华民族的腾飞，终将揭开新的一页。

是为序。

1993年秋

《庐山道教述略》序言

《云笈七籤》卷二十七“洞天福地”的《天地宫府图》，有“三十六小洞天”，其中有“第八庐山洞”，语称“周回一百八十里，名曰洞灵真天，在江州德安县。真人周正时治之”。而，江州又是道教龙虎山祖天师张陵曾任“令”职之地。因此，庐山亦是道教名山之一。

现今庐山还留有许多道教的胜迹。当然最为出名的是“仙人洞”。登庐山者，必经此洞，游览休息。毛泽东主席传世名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多少年来，脍炙人口。而，仙人洞就是一个道院，以供奉吕祖纯阳著名。本书作者叶至明道长，现在就是仙人洞道院的监院。

叶至明道长自入道以来，先后在陕西和北京学习，并云游于辽、陕、川、粤、桂、云、贵、湘、鄂、海南、新疆与西藏等地，访道寻师，参拜修炼，苦心研习，并于多处学习宫观管理，受命住持。最后应聘坐修于庐山，出任要职。叶道长爱国爱教，精于组织管理，重视道教文化，支持弘扬道教优良传统的活动。本书之写作与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道由人显。如同庐山出过许多儒、佛的名人高僧一

样，历史上的庐山道教，也有过南天师道的高道陆修静和他的简寂观。可惜此观久已废颓。听说，1983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道教学者福永光司教授专程赴庐山寻找简寂观的遗址，还在遗址土地上捡了几块砖石，带回日本。由此可见，陆修静和简寂观在海内外的影响。今天，庐山又涌现出一批像叶至明那样的年轻有为同道，贫道以为，庐山道教重现昔日之光彩是指日可待的。

是为序。

1999年10月于上海

《道教神仙故事》序

道门中的人，历来被儒生视作下品。人称“三教九流”，就是把道士与强盗、小偷、骗子放在同等的社会地位上。

可是，在历史上的一些文艺作品中，道士饮清溪，食松果，长啸于谷，露宿于林，与神灵为伍，同鬼怪作伐。于是，道门中的人，在某些人的嘴里称作仙人，眼里又视作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不可及的超人、异人和奇人。

其实，这样两种极端不同的看法都是不公正和不真实的。

放在面前的这本小书，就忠实而客观地记载了几名当代高道的真实而感人的生平。

当代的高道生活在人间，他们同普通人一样，同样经历了本世纪中国土地上的艰难曲折、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亲身经历了新旧社会，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因此，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他们拥护中国正在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进的历史进程，他们也拥护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文明和富裕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是道士，但是，他们首先是爱国的中国人。

当代的高道们生活在对于“道”的信仰之中。他们有的隐修于名山洞府，有的混迹于都市琼楼。但是，他们修道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长生成仙。他们中有的以医道救人急难，有的将道德教化民众，有的以仪礼服务信徒。在他们的修道生涯中，既无轰轰烈烈的搏杀，也无勾心斗角的争夺；既无激昂慷慨的陈词，也无声色犬马的排场。但是，处在社会变化和时运不济之中，他们一生清贫，淡泊名利，洁身自好，个人受到难以想像的屈辱痛苦的磨练，却对于“道”的信仰，矢志不移。他们毕生对道教这一民族宗教和传统文化始终抱着坚定、乐观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他们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又是有道教信仰的道教徒。

高道们对自己的国土和民族是忠诚而热爱的，他们对道的信仰是真诚而坚贞的，他们的品节是高尚而正直的。他们受到道门中人的普遍的尊敬和爱戴是自然的。同时，在世俗社会中，他们也理应获得任何与他们信仰不同，而同时都是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人们的尊重。

前贤说：“道由人显”。这几名高道的平平淡淡而普普通通的生平事迹就是“道”的哲学生命力的体现，“道”的文化遗产力的体现，“道”的社会应变力的体现，“道”的行为规范力的体现。

道门中人，一向秉承“无为”、“不争”和“不为天下先”的宗旨，因此，历代高道都不宣扬自己。道门中

称“道不言道”、“道不外传”就包含有这个意思。他们追求的是“和其光，同其尘”，因此大多不愿意叙谈自己，甚至不愿留下传记。正因为如此，世俗社会多不清楚历代高道的大贤大德，以致多有误解。元代道士赵道一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序》中说到历代高道，“忘世荣华，甘心寂澹，灰头垢面，破服弊衣，或露宿而雨眠，或松餐而涧饮，或和光而混俗，或厌世而避尘，散处山林，遍游湖海，宴息洞府”。因此，社会上有人称他们“此贫道人也，此丐子流也”。赵道一认为这些都是“庸辈凡流，轻耳贱目”，恐怕言之过重了。因为出现这种情况，也有道门不宜扬自己的主观原因。

袁志鸿先生的这本书，正是赵道一《通鉴》大著的继续，文笔流畅，记叙生动，立论公允，适合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阅读，方便人们全面了解当代道门中的代表人物的修道学道、道行节操、喜怒哀乐等种种。志鸿先生世居茅山，青年入道，后入京师白云观，从学于前会长黎遇航道长、著名道教学者李养正研究员等，近年来多有学习之心得，发表了许多有关道和道教的研究文章，堪称道教界勤于笔耕的后起之秀之一。

道家，包括它的载体——道教，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许多优良的文化成分，需要在新世纪中吸收继承，发扬光大。对于这些优良成分的总结和继承，需要道教界和全社会的有志者共同努力。前贤说：“道由人显”，接着后面还有一句“亦赖书传”。用书面材料来传承文化的

方法，是上千年以前的高道们就已经注意到了的。新的一代道教徒，像袁志鸿先生等，利用文章著述客观而忠实地记载道门高道和研究弘扬道教优良文化，既是道门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遗产的需要。这是一件对于道教、对于国家和民族都有好处的事情，值得所有有识之士赞扬和支持。

在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笔者能看到，各种肤色、各种服饰的人们能自由地出入道观，穿着道装的道士和道姑能自由地在各地走动；社会上的专家教授能在报刊上自由地发表研讨道教的文章，道门中的新秀能自由地著书立说，心中感到无比高兴和欣慰。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得到全社会的共同遵守，宗教徒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这使我由衷地感到我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前进了一大步。我相信，在新世纪中，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一定能够得到继承和弘扬。中国的明天将更加美好。在实现这些目标中，道家文化和道教的优良传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1999年12月于上海

《道教神仙信仰》序

道教是一种信仰。道教信仰之主要当系神仙。言及神仙，有人就以为高踞人间之上，主宰人间万事，超脱人间之外。于是，进而以为，信仰神仙之徒必然消极人世、远离人世乃至至于对抗人世。

贫道终生信道，自然崇拜神仙，但自问绝无此类消极人世、远离和对抗时代之情绪。即使是在颠倒黑白、举国遭灾之时，贫道始终相信天道有情，眷恋华夏。爱国爱教，服务大众，积功行善乃是学道人必要品质。因此，贫道以为，有神与无神之别并无彼此截然对立之必然。

何以故者？

道教之神仙乃天地纯阳之灵气。道教信徒也来自天地之气。既然人神之构成相通，自然就能天人感应。信道者只要积功行善，长年修持，就可以祈求神仙，学习神仙，自身成仙。

道教之神均遵天道行事。天道贵生。因此道教神灵都是爱护生灵，忠于国家，热爱人民，捍卫疆土，救灾治病，度化信众，累有功绩。道教之中，绝无因区区私利而能获得神位，受人崇拜之神。

惟其如此，信仰有神者和不信有神者，在家庭和社



陈莲笙道长在苏州“虎丘”留影（1981年）。

会的责任感方面，在行为规范方面乃至生活之方式方法方面，均无截然对立之内容。不信有神者要吃饭穿衣，信仰有神者同样要吃饭穿衣。不信有神者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欢欣鼓舞，添砖加瓦，信仰有神者同样因之欢欣鼓舞，添砖加瓦。

当然，在社会发展之某些时期，有神与无神在世界观上之对立，可能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在某些时期，这种对立可能并不显著。当今中国社会的道教正处于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之过程中，因此，道教徒与不信神者的世界观差异就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何况信神者数量甚微。重要之事当是联合起来，共同奋斗。

兴发道友写成这本《道教神仙信仰》，嘱贫道为序。

读来感想，于是就有以上一些议论。

兴发道友起初就读于上海道学院，后调至中国道教协会，从学于李养正教授等。毕业后，即留于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室工作。多年来，兴发道心坚定，学道刻苦，工作努力，写作勤奋，因此多有著述发表。《道教神仙信仰》一书既是他弘道之作，也是他学道心得。其中，对于道教神仙之特征与品位，道教神仙之思想渊源、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等等多有发见，值得细读。

贫道年已耄耋，看到兴发道友虽年仅而立却已在弘扬道教，适应社会，心中感到由衷之高兴。二十年来，中国道教已经恢复发展，目下全国约有万名青年道友。如果他们人人都能像兴发道友那样联络信徒，宣传弘道，那么道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部，必然能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民众生活发挥积极作用。贫道于此寄予莫大之期望。

是为序。

2000年10月

《葛仙山志》序

《韩诗外传》称：“夫山，万人之所瞻仰，材用生焉，宝藏植焉，飞禽萃焉，走兽伏焉，育群物而不倦，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乐山也。”此处所言“育群物而不倦”之品格，正乃太上《道德真经》中所言“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惟其如此，道门中仁均分外钟爱祖国群山。所谓“洞天福地”无一不是各地之名山。

葛仙山虽未列在道门“洞天福地”之中，但是仙山幽谷峻崖，奇峰异石，一直是修道坐禅之士向往之仙山。因此，当年葛玄在仙山进行多种传教济世活动，留有神迹，也属必然。

葛玄即葛仙，乃道教灵宝派创始人，对于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之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并且至今仍对道教正一派保持着影响。据历代记载和民间传说，葛玄神迹遍洒华夏土地，即使在贫道世代所居之上海附近也曾有过葛玄活动之故事。然而，中国土地上以葛仙之称名山的，大概就是本志所述之江西省铅山县的葛仙山一家了。

以葛仙之称名山，表明铅山地区民众世代崇敬和怀念葛仙，也表明当地民众具有的“育群物而不倦”的

高贵品格。这种品格是葛仙赋予后代的最大精神财富。现今，国运昌隆，时逢盛世，铅山地区民众只要秉承“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之精神，艰苦奋斗，适应时代，改善交通信息之条件，一定会创造出葛仙一样的奇迹来的。

贫道缘浅，年迈体弱，不能亲赴葛仙山朝拜，愿以心香一炷，遥祝葛仙山更加繁荣，灵山灵迹，护佑众生，造福众生。

2000年11月22日

《中国道教学院上进修班 毕业论文集》代序

这本文集中所收者，均系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大专）学员的毕业论文。道衲读罢，欣然长叹。

之所以欣然长叹，首先是因为这些论文的内容广泛，材料丰富，立足道门，而写作这些上万字论文的全部都是青年道士。这些青年道士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道门的，原来都是上海道教协会举办的道学班和上海道学院的毕业生，经过选拔，现在他们又完成了大专学习，得到了中国道教学院的文凭。他们来到上海、步入道门的时候，大多只是毛头孩子，有的身高比课桌也高不了多少。可是，如今他们都已经是一堂堂七尺，成为道教组织的代表，道教宫观的住持，斋醮科仪的高功。他们已经挑起了上海道教事业生存和发展的重担。道衲读到这些论文作者的熟悉的名字，就好像看到他们逐渐成长的身影，想到二十年前，一直担心道教事业后继无人的忧虑，如今，总算可以欣然长叹了。

其次是因为这些论文表明青年道士们对于道教的历史、人物、宫观、教义、科仪、管理乃至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问题都已有相当的认识。字里行间，

充满了作者们对于道教事业的深厚的感情以及自觉的责任。不论方家们对这些论文作何种评价，确凿无疑的是它们是一批道士自己的对于道教的研究和认识。道衲混迹于上海道门八十余年，一直为社会对于道教缺乏研究感到遗憾，特别是为道教自身缺乏人才、缺乏思想、缺乏对自己的研究感到忧虑。近二十年来，社会对道教的认识和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上海道教有了自己的刊物，道门后起之秀又有了自己的研究道教的文集，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往昔对比，感慨万千，如今，总算可以欣然长叹了。

再次是因为这些论文展示了青年道士们在新世纪里将如何根据自己的认识去处理道教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題。



上海市道协名誉会长陈莲笙在“中国道教学院上海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

我们总说：“道炁长存”。但是现实的道教总是要依靠道门中人自己去努力弘道才会有生存的机会和发展的可能。努力就需要辛勤的劳作。努力就需要自身的智慧。努力就需要明确的方向。努力就需要远大的理想目标。努力是体力的活，更是脑力的活。努力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人才，多种多样的人才。这些论文的作者就是道门自己培养的人才。我们还要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以适应道门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服务于中国社会和信众民众。培养优秀的人才和足够的人才，这将始终是道教今后生存和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和首要问题。一定要切记，切记，抓住不放。

在新世纪里，中华民族将要实现复兴，中华文化也将放射出无比的光辉。道教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将复苏和振兴。

在新世纪里，上海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上海这个东方明珠将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上海的道教也应该对于中国道教作出更大的贡献。

读罢文集，掩卷沉思，道衲尽管年迈体弱，难有作为，但是，内心无比喜悦，并且寄希望于华夏土地上未来的青年道长们。

2001年初夏

《人生赠言》序

打开这本小书的人，都在人生的道路上奔忙。

可是生活给予每个人的，并不一样。有人说生活是美丽的，有人说生活是丑陋的；有人说生活是愉快的，有人说生活是痛苦的；有人说生活充满着希望，有人说生活到处是陷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道衲已经生活有八十五个春秋，尝遍了生活之甜酸苦辣，深知生活痛苦的艰难，亦珍惜生活幸福之难遇；深知人生奋斗的艰辛，亦庆幸人生丰收之喜悦。

如今，幸遇盛世，国运昌隆，民生小康，民族振兴，作为中华文化之一的道教也得到复苏、兴隆。每思至此，常为天道之至公、人道之无私，感慨不已。

俗话说：做人做人，人要靠自己做出来。可是对于这样一个人皆面对的问题，各人态度大不一样。有的人积极向上，有的人得过且过，更有人自甘堕落；有的人百折不挠，有的人遇难即止，更有人畏缩不前；有的人海纳百川，有的人鼠目寸光；有的人热情为民，有的人冷漠一切；有的人大公无私，有的人损公肥私。

人们对于生活有如此不同之态度，生活也会相应给予人们以不同之回报。这就是天道之至公，人生之因果。

这也正是人们对生活有不同感受的直接原因。

这本小书选择了历代道教箴书中的名篇。这些箴书言简意赅，含蓄精彩，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包含了无数的生动故事，闪烁着前代道长代神立言的灼见，显现着道教对于民族道德的责任，充满了道教对于信众生活的无限关切、鼓励、鞭策和希望。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道衲结合自己的生活的体验，对于每首箴诗都做了简单的解释。

道衲以为，读者如果能够从这些千古名篇中吸收做人的哲理，指导自己的言行，奋发努力，克服困难，积德行善，热爱生活，生活一定会给予读者以精彩的回报。

天道至公，人道无私。至公者昌，自古以来，尽然。

2002年冬

《道教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上海）论文集》序

在新世纪开始的日子里，在上海举行了“道教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学术研讨会”，由上海城隍庙承担了会议的全部经费，我作为一个久居上海的老道士，感到十分荣幸，十分高兴。

这是因为这次会议云集了各地道门的有识道侣，各地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上海道教有幸成为款待同道的东道主。

这是因为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有关道教在新世纪、新环境中如何弘扬，如何传承，如何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大问题。

这是因为道衲深感上海道教有责任、有义务，应该对于中国道教的发展作出更多的事情，对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作更大的贡献。

太上曰：“上善若水”。水的一个德行就是“动善时”。道教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像“水”那样，适应发展的时代和变化的社会。纵观几千年道教的历史，用一句社会上的俗语，那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近百年来，社会飞速发展，时局变化多端，道教的

信仰却因为种种历史上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未能作出新的丰富和诠释，使得道教自身的发展受到局限，也使得道教不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多的贡献。每思及此，道衲深感不安。

如今，国运昌隆，百业兴旺，人民安居，民族繁荣。道教也欣逢盛世，全面复苏。在庙观恢复、香火旺盛的同时，道衲一直希望，新一代道教徒能够遵循太上遗教，以“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态度，跟上时代步伐，调整信仰内涵，为国家民族做更多的事情，在利万物中不断发展自己，健康自己，奉献自己。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看到同门道侣与社会名流共同切磋，相互交流，总结历史，探索未来，协力寻觅在当今时代道教发展的正确方向，道衲感到无比欣慰。经言，“道寄人弘”。我相信，正是在一切关心道教的未来发展、关心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的人们的共同努力下，新世纪的中国道教一定能够禀承太上不朽的经训，丰富新的内容，展现新的面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乃至全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增订本后记

陈莲笙道长集八十余载从道之感悟馈赠我们道教后学，实在是我们这一代的幸运，也是我们道教的喜事。陈莲笙道长一贯注重抓道士队伍的道风建设，因为他明白，道教要在当今社会薪火相传、健康发展，就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支爱国爱教、道风纯正的道士队伍。我们得到陈老先生二十多年的教诲，深知陈老先生担忧后辈学道者或有违背道教的禁戒、科条，所以常常要求我们学习《道门十规》等道教的戒律。曾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刚入道门，陈老身体力行带领我们做早晚功课，唱念吟颂，阐演科仪，告戒我们做道士就要遵守道教的规戒，在市场经济社会，思想观念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行为举止要符合道教传统，在信教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度人先度己”，这是陈老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对我们后学者的要求。所以我们将陈老先生二十年来的谆谆教诲、娓娓话语编印成册，想必后学者读来会有所裨益。

此次《道风集》增订本于陈老九秩之际得以如期出版，得到了陈耀庭教授、刘仲宇教授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张晓敏社长、陆海龙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史孝进

丙戌年夏月于大境阁

原 后 记

本书内各篇文章的写作曾先后得到过海内外诸多同道的鼓励。上海市道教协会大力资助出版经费，张源荣、张振国、史孝进、丁常云等同道也对本书出版多方协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武羲先生为本书的编辑、装帧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致谢。

陈莲笙